



ISSN 3135-5625 (Print)
ISSN 3135-5633 (Online)

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

Archives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2026年7月，总第1期（月刊）

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

Archives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2026年7月 总第1期（月刊）

2026 年 7 月

目录 CONTENTS

总第 1 期（月刊）

荣誉主编：杨冬权
主 编：谢永宪
副 主 编：周林兴 王巧玲 高大伟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伏秋 马林青 邓 君
石 敏 白文琳 邢变变
毕建新 向立文 苏焕宁
李忠峪 李姗姗 李 颖
杨 静 肖 强 宋 欣
张会超 青格乐图 赵 跃
胡 莹 饶 圆 聂云霞
徐辛酉 徐海静 黄 静
曹 宇 康胜利 蒋 冠
魏 斌

编辑出版：《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投稿邮箱：AWTP2026@163.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3135-5625(Print)
ISSN 3135-5633(Online)

出版日期：2026 年 7 月 31 日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智档案馆建设：“人工智能+档案”十六大应用场景展望	杨 荀 杨冬权
7	数据要素化视角下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重构、转化与实现	张 一
14	三权分置视角下 IPFS 技术在档案数据资本化中的应用研究	许夏媛 王 吟 薛 彤
19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能力体系、价值导向与推进策略	周林兴 刘诗桦
29	行为选择基础视角下的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含义解读与关系辨析	王巧玲 杨梓晔 岳 玲
35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数字监管实践及特点	李怡婷 徐辛酉
42	以人文关怀为桥，让档案服务“出圈”：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世代之旅”实践及启示	林禹彤 刘 潇 杨 静
49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问题与路径	凡晓辉 聂云霞
57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困境审视与策略选择	库丛燕 崔怡梦
6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路径分析	董思思
66	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育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朱 荀 王宇奇 高思涵
72	高校特色馆藏的档案文献遗产转化路径研究——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为例	陈 萱
79	面向真实性的版式电子文件签审流程研究	张泽升 易雨洁
84	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归档创新与实践——以广州地铁 8 号线东延段为例	陈炳新 冯亚琳 陈俊文 孙婷婷 卢贵英
89	国家战略视域下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评向立文《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	尹 鑫 舒文静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智档案馆建设： “人工智能 + 档案”十六大应用场景展望

杨 荀¹ 杨冬权^{2,3}

(1.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101;

2. 国家档案局, 北京 100037;

3. 中央档案馆, 北京 100095)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度重塑档案工作发展范式, 是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文章立足国家档案局“人工智能 + 档案”专项行动政策导向, 以杨冬权“五全”档案工作理念为理论支撑, 结合“人工智能 + 档案”行业发展趋势, 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档案工作的内在契合性, 梳理十六大“人工智能 + 档案”应用场景, 同时结合行业现状, 研判技术落地过程中数据、技术、安全、人才、标准等现实困境, 针对性提出优化策略, 为新时代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 档案; 数智档案馆; 应用场景

【作者简介】杨荀,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党务及档案主管, 助理馆员, 研究方向为文献信息服务与方法、党史党建, 邮箱: yimucaocao@163.com; 杨冬权, 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党代表,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档案事业管理、档案数字转型、档案文化建设、党史党建。

1 引言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各种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伴随数字信息技术迭代演进, 我国档案行业先后经过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两轮转型, 当前行业整体迈入智慧化建设关键窗口期。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大模型与多模态融合架构, 在自然语言解析、非结构化信息萃取、关联知识生成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 为破解档案行业长期存在的海量资料沉睡、查阅利用效率偏低、档案隐性价值难以深挖等现实堵点提供全新技术解法。

“十五五”时期, 国家档案局将拓展“人工智能 + 档案”, 推进数智技术赋能档案工作^[1]。2026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提出要系统谋划推进档案工作现代化建设, 稳妥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治理效能提升^[2]。2026年4月,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在档案行业应用的意见》^[3], 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工作, 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档案领域拓展智能应用场景、培育档案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档案领域从学术研讨阶段转入规模化试点落地阶段。现阶段国内档案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共识持续加深, 但落地实践仍普遍存在应用边界模糊、技术适配方案缺失、智能系统与传统档案业务割裂等现实问题。基于上述行业现状, 本

文从档案“收、管、存、用”全业务链条出发, 细化梳理十六项落地性较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客观梳理技术融合进程中的现实挑战并提出适配性对策, 以期助推智能技术与档案业务深度融合, 助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档案工作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概述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模型预训练迭代的新型智能范式, 区别于传统规则化智能的浅层处理模式, 可自主完成语义理解、多模态解析与知识生成, 实现档案治理从机械存储检索向智能赋能的层级跨越。从现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来看, 其功能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认知与交互性能, 可精准识别人类日常口语化、场景化指令, 实现高效、自然的人机智能对话与互动协作。二是拥有良好的场景自适应能力, 模型依托海量数据完成预训练学习后, 可结合不同行业场景进行参数微调, 灵活适配各类专业化、精细化业务场景需求。三是具备开放式多模态内容创作优势, 能够自主输出文本、影像、数字虚拟形象等多种形式的內容, 真正完成从传统决策式智能到生成式智能、从用户原创内容到人工智能原创内容、从时空信息变革到知识体系革新的全方位技术跨越^[4]。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档案工作的内在契合性

202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

例》增设“档案信息化建设”章节^[5],明确提出推进档案智能识别与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档案领域的规范落地与创新应用提供了制度支撑。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算力运算、语义学习、多模态融合等技术优势,可全面升级档案服务模式与服务效能,与档案“收、管、存、用”全生命周期业务高度适配。其多模态能力可实现图文、音视频等异构档案标准化处理,支撑全域建档归档;知识推理技术能够挖掘碎片化档案的隐性价值,深化资源开发利用;智能检索可精准匹配多元查档需求,改善传统服务短板;智能审核与风险溯源可构建全周期安全防护体系,筑牢档案安全底线,助力新时代档案服务提质增效。

2.3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智档案馆的赋能逻辑

“人工智能+档案”是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与范式重构,能进一步打破传统数字档案馆“重保管、轻利用”的发展局限和选择性管护的“选时代”模式,构建智能治理新格局,催生数智档案馆业态。相较于传统数字档案馆与初级智能档案馆,数智档案馆以知识赋能为核心、精准服务为导向、全域安全为底线,具备数据驱动、智能自主、价值深挖的特质,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档案管理发展瓶颈,助力档案工作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

3 “人工智能+档案”应用场景解析

智能化技术是实现档案全量留存、智慧开发的核心支撑。本文提出十六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档案场景,覆盖了数字化归集、数据治理、编研开发、公共服务、安全保障、文化传播六大领域。

3.1 文字档案自动识别转换

纸质古籍、手写稿件、历史公文、老旧报表等文字类档案,普遍存在字迹褪色、手写潦草、版式杂乱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OCR基础上叠加NLP语义校正、上下文推理能力,能够批量完成印刷体档案识别,还可精准辨析模糊字迹、异体字、方言手写体、破损残缺文本,自动修正识别乱码、错别字等问题,并按照档案著录规范完成结构化拆分与标注,输出可检索、可编辑、可统计的标准化文本数据。该技术模式识别准确率可达99.9%,整体作业效率提升20倍以上,将大幅降低存量文字档案数字化改造成本^[6]。国内多家省级档案馆已将该技术应用于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文献修复归集工作;国外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多国科研团队,依托智能识别转换技术完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的《圣母奇迹》手稿数字化加工,搭建PEMM专项档案数据平台,为古籍类档案利用提供技术借鉴^[7]。

3.2 录音档案自动识别转换

口述史料、会议录音、访谈音频等音频档案,是承载鲜活历史细节的重要资源,也是口述档案工作的核心载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搭载档案领域语音模型,内置政务专业术语、地方方言、行业黑话词库,一站式完成音频降噪、杂音剔除、多发言人分离、时间戳精准标注、双语种同步转写等全套作业,最终生成音文一一对应的结构化索引文件。目前北京、四川、广东等地市级档案馆,已运用该技术完成大批量红色口述史料、老干部访谈录音的转写工作,建设红色档案专题数据库、启动长征口述历史档案采集计划等,有效盘活音频档案资源,完善红色档案资源体系。

3.3 照片与录像档案自动识别转换

影像档案作为直观化的历史记录形式,广泛涵盖政务活动影像、民生纪实照片、历史专题录像等资源。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语义解析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系统可自主提取影像档案的拍摄时间、地点、参与人物、核心事件等多维元数据,自动拆分长时录像的关键片段、剔除无效冗余画面,并生成适配档案业务的内容摘要;同时可针对影像画面人物情绪、场景氛围开展情感分析,丰富影像档案的标签体系,实现从“静态存储”向“动态智能利用”转型,全面提升影像档案资源利用率。从行业实践来看,浙江省档案馆率先落地多模态影像智能治理系统,针对馆藏海量政务视频、历史老照片开展智能化编目、片段拆解与主题标签生成;上海市档案馆开发了“AI影像档案修复系统”,对近现代城市纪实影像进行语义化加工,补齐老旧影像缺失元数据,有效提升档案利用效果。

3.4 档案数据挖掘与知识图谱构建

数字化档案普遍存在碎片化、关联性弱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流的生成模型(Flow-based Model)、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等在档案馆内部进行模型训练^[8],针对文本、音频、影像等多模态档案数据开展深度治理:一方面完成数据清洗、冗余内容剔除、元数据补全,统一馆藏档案数据标准;另一方面自动抽取人物、机构、事件、时间、地域五大核心实体,梳理实体之间的从属、关联、因果关系,搭建层级化、主题化的全域档案知识图谱。该模式可实现档案资源纵向时序串联、横向主题关联,打破单份档案的信息孤岛,依托链式检索模式深度挖掘隐性史料价值,是“档案大脑工程”全国一体化档案知识图谱建设的重要底层技术。

3.5 跨模态与语义智能搜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档案检索底层逻辑,搭建全新跨模态语义检索体系,支持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等多种检索形式;同时系统可深度解析用户口语化、碎片化、模糊化的检索意图,跳出字面匹配局限,基于语义关联匹配全馆藏多模态资源,秒级输出检索结果,整体查准率稳定维持在 91% 以上。从行业落地实践来看,北京市昌平区档案馆自主研发跨模态智能检索利用系统,实现了检索过程的精准化与智能化,并获得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在本地化部署大模型后打通多类型档案数据壁垒,将用户平均查档时长缩短 90%,显著降低检索门槛。该检索模式既能满足党政机关专题资政、史料溯源等专业化查档需求,也能够简化普通民众民生档案查询流程,优化普惠型公共档案服务体验,为全国档案馆检索服务智能化升级提供可复制范式^[9]。

3.6 档案开放智能审核与鉴定

档案开放审核与涉密审核是档案利用的前置关键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保密与开放政策构建规则库,通过全文语义分析识别涉密、隐私等敏感信息,智能标注开放等级并生成审核报告。当前,国家档案局持续健全数字档案安全治理制度体系,稳步推进电子文件安全管控与智能审查试点落地工作,浙江、江苏等多地档案馆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入区块链溯源、信创安全管控等技术机制,强化档案数据访问全程留痕、行为可追溯,进一步规范档案数据流转流程,夯实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合规安全基础。

3.7 档案专题资料智能编写

档案专题编研是资政服务的重要载体,传统专题编研需要工作人员自主检索史料、梳理内容框架、整合多方资源,一份高质量专题编研成果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编研成本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指定主题自动检索馆藏资源、梳理逻辑框架、提炼核心内容,快速生成专题简报、研究报告、史料汇编等成果,不仅能适配党政决策、学术研究、社会科普需求,大幅提升档案资政效能,同时适配新时代新媒体传播趋势,生成轻量化、碎片化的科普类微编研内容,辅以人工优化内容细节、校验史实真伪即可定稿,大幅缩短编研周期,提升档案资政赋能效能。

3.8 档案展览大纲智能策划与展品选配

档案主题展览是档案资政育人价值外化的重要途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贯穿策展前期筹备、中期布展、后期宣发全业务链条,实现全流程智能化赋能:工作人员录入展览主题、目标受众、展陈场地、

预算规模、展出周期等基础参数后,系统可结合馆藏资源储备情况智能划分展陈单元、搭建层级化、逻辑化展览大纲;依托多模态检索与语义匹配技术,自动筛选适配单元主题的文献、老照片、实物影像等展品,并按照展陈节奏完成排序;最后一键生成展板文案、展品解说词、前言结语等全套配套文字素材,极大简化策展作业流程。四川省档案馆打造了全国首个档案展览专属 AI 智能体“档小江”“档小河”,依托红色档案专属知识库,打破档案馆的物理围墙,提供了覆盖更广、触达更易的档案服务。

3.9 大事记与年鉴智能编撰

大事记与年鉴编撰需梳理海量史料,人工工作量极大。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档案垂直大模型与语义抽取技术,可实现史料全自动归集、过滤与分级筛选;按照官方年鉴、大事记编撰规范,从时间、主题、层级多维度筛选重大政务活动、民生惠民项目、专项业务成果与突发事件,智能梳理时序脉络、统一行文体例与表述话术,快速生成完整编撰初稿。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发挥二次校验作用,自动排查条目内容重复、时间逻辑冲突、史实表述错误等问题,进一步降低校对压力。国内多地档案部门已完成规模化试点: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垂直大模型,一键生成大事记、机构沿革等编研初稿,编研整体效率提升 70% 以上。

3.10 地方志与专业志智能编纂

地方志、行业专业志编纂资料来源广、内容体系复杂、体例要求严苛、编纂周期长。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自动归集多源史料,完成去重纠错与标准化处理,严格遵循志书体例撰写章节内容、理顺行文逻辑,核查内容疏漏与逻辑矛盾,进一步提升志书编纂效率与质量。上海市档案馆及相关研究机构推出了名为“申知·沪志”的上海方志大模型,对海量的方志资源及城市纪实影像进行语义化分析,激活历史智慧,为超大城市的运行治理提供历史启示与数据支撑;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上线“杭小志”数智编纂系统,将生成式 AI 深度嵌入年鉴全流程编纂环节,有效破解基层史志编研人员不足的难题。

3.11 档案安全隐患智能预警

档案安全涵盖实体安全与数据安全两大核心维度。生成式人工智能联动库房安防、环境监测与数据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库房温湿度、火情、入侵等实体风险,动态预警数据篡改、泄露、非法访问等数字风险,筛查开放档案敏感内容,推动档案安全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筑牢全留存、全备份安全防线。

3.12 档案利用场所智能知识服务

传统查档服务形式单一、被动滞后。AI 智能服务终端可提供语音、文字双向咨询,解答查档流程、开放政策等常见问题,结合用户检索习惯个性化推送关联档案资源,搭配虚拟导览、智能讲解功能,丰富公共服务形态,提升档案惠民服务质量与资源利用率。比如,上海市运用分布式数据库整合等技术,实现民生档案全种类在线出档,并将长三角地区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接入移动端,实现查档“零跑动”。

3.13 老照片、老录音、老录像智能修复

老旧声像档案普遍存在模糊、破损、杂音、失真等问题,属于濒危珍贵史料。生成式人工智能专项修复模型可实现老照片去黄补损、高清上色,老录音降噪修音,老录像优化画质、去除划痕,批量完成濒危声像档案抢救修复,还原真实历史视听记忆。

3.14 电子文件自动归档与接收监管

海量原生电子文件人工归档易出现错归、漏归、著录不规范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对接各类办公业务系统,实时捕获原生电子文件,自动完成分类、著录、标引、格式转换与批量归档,同步核验文件合规性,留存全流程操作日志,实现电子文件全程可溯、规范管理。

3.15 文生图、图生视频、文生视频等智能创作

档案文化宣传、展览文创亟需优质可视化素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进一步降低元宇宙空间等的基建成本^[10],依托多模态创作能力,可根据文字脚本生成档案主题海报、历史场景插画、科普短视频、宣传影像,将静态老照片转化为动态纪实视频,大幅降低创作成本,丰富档案文化传播载体,增强档案文化感染力,赋予档案馆“生命力”。

3.16 AI 生成档案智能识别与标记

AI 合成内容泛滥对档案原始性、权威性形成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文本、图像、音频特征,批量筛查归档资源,精准识别 AI 生成内容并添加专属标记、建立专项台账,严格区分原生档案与合成档案,从源头保障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与规范性。

4 “人工智能+档案”应用的现实挑战与优化框架

4.1 现实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档案”规模化落地仍存在多重现实瓶颈。一是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馆藏档案数字化质量参差不齐,元数据缺失、标准不一,异构数据混杂存储,高质量训练数据集匮乏,同时数

据壁垒突出、标注难度大,制约智能应用落地。二是技术适配性不足。通用大模型缺乏档案专业语料训练,存在模型幻觉、史实偏差等问题,国内档案垂直大模型研发滞后,难以适配档案求真求实的专业要求。三是安全风险多维叠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存在数据泄露、算法权责模糊等隐患,AI 生成档案权属、归档标准尚不明确,冲击档案原始权威底线。四是人才结构失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 AI 技术与数据治理能力,懂档案、懂技术、懂安全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显著。五是标准体系滞后。全国暂无统一的 AI 档案应用规范、数据标准与评价体系,行业建设碎片化、无序化问题突出。

4.2 优化框架

针对上述发展瓶颈,结合学界研究与行业实践,可从五方面推进优化升级。第一,健全全域数据治理体系。统一档案元数据与归档标准,常态化开展存量档案提质、增量档案规整,构建标准化档案资源池;实行数据分级管控,涉密数据闭环留存、全程备份,非涉密数据合规共享,夯实智能应用数据根基。第二,深耕档案垂直模型研发。推动产学研协同攻关,训练专属档案语料库,优化算法逻辑、修正模型幻觉,强化史实校验能力,实现技术与档案专业深度适配。第三,筑牢全维度安全防线。推行 AI 系统本地化、私有化部署,建立算法备案、合规审查、全程溯源机制,明确 AI 生成档案的归档标准与权属边界,实现闭环安全管控。第四,完善复合型人才培育机制。构建高校学科培养、行业在岗培训、项目实操锻炼的培育模式,推动档案专业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补齐人才短板。第五,健全行业标准规范。由国家档案局牵头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档案应用的数据、技术、安全、评价标准,统一行业建设口径,破解碎片化发展难题。

5 结论与展望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档案业务深度融合,是档案事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随着档案垂直大模型持续迭代、行业标准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档案治理、资源开发、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领域的赋能价值将持续凸显。各级档案馆室应主动拥抱技术变革,抢抓发展机遇,尽快对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企业,结合本单位实际优先落地可实现的应用场景,逐步构建高维、新质的智慧档案管理体系,让档案资源活起来、用起来、价值显出来,推动我国档案工作从数字化、智能化向智慧化跃迁,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全文）[EB/OL]. (2026-06-11)[2026-06-12].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6/c75591cb82564d669635c859041512cf.shtml>.
- [2] 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在京召开 [EB/OL]. (2026-01-17)[2026-06-11].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1/58cca44a5edc400faa13dc5607053238.shtml>.
- [3]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在档案行业应用的意见》的通知 [EB/OL]. (2026-04-10)[2026-06-11]. <https://www.saac.gov.cn/daj/tzgg/202604/12aa9fab60c4dbeab5444f03e78bdb9.shtml>.
- [4] 郭小东.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包容性法律治理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5(6): 93-105+117.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EB/OL]. (2024-01-12)[2026-06-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8164.htm.
- [6] 许闯.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档案数据要素化：机理、困境与治理路径 [J]. 兰台世界, 2026(4): 55-59.
- [7] 黄霄羽, 李沐紫. “人工智能+”背景下国内外档案利用服务的发展态势 [J]. 北京档案, 2026(4): 27-34.
- [8] 张笑玮, 吴建华.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档案馆服务质量的优化路径研究 [J]. 档案与建设, 2025(2): 62-70.
- [9] 昌平区档案馆“跨模态检索系统”获国家软件著作权认证 [EB/OL]. (2026-01-22)[2026-06-11]. <http://www.chinaarchives.cn/mobile/category/detail/id/46534.html>.
- [10] 解学芳, 高嘉琪. AIGC 模式赋能数字文化创新的逻辑与善治：基于 ChatGPT 热潮的思考 [J]. 江海学刊, 2023(3): 86-95.

Empower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Archives: Prospect on Sixteen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Archives

YANG Xun¹, YANG Dongquan^{2, 3}

(1.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Beijing 100101;

2.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7;

3.Central Archives, Beijing 100095)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archival work and serves as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undertaking. Guided by the special-action policy of "AI+Archive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upported by Yang Dongquan's "Five-Comprehensiveness" archival work philosophy,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 of "AI+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rchival work, and sorts out sixteen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AI+Archive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dustry, it identifies practical dilemmas in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volving data, technology, security, talent and standard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work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Archives; Digital-intelligent archives; Application scenarios

数据要素化视角下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重构、转化与实现

张一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50)

【摘要】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时代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正经历从静态历史载体向动态数据资产的范式转换。文章以数据要素化为视角,探讨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重构、转化与实现。文章认为,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是其固有基础属性,在数据要素化驱动下,二者通过技术解构与制度赋能发生价值重构,进而呈现资产价值这一新价值形态。通过高质量数字孪生体的创建与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档案文献遗产可实现从物理实体到智能数据的跃迁,并进一步通过确权、标准化与安全治理完成要素化转型。文章提出了四条价值实现路径:一是通过数据产品开发与授权,实现市场化运营;二是融合数字人文与文创产业,推动知识服务升级;三是利用众包与沉浸式教育,赋能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四是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与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参与数据要素生态构建。文章旨在为档案文献遗产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数据要素化;档案文献遗产;价值重构;价值转化;价值实现;数据资产

【作者简介】张一,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馆员,邮箱:zhangyi@istra.org.cn,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标准化。

1 引言

2000年起,国家档案局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选,目前已先后公布6批,入选项目达250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在2025年12月正式印发,为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强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加强中华典籍文献传承”。《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继续实施“档案文献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有序组织、积极推进档案文献遗产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档案事业,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档案文献遗产作为世界记忆名录的储备军,其开发利用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值得关注,尤其在当前数字经济大热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若仍局限于基于实体的传统路径,档案文献遗产工作融入更为宏观的文化强国建设工程即可能面临“孤岛化”的尴尬局面。

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和驱动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支撑性新型要素。2024年,国家数据局公布《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一批)》,数据要素被界定为“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参与价值创造的数据资源”^[1]。因此,数据要素化也成为释放数据价值潜能的主要方式和关键渠道。也就是说,数据不等于数据要素,使数据要素化需要具备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把原始数据加工成机器可读的,具备投入生产使用条件的生产数据。二是让数据可以通过流通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2]。

基于此,面向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再理解、转化与升级即可通过这一全新视角加以审视——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时代,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开展数据要素化何以可行?何能可为?其价值如何重构,又将如何有效转化与实现?在科学谋划“十五五”档案事业发展方向、确定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分析探究数据要素化视角下档案文献遗产价值重构的可行性与未来图景,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价值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期望以此为契机,推

动档案文献遗产工作进一步赋能文化强国、数据强国的宏伟事业。

2 数据要素化视角下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重构

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时代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认知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它能够被视为一种蕴含巨大潜能的、高价值密度的数据资产。要理解这一转型,首先需厘清其固有的基础价值属性,深入剖析数据要素化驱动价值重构的内在机理,并明确重构后衍生出的新价值形态。

2.1 档案文献遗产的基础价值

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体系建立在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之上。在数据要素化浪潮的深刻影响下,这两种基础价值并未被削弱,而是成为价值重构的根基与原料。

文化价值历来被认为是档案文献遗产的核心价值,但在数据要素化视角下,这一价值的存在形态、实现方式与外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价值形态方面,文化价值趋于显性,即数字化等技术使得隐含于内容中的文化价值可量化、可解析,档案文献遗产中的文字、图像、符号被拆解为可标注和可关联的数据元。在价值实现路径方面,文化价值趋于深化,即由展览与出版等单一形式向基于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的创造性转化,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技术,从海量文献中自动提取主题、情感、关系网络,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全新范式。在价值外延方面,文化价值不断拓展,档案文献遗产是具有高质量、高可信度的文化数据源,在训练面向文化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时能够凭其权威性与丰富性赋予模型独特的文化品味,文化价值也因此能延伸至更多垂直领域^[3]。

信息价值是档案文献遗产的另一基础价值。基于其信息价值,数据要素化使档案文献遗产进一步升级为系统的、可主动赋能的战略数据资源。信息密度显著提升是档案文献遗产信息价值升级的重要表现,各项档案文献遗产均蕴含大量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信息,这些包括人物、事件、地点、时间、数量关系等在内的信息能够在深度数字化与知识组织技术介入下被有序提取、清洗、关联,形成高价值密度的结构化数据集,信息密度得以富集^[4]。信息价值维度突破是其发生重大跃迁的突出进展,档案文献遗产的信息价值逐渐突破历史研究维度,向经济决策、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多个维度辐射——地理档案文献中数据可服务于当代城市规划与生态

保护;历史科技档案中的实验数据与工艺记录能为当代技术攻关提供关键启发。每一份档案文献遗产均能成为一处多维信息价值节点,其具体价值则取决于被置于何种数据场景之中^[5]。

2.2 数据要素化驱动的价值重构机理

价值重构并非对原有价值之否定,而是借助数据要素化的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基础价值进行解构、重组与形态升级,使其从历史记忆载体转变为新型生产要素。

数据要素化的第一步是通过数字化、数据化技术,将依附于物理载体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解构为独立流动、可重组的数据颗粒。在这一过程中,档案文献遗产不再仅以“卷”或“件”为单位供整体阅览,而是被细化为字符、图像、实体、关系等最小数据单元。这种技术解构打破了原有物理边界与线性阅读逻辑,使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进入一种趋于开放的状态,为后续的价值重组与形态转换提供了技术前提。

仅有技术解构尚不足以完成价值重构。在数据要素化过程中,通过产权界定、标准规范、流通规则等制度安排,解构后的数据能够转变为生产要素。档案文献遗产在制度赋能下,其原本仅服务于历史研究或文化展示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获得了进入市场流通、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性。制度赋能为价值重构提供了合法性框架与经济通道,使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从文化领域、信息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

2.3 重构后的价值体系

在数据要素化驱动下,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经过重构,共同催生了资产价值这一新价值形态。资产价值并非与文化价值、信息价值并列的又一固有属性,而是前两者在数据要素化条件下发生形态转换后的经济表征。当前,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成为其保护与开发的基础手段,而开发其资产价值即开展高质量的数字化工作。即在数字化的同时建立起清晰的权属关系、质量标准和经济性开发机制,它才能从保管对象转变为可登记、可开发、可评估的数据资产,这一转变使档案文献遗产真正成为具有明确经济价值的资源^[6]。而在成为数据资产后,档案文献遗产的资产价值需要通过市场化的配置与流通得以实现,其中包括数据授权使用、数据入股合作、数据赋能收益分成等,这些机制构成档案文献遗产资产价值从潜藏到实现的完整通路。

事实上,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价值、信息价值与资产价值在数据要素化框架下形成了递进关系:

文化价值提供了档案文献遗产的独特性和人文底蕴,是其价值差异化的核心因素;信息价值是内容基础与转换中介,承接文化价值向资产价值的过渡;资产价值则为文化价值与信息价值的持续挖掘、保护与创新提供了经济支撑和市场化驱动力。三者共同构成了档案文献遗产在数据要素化背景下全新的、立体的价值体系。

3 档案文献遗产的数据化与要素化

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在数据要素化视角下得以重构,而重构后的价值要真正具备数据要素属性,必须经历系统性的价值转化。价值转化是连接价值重构与价值实现的核心环节,包括两个递进阶段:一是通过技术手段将物理实体转化为智能数据体的数据化;二是通过制度安排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的要素化。前者是价值形态的技术转换,后者是价值属性的制度确认。

3.1 数据化:从物理实体到智能数据

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管理而言,数据化是要素化的前提,不仅旨在为其创建数字化副本,更是构建一个可被计算机理解和处理的、富含语义的孪生世界。这一过程超越简单的影像扫描,进入深度信息组织层面。

3.1.1 高质量数字孪生体的创建

数字孪生体是对档案文献遗产实体及其属性的高保真、全维度数字化映射。高质量的数字孪生体区别于基础数字化工作,能够为档案文献遗产实体形成可供反复试验、模拟的开发工具,是后续所有数据操作的基石^[9]。

数字孪生体建设涉及多类数据化基础工作。一是多模态全息采集,即综合应用高分辨率光学扫描、多光谱成像、三维建模、高保真音频录制等技术,捕获文字与图像,同时全面记录文献的物理形态、材质纹理、色彩光谱,乃至微观病害特征。如对古籍、碑帖、字画等载体采用多光谱成像,可显现肉眼无法识别的褪色字迹、修改痕迹或底层文字,使数字化副本在信息完整性上超越档案文献遗产实体本身。二是全生命周期元数据嵌入,即在创建数字对象的同时,系统、规范地嵌入描述性、管理性、结构性和技术性元数据。其中包括文献的来源、形成背景、历次保管流转信息、知识产权状态、数字化技术参数等,这些元数据是确保数字孪生体可追溯、可管理、可被深度理解的根本保障。三是保真度与长期保存,即制定严格的色彩管理、精度标准和文件格式规范,确保数字孪生体能长期、无损地保存与访问,满足未来技术环境下的再利用需求^[10]。

3.1.2 知识图谱与关联数据技术的应用

知识图谱的形成是档案文献遗产构建数据化基础的高级阶段,旨在将离散的数字资源转化为相互关联的、富含语义的知识网络,释放档案文献的深层信息价值。

首先,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化粒度需从文本层面精细化至结构知识层面。利用OCR、自然语言处理、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或自动地从数字化文本中提取人物、机构、地点、事件、时间、概念等实体,并识别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围绕特定专题或主题领域,整合多份文献遗产中的实体与关系,以图数据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特定主题的档案文献知识图谱^[11]。尤其当某项档案文献遗产由多组历史档案文件构成或跨全宗结构时,图谱将每份孤立文献中的人物、事件、地点串联起来,能形成一张巨大的、可揭示复杂关联的历史知识网络^[12]。再次,关联其他领域开放数据实践。鉴于档案文献遗产已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重要文化资源,可遵循关联数据原则,使用RDF、OWL等标准模型,为图谱中的实体赋予全球唯一的URI标识,并将其与外部权威数据库进行关联,如GeoNames等。这使得档案知识能够融入全球语义网,成为可被机器自动发现的开放互联数据节点,极大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数据的可利用性。如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和关联数据技术,对家谱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提取姓氏、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等内容,构建起家谱知识图谱,并向公众及开发者提供开放数据服务,成为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关联化的典型示范。

3.2 要素化: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

档案文献遗产要素化是在高质量数据化基础上,通过制度、标准和技术安排,使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能够安全、合规、高效地进入生产与流通领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数据化与要素化是价值转化过程中前后衔接、相互渗透的两个阶段。数据化解决“如何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问题,是技术层面的价值形态转换;要素化解决“如何转化为可流通的资产”问题,是制度层面的价值属性确认。二者共同构成将档案文献遗产转化为数据资产的价值转化链条。

3.2.1 确权与产权界定

清晰的权利界定是数据资产化的首要法律前提,但档案文献遗产在此方面面临特殊复杂性。一方面是系列权利的分解与界定。档案文献遗产要素化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数据所有权、著作权、数据财产权等^[13]。如对某份历史手稿档案进行数字化和

深度标注时,所形成增值数据集的财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等均需要遵循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另一方面是经济收益与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平衡问题。部分档案文献遗产不在综合档案馆保管范围内,其相关权利人存在模糊不清的现实难题,而其又具有强烈的公共文化属性。这要求在数据开发利用与公共利益保障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如建立特定许可制度、设立收益提存机制等,以尽力扫清要素化流通的法律障碍^[14]。如南京市档案馆率先在国内开展非遗档案数据资产转化试点,按照“分类授权、多方协同、管运分离、生态共建”的原则,淡化数据所有权、强调数据使用权,将馆藏 132 幅云锦实物、意匠稿档案数据的使用权授权给市大数据集团进行试点运营,为档案文献遗产的确权与产权界定提供了地方实践范例^[15]。

3.2.2 实现数据标准化与互操作性

标准化是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要素在规模化流通和高效利用过程中的通用语言,也是有效衔接流通与利用的必要桥梁。一是要建设服务于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栈标准体系。随着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迅速扩充,入选标准与开发思路逐渐清晰,有必要建立一套涵盖数据采集、元数据描述、数据格式、知识组织、接口服务、质量评估等全链条的标准规范体系,同时推动采用国际国内通用标准,确保不同来源、不同机构的档案数据能够在技术上无缝对接。二是要针对档案文献遗产特点设计或采用一种通用的核心数据模型,为描述复杂的历史实体、事件及其关系提供统一的概念框架,确保语义层面的一致性。三是逐步推进开放 API 与服务化封装工作。通过提供标准化、开放的应用编程接口,将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资源和服务进行封装,旨在使开发者或各类利用者等便捷地发现、获取和组合利用档案数据,从而激发其创新应用^[16]。

3.2.3 安全与可信保障

档案文献遗产要素化必须在安全可信的框架内进行,这是档案工作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底线要求。档案工作者需要结合档案科学研究或其他领域的创新成果,从以下三方面奠定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要素的安全基石。一是通过对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内容进行分类分级与敏感信息识别规则制定,守好源头安全。对档案文献遗产中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民族宗教敏感信息等内容,进行严格的识别、脱敏、访问控制或分级开放^[17]。二是应用区块链、数字水印、可信时间戳等技术,巩固全流程安全。可信是档案资源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的重要特征,因此,为档案文献遗产数据的生成、

流转、修改、授权、使用全过程提供不可篡改的可信记录和存证十分必要,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防范数据造假与滥用的作用。三是建立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开放利用前的伦理风险评估与审查机制。尤其是涉及企业档案、科技档案或战争等特殊主题的档案文献遗产,更应推动与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妥善协商,探索符合档案工作伦理的共治模式^[18]。

4 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实现的路径

经过价值重构与价值转化,档案文献遗产已具备数据资产的基本形态。价值实现是价值转化的最终目标,即通过具体路径与场景,使重构与转化后的价值真正作用于市场、用户与社会,完成价值闭环。在价值转化的有关探索中,需始终把握公共文化与经济效益间的客观平衡,坚持以公共文化属性为根基,以市场化、创新性手段为杠杆。即以社会效益为首要考量,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

4.1 通过数据产品开发与授权,实现市场化运营

本路径旨在探索档案数据资源在合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价值转化,并以此反哺公益性事业,具体包括开发数据产品、授权数据开发或交易。

基于深度加工和知识组织,档案数据产品可面向特定用户群体定制开发,形成两类主要服务形态。一是专题数据库的订阅服务。比如,针对城市金融史、地区气候变迁、城市规划与发展等特定领域,整合相关档案文献遗产,构建主题明确、结构清晰、检索便捷的专题数据库,面向高校、研究机构等用户提供分级订阅服务,实现稳定的内容收益。二是高质量数据集的 API 接口服务。可以将基于档案文献遗产的高质量数据集封装为标准化应用程序接口(API);数据集内容通常涵盖古籍文本、历史地名、人物关系数据。文化科技企业和开发者通过付费调用 API,可将数据快速集成至自身 App、网站或研究工具中。这一模式既能极大降低用户获取高质量历史数据的门槛和成本,还可为档案文献遗产资源的保管部门(以下简称“保管部门”)带来持续的技术服务收入。例如,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即通过 API 接口提供家谱、手稿档案、古籍等文献知识库,开发者注册 API Key 后即可付费调用,实现了数据服务的市场化运营^[19]。

此外,在清晰界定数据产权与使用权限的基础上,还可设计灵活多样的数据授权模式。如区分公益性使用的免费或低价授权与商业性使用的差异化收费授权,这一点可借鉴部分文博机构对藏品图像

采用的“知识共享协议+商业许可”并行模式。又如,积极参与数据交易市场试点,将经过脱敏、增值处理的非敏感档案数据集,在政府主导或监管的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需要注意的是,这要求保管部门完成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与合规审查,是要素化流通的高级形式。

无论以何种形式推进档案文献遗产的市场化运营,都应始终明确公益反馈机制的必要性。换言之,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要素化所得的利润须设立专项,定向用于珍贵档案的抢救性保护、基础数据资源的免费开放扩容或面向公众的教育项目,确保经济效益最终服务于核心公共使命。

4.2 融合数字人文与文创产业,推动知识服务升级

本路径强调档案数据作为“知识母体”与外部领域的跨界融合,驱动知识生产与文化创造模式的革新。具体而言,档案文献遗产可进一步支撑人文社科与数字人文研究,并赋能文化创意产业与数字内容生产等。

数据要素化视角下,档案文献遗产是巨大的文化资源宝库,有条件超越数字化副本利用的单一形式,主动成为研究基础设施和合作伙伴。如保管部门可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建,基于特定专题提供定制化数据清洗、标注、建模服务,共同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同时保管部门可从联合项目经费、成果署名、衍生数据产品共有产权中获益。又如基于档案文献遗产打造数字人文研究平台,构建集成档案数据、分析工具和协作环境的档案数据平台,为全球学者提供一站式研究服务,上海市档案馆建成的“跟着档案观上海”数字平台即为典型示范^[20]。

同时,要素化转型使档案文献遗产数据作为核心IP和创意素材库,深度融入文化产业价值链。打造“档案IP”的思路可从档案文创产品开发应用于此:系统梳理档案中具有改编潜力的真实故事、人物、事件、场景,形成IP资源包,并积极向影视、戏剧、游戏、动漫公司进行推介和授权^[21]。国内已有档案馆、博物馆等参与纪录片或影视剧目的成功经验。保管部门可在参与前期策划过程中提供史料考证服务、分享版权收益,或与科技公司、设计团队合作,基于档案数据开发沉浸式历史展览、交互式叙事游戏、虚拟文化遗址重建等。可参考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故宫小程序,将文物数据转化为大众可亲身体验的数字内容典范。

档案文献遗产的融合创新开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档案内容的知识服务创新。因此,保管部门在与商业机构合作时,必须建立内容真实性审查机制;

在鼓励创意转化的同时,防止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过度娱乐化消费,维护档案的权威性和文化内涵不受损害。

4.3 利用众包与沉浸式教育,赋能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

本路径聚焦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方面的显著社会效益。档案文献遗产鲜明的公共文化性使其参与公众文化建设、开展公民数字教育成为可能,同时,在数据化手段辅助下,公众接触和理解历史文化的门槛能够进一步降低。这一路径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大部分服务仍应坚持普惠性、基础性公共产品定位。

当前,档案文献遗产赋能社会治理最可行的方式是众包模式,即各类参与式档案项目。通过在线平台邀请公众参与档案转录、标签标注、老照片地点辨认等任务,既能提升档案文献遗产的数据质量,还能增强公众的文化归属感和参与感。另外,开发沉浸式教育产品的应用亦渐成趋势,通过为中小学历史、语文、社会等课程开发数字教学套件、虚拟现实现场教学课件等方式,档案文献遗产能够充分浸润公众生活^[22]。这既是履行公共教育职能的体现,未来也可通过政府采购或学校订阅模式形成可持续的微利服务,反哺档案部门继续做好资源开发、赋能社会治理。

4.4 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与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参与数据要素生态构建

参与数据要素生态构建是着眼发展趋势的未来设想,但仍需将其纳入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实现的蓝图中加以构想,其根本即在数据开放贡献与档案部门核心能力保有之间取得平衡。

一方面,融入国家与行业数据平台,使档案文献遗产主动对接更高级别的数据流通机制是未来数据要素化的必要部署。首先,积极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标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标准,将标准化的档案元数据与核心内容数据,按照统一规范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和数据中心,成为国家文化资源总库和文化数字底座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其能在更广范围内共享和增值。其次,在文化遗产相关行业共建行业知识平台,即与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主体共同构建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共同体”或其他协同机制。在尊重各自数据主权的前提下,在共同体内交流技术、共享机遇,实现跨机构数据资源的联合检索与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文化遗产服务^[23]。

另一方面,融入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使档案

文献遗产成为能够贡献高质量训练数据、支持大模型开发的可靠数据资源。数据要素化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可提供垂类模型的精调训练数据。如将经过严谨校勘、标点的古籍文本,规范标注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的数据集作为训练专业领域大模型的高质量、稀缺性训练语料。此时,保管部门可通过提供数据换取模型的使用权或合作开发权益。另外,档案文献遗产数据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厚历史智慧,能够在贡献语料的同时输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充分彰显档案行业在未来技术发展中的数据贡献与文化担当。

总结而言,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多层次、多模式的系统工程,以上四条路径相互交织、相互赋能。市场化运营为融合创新与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和经验;融合创新反过来创造更丰富的市场化产品;公共服务夯实社会基础和价值认同;而参与生态构建则为其他路径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势能。四种路径的协同推进之道在于,要始终以激活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为根本宗旨,以审慎而创新的制度设计为保障,让数据要素化成为档案事业在数字时代

传承文明、启迪智慧、赋能发展的强大引擎,而非单纯逐利的工具。

5 结语与展望

数据要素化视角为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释放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通过价值重构、数据化与要素化转型,以及多路径的价值实现探索,档案文献遗产有望从历史的“保管库”稳步迈向数字经济的“价值源”。展望未来,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可信、智能的档案文献遗产数据空间。这一空间并非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由标准协议、共享平台、治理规则与协作网络共同构成的数字生态系统。未来,档案文献遗产不应也绝不会在澎湃的数据洪流中黯然失色或沦为附庸,相反,其具备充分条件转化为国家乃至全球数据要素体系中一个特色鲜明、价值独特的关键组成部分。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档案部门与其他文化部门、学界与业界、业务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持续开展对话,共同书写文化遗产在数字文明中的新篇章。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国家数据局.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一批)[EB/OL].(2024-12-30)[2026-07-25].https://www.nda.gov.cn/sjj/zwgk/zcfb/1230/20241230160715745237413_pc.html.
- [2]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数据要素化 100 问:可控可计量与流通交易[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
- [3] 周耀林,吴化.数字人文视野下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5):123-129.
- [4] 王玉珏,许瑞婷,焦俊杰,等.档案文献遗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路径研究[J].北京档案,2026(1):7-16.
- [5] 杨鹏,金波.档案数据要素论:资源要素化与要素价值化[J].情报科学,2024(10):38-46.
- [6] 潘莺,吕永明,赵喆.档案数据价值实现的再认识——对南京市非遗档案数据资产转化工作的思考[J].档案与建设,2026(1):84-87.
- [7] 国家档案局.上海证券交易所档案(1881—1951)[EB/OL].(2025-12-24)[2026-07-25].<https://www.saac.gov.cn/mowcn/cn/6sbs/202512/fc9d18ba82f44ecba9286b94f09fbcc4.shtml>.
- [8] 卜鉴民,邵亚伟,吴飞.面向公众教育的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实践图景与未来展望[J].档案与建设,2022(1):25-28.
- [9] 秦晓珠,张兴旺.数字孪生技术在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中的应用[J].情报资料工作,2018(2):103-111.
- [10] 向安玲,高爽,彭影彤,等.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1):30-38.
- [11] 刘洪.数智技术赋能中医药档案文献遗产价值活化——以《中药大辞典》原稿为例[J].档案与建设,2025(11):103-110.
- [12] 肖隽.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档案开发利用的路径与方法研究[J].山西档案,2024(4):152-155.

- [13] 吴英卓. 红色档案数据要素的公益性开发与市场化利用平衡机制 [J]. 山西档案, 2026(3):129-131.
- [14] 聂云霞, 张雯. 档案数据确权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J]. 浙江档案, 2025(10):16-20.
- [15] 南京馆率先在国内开展非遗档案数据资产转化试点 [EB/OL]. (2024-06-14)[2026-07-28]. https://www.dajs.gov.cn/art/2024/6/14/art_40_42119.html.
- [16] 胡磊, 薛双, 张蒙, 等. 档案元数据标准与互操作性在构建跨机构数字档案平台中的关键作用研究 [J]. 机电兵船档案, 2025(2):77-81.
- [17] 陈飞. AI 大模型时代档案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景、挑战与策略研究 [J]. 档案管理, 2025(4):44-47.
- [18] 王天琪, 祝鑫一. 数智赋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 特征、风险及其防范 [J]. 档案管理, 2025(6):28-32.
- [19]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 [EB/OL]. [2026-04-27]. <https://data.library.sh.cn/index>.
- [20] 付雅明, 普欣宇. 数字叙事理论下多模态档案资源开发模式探究——以“跟着档案观上海”数字人文平台为例 [J]. 图书馆杂志, 2025, 44(5):97-109.
- [21] 许瑶. 文旅融合背景下档案文化 IP 的构建路径探析 [J]. 北京档案, 2024(7):43-46.
- [22] 徐鑫鑫. 数字人文旅游视域下的档案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J]. 山西档案, 2025(2):80-83.
- [23] 张笑玮. 数据要素视角下的档案文化资源开发: 价值阐释、逻辑理路与优化策略 [J]. 档案与建设, 2025(8):33-42.

Value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Elementalization

ZHANG Yi

(Institute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50)

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data has become a key production factor,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static historical carriers to dynamic data ass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element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cultural value and informational value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constitute its inherent foundational attributes. Driven by data elementalization, these two values undergo valu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de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thereby giving rise to asset value as a new value form.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high-quality digital twi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echnologies,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can achieve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physical entities to intelligent data entities, and further complete elemen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ights confirm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pathways for value realization: first, realizing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s through data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licensing; second, promoting knowledge service upgrading by integrating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rd, empowering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crowdsourcing and immersive education; and fourth, integrating in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big data system and large-scale AI model training to build an open and trustworthy archival data eco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ata elementalization;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Value reconstruction; Value transformation; Value realization; Data assets

三权分置视角下 IPFS 技术在档案数据资本化中的应用研究

许夏媛¹ 王吟² 薛彤³

(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 518000;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518000;

3.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00124)

【摘要】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对档案数据资本化转型提出了制度与技术协同创新的迫切需求。“三权分置”产权制度虽为档案数据流通构建了基本框架,但其落地面临权属锚定难、资产存续风险高与流通信任成本大的三重技术适配困境。基于“制度—技术”协同演化视角,本研究系统论证星际文件系统(IPFS)作为新型分布式技术底座对上述困境的破解路径:在基础层,IPFS通过内容寻址与分布式存储实现数据资源持有人的可信确权与持久存续;在交互层,结合智能合约与隐私计算技术支持数据加工使用权的安全可控流转;在价值层,依托非同质化通证与去中心化自治机制推动数据产品经营权的生态化创新。IPFS能够系统赋能档案数据完成“资源—资产—资本”的价值跃迁,为构建可信数据空间、激活档案要素价值提供了兼具制度兼容性与技术可行性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三权分置; 星际文件系统; 档案数据; 数据资本化

【作者简介】许夏媛,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馆员,研究方向为电子档案管理;王吟(通信作者),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研究馆员,邮箱:774790920@qq.com,研究方向为企业档案管理;薛彤,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企业资产管理。

1 引言

数字中国战略下,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档案数据因兼具原始记录性与强可信溯源能力,被视为数据要素市场中具有高价值密度的特殊资源^[1]。其内涵可概括为档案的数据化与数据的档案化两个维度^[2-3]。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档案数据在要素市场化进程中,既要遵循数据流通的一般规律,又必须坚守档案管理的专业原则。

围绕档案数据资产化与三权分置,学界已形成三条主要研究脉络。制度适配层面,研究揭示了三权分置有助于解构传统所有权结构,为平衡多元主体利益提供了制度工具^[4-5];市场化治理层面,聚焦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与收益分配困境^[6],并引入信托机制构建运营框架^[7],但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仍是争议焦点^[8-9];价值实现层面,学者们系统分析了档案数据要素化的障碍与全链条赋能路径^[10]。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制度设计,较少从技术架构层面切入产权运行与底层技术的适配问题。本研究立足“制度—技术”协同演化视角,构建“基

础层—交互层—价值层”三层框架,探讨IPF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 IPFS)如何支撑三权分置下档案数据从资源向资本的全过程跃迁。

2 档案数据资本化的现实困境与 IPFS 的技术回应

2.1 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与价值演进逻辑

为破解数据要素流通中长期存在的权属模糊、流通壁垒与价值释放不足等制度性难题,我国在《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中创新性地提出了数据资源持有人、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该制度旨在通过结构性分置数据产权,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的安全有序流通与高效市场化配置。

在此制度框架下,档案数据的价值实现呈现出“资源—资产—资本”的演进逻辑。资产化是指将档案数据从原始资源状态转变为可识别、可计量、

可确权、具备经济价值的资产，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权属清晰、价值可评估、可依法纳入资产核算与管理体系。资本化则是在资产化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通过市场化流通、金融工具应用与生态化运营，提升数据的流动性、可交易性与增值能力，使其从静态资产转变为可动态配置、可持续创造收益的生产性资本。本文所探讨的“档案数据资本化”，正是聚焦于如何依托三权分置与 IPFS 等技术，推动档案数据完成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全程跃迁。

2.2 制度落地的三重技术适配困境

然而，数据二十条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在落地档案领域时，面临了深层次的技术架构适配性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三权分置要求权利能够精准、动态且可验证地附着于数据本体之上，并支撑跨主体、高频次的权利流转与价值交换；而传统档案管理所依赖的中心化存储、位置寻址的技术范式，其设计逻辑源于封闭、可控的保管环境，与开放、流动的要素市场要求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三重交织的困境。

2.2.1 权属锚定困境

当前档案所有权制度侧重于对实体载体的控制，而缺乏对信息内容使用权的独立、可验证的法律承载机制，导致数据资源持有人的界定缺乏稳固、自证的技术基础^[11]。许晓彤提出的“电子文件—电子证据保管链”模型表明，电子文件证据效力的实现依赖于从形成到法庭使用的全链条可验证性——权属信息必须与数据本体全程绑定且可追溯，任何环节的断裂都将影响其证据资格与证明力^[12]。这一要求揭示了权属锚定困境的核心所在：当权属信息的验证仍依赖特定管理主体或中心化系统时，跨机构、跨场景的独立追溯便难以实现，数据资源持有人的法律与技术自证能力因此受到根本制约。

2.2.2 资产存续困境

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以其能够被多元主体持续发现、访问与获取为基本前提。传统中心化存储架构将数据的可访问性系于单一机构所掌控的服务器与访问入口。即使按照“一用两备”的要求实现了物理副本的异地分布，所有副本仍处于同一信任域内，其可访问性始终随该机构的存续状态而波动。一旦该机构停止运营或变更系统，所有副本的访问路径即同时中断，外部需求方无从发现和获取数据。这种控制权的集中化与访问路径的单源性，导致数据资产难以真正脱离其原始保管机构而独立参与要素市场的流通与配置。

2.2.3 流通信任困境

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依赖于透明、自动化、可验证的信任与执行机制，传统技术手段难以实现细粒度的使用权控制，导致数据供给方因担心控制权丧失而产生不愿流、不敢流的审慎心理，数据加工使用权与产品经营权的实现因而受阻^[13]。实践中，杭州市在构建数据共享平台初期，就曾因缺乏有效的技术信任机制，导致企业对数据共享持观望态度，平台流通效率低下^[14]。这一案例深刻揭示，可信的技术底座是打通数据要素流通堵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

2.3 IPFS 作为新型技术底座的可能性

因此，寻找并构建能够有效支撑三权分置运行、系统性摆脱上述三重困境的新型技术架构，已成为推动档案数据从资源向资产乃至资本跃迁、实现其生产要素价值必须攻克现实课题。

星际文件系统作为一种基于内容寻址与分布式存储的新一代网络协议，其技术特性与三权分置的内在要求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从技术原理来看，IPFS 是一种点对点的分布式文件存储与共享协议，其核心设计理念是用内容寻址替代传统的位置寻址。在传统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中，用户通过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定位资源，资源的位置决定了其身份；而在 IPFS 中，每个文件通过密码学哈希运算生成唯一的内容标识符（Content Identifier, CID），用户通过 CID 请求内容，网络中的分布式哈希表（Distributed Hash Table, DHT）帮助定位存储该内容的节点。这一机制确保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 with 高可用性，任何内容变更都会导致 CID 改变，而数据存储于全球任意节点消除了单点故障风险。

在应用层面，IPFS 已在数字藏品存储、科学数据共享及互联网档案馆网页存档等场景中获得初步应用。就长期保存而言，IPFS 本质上是一种存储协议，其数据能否持久存续取决于网络中是否有节点主动提供存储服务，但与文件币（Filecoin）等激励层配合后可构建具备经济可持续性的长期保存方案。总体来看，IPFS 作为底层架构具备支撑长期保存的技术条件，但仍需辅以合理的存储激励与副本管理策略。

IPFS 的技术特性与三权分置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为档案数据治理技术底座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适应治理范式所需的技术底座不能仅停留于对原有中心化系统的修补或升级，而应实现底层逻

辑的根本转换,即从基于位置寻址与中心控制的传统计算范式转向基于内容寻址与去中心化验证的新型范式。这一转换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将社会制度与经济规则内化为可编程、可验证技术协议的分布式系统。在此意义上,IPFS 的价值已超越工具层面,成为支撑档案数据治理范式转型、推动三权分置落地的关键性技术底座。

3 IPFS 赋能档案数据资本化的三层实现路径

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在于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清晰界定。只有先在技术上可信地锚定数据归谁所有,后续的使用权流转与经营权实现才具有稳固的产权基础。由此出发,IPFS 对档案数据资本化的赋能可沿“基础层—交互层—价值层”三层结构逐级展开:基础层解决“是谁的”这一前提问题,交互层解决“怎么用”的核心问题,价值层解决“如何增值”的目标问题。

3.1 基础层: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技术确证

档案数据持有权的确立面临两大核心挑战:一是如何实现权属信息的不可篡改且与数据本体强关联;二是如何保障作为权利客体的数据本身的长期、可靠存续。IPFS 通过其内容标识符机制与全球分布式存储网络,为这两大挑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3.1.1 基于内容标识符的权属可信锚定

在数字世界中,证明一份数据归谁所有,传统上依赖于数字签名与中心化的证书颁发机构体系。这套体系的证明链条复杂,存在单点失效风险,权属信息与数据本体的关联关系容易因系统迁移、格式转换或人为失误而断裂,导致权属悬空现象。IPFS 的内容标识符机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数据存入 IPFS 网络时,系统通过加密哈希函数生成唯一的 CID。CID 具有唯一性与敏感性特征,任何微小变动都会导致 CID 彻底改变,且 CID 的生成无需任何中央机构背书,任何节点均可独立验证。

由此可构建档案数据的内容可寻址机制。档案机构将电子档案存入 IPFS 网络获得唯一的 CID 后,将形成单位、归档时间、保管期限、权利主体、授权链等权属要素与该 CID 进行关联。这种关联并非存储在易变的中心化数据库,而是通过写入区块链实现不可篡改绑定。数据经哈希运算生成 CID 后,通过与链上权属声明的绑定,实现数据与权属的全程可信对应。验证方可直接凭借 CID 追溯完整的链

上权属记录,这一机制正契合了许晓彤所强调的“电子文件—电子证据保管链”的全链条可验证性要求,提供了一条无需第三方中介的技术实现路径。

3.1.2 分布式网络保障客体持久存续

在 IPFS 网络中,数据被自动分割成多个带有 CID 标识的数据块,冗余存储于全球独立节点,由 DHT 记录存储位置,检索时从多个节点并行获取重组。这一设计意味着系统无单点故障,没有哪个中心服务器是必不可少的,只要网络中有足够多的节点存储了该数据的副本,数据就依然可访问。同时,数据存续不再依赖特定机构,只要网络中存在副本节点即可访问,为档案提供了超越机构寿命与地域限制的存续保障。

为了进一步激励网络节点提供稳定、可靠的长期存储服务,IPFS 生态中诞生了 Filecoin 区块链存储市场。在 IPFS 之上构建了一个激励层,将存储服务市场化。档案机构可发布存储订单,指定存储时长和副本数量,存储提供者通过密码学证明持续存储以获得代币奖励,未能证明则受罚并损失抵押的代币。这一模式为档案数据提供了一种可量化、可审计的长期保存方案,显著降低了因单点故障或机构运营中断导致的数据丢失风险。

3.2 交互层:数据加工使用权的可控实现

数据资源持有权的确立为数据流通奠定了基础,而数据价值的真正释放,则有赖于数据加工使用权的安全、可控、高效流转。三权分置鼓励数据在合规前提下被多方加工利用,但档案数据往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与国家安全,传统的粗放式共享模式难以为继。IPFS 与智能合约、隐私计算等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构建精细化、自动化、可验证的数据使用权流通机制开辟了新路径。

3.2.1 基于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授权

传统的数据授权流程依赖人工审核与执行监督,效率低下且难以适应按次计费、限时使用等动态授权场景。智能合约将授权逻辑转化为可自动执行的代码,实现授权管理的自动化与透明化。

档案机构将档案数据存入 IPFS 获得 CID 后,围绕该 CID 部署智能合约,以代码形式规定访问条件、使用权限、期限次数、收费标准及合规条款。使用方向该智能合约发起交易并附上凭证,合约自动验证条件后执行授权操作。全程无需人为干预,执行记录永久上链,可审计可追溯。这一模式使档案机构能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实现差异化授权,有效破解了数据供给方因控制权不可细化和不可审计而产生的流通顾虑。

3.2.2 融合隐私计算的安全价值释放

对于包含高度敏感信息的档案数据，即便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严格的访问控制，一旦原始数据被授权方获取，仍面临内容泄露与二次传播等合规风险。IPFS 可与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同态加密等隐私计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协同计算环境。

在跨机构联合统计场景中，各方将本地数据的加密摘要或统计向量上传至 IPFS 网络，约定一个安全多方计算协议，在密文状态下协同完成计算任务，最终仅输出聚合结果。在跨馆分布式模型训练中，可采用联邦学习框架，各馆在本地训练后仅上传模型参数更新，原始档案数据始终留在本地。在需要保护隐私的查询服务场景中，档案馆可采用同态加密算法对索引数据加密后存入 IPFS，获得授权的用户提交加密查询指令后，由计算节点在密文上直接执行检索操作，并将加密结果返回，仅持有解密密钥的授权用户可解读。通过上述技术融合，IPFS 进化为保障数据流通全生命周期中安全合规的信任技术底座。

3.3 价值层：数据产品经营权的生态化创新

数据产品经营权是三权分置框架下产权链条的最终环节，也是数据要素实现资本化增值的关键。IPFS 与区块链通证经济、去中心化治理模型的结合，为档案数据产品的资产化标识、市场化交易与生态化协作提供了创新工具。

3.3.1 内容标识符作为数据产品的原生资产标识

在数字市场中，数据产品需具备唯一、可验证且难以伪造的身份标识与产权凭证。CID 可确保数据本身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但其本身仅作为内容的“数字指纹”，不具备可交易性。因此，CID 需与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 NFT）相结合，由 NFT 在区块链上作为权属凭证，并在其元数据中永久指向对应数据的 CID。CID 如同数据的“身份证号”，NFT 则相当于“数字产权证”，可在链上交易流转。这一“内容与权证分离”方案尤其适用于具有独特文化、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档案数字资产。档案馆选取高价值档案进行数字化并存入 IPFS 获得 CID 后，在区块链上铸造 NFT 并在元数据中永久指向这个 CID。使 NFT 成为该档案数字

资产在法律与技术双重意义上的所有权凭证。

这种“内容与权证分离”模式的价值是多维度的。首先，NFT 的每次交易均被不可篡改地记录于区块链，形成完整的产权流转链。其次，代表所有权的 NFT 具有唯一性，这种基于共识的稀缺性是数字资产市场价值的基础。最后，智能合约可内置版税机制，在 NFT 转售时自动将一定比例收益支付给相关权利方，该模式还可拓展至数据产品领域。例如，档案馆可将专题研究数据集打包生成 CID，并发行对应的数据资产通证，在合规的数据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拓展档案数据资本的金融属性与流动性。

3.3.2 基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分配与协作机制

数据产品的商业化运营往往涉及档案馆、技术开发方、平台运营方、用户社区等多方协作。IPFS 生态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理念的结合，为构建透明、高效、激励相容的协作生态提供了制度性工具。在构建档案数据开放创新平台时，可设立 DAO 发行治理代币，根据贡献度分配给档案馆、开发者、社区成员等生态共建者。持有代币的成员通过链上投票决定平台重大事项。在收益分配上，智能合约可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案，在收入到账时自动将收益按比例分配给各贡献方。这种基于代码规则与社区共识的模式，极大降低了协作信任成本，激发了网络效应与生态活力。

4 结语

本文在数据要素化背景下，提出并论证了基于三权分置与 IPFS 技术的档案数据资本化转型路径。通过构建“制度—技术”融合框架，明确了档案数据在确权、流转与增值中的实现机制，为激活其要素价值提供了兼具理论前瞻性与实践参考性的解决方案。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与现有档案管理体系、数据交易机制及法律法规的协同落地路径。

本文系 2025 年度广东省档案局科技项目“基于 IPFS 技术的高校学籍档案可信存储与远程利用创新模式研究”（YDK-364-2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尹鑫,李知圻,汪书路.筑牢档案可信数据空间基石——解读《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 年）》[J].北京档案,2026(1):44-49.
- [2] 杨鹏,金波.档案数据论：大数据时代档案学新论域[J].档案学通讯,2025(1):38-45.

- [3] 金波, 杨鹏, 宋飞. 档案数据化与数据档案化: 档案数据内涵的双维透视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2): 3-14.
- [4] 温廷婷. “三权分置” 理念下健康医疗数据共享的纾困路径 [J]. 卫生经济研究, 2025, 42(5): 41-45.
- [5] 加小双, 陈晶晶. 从档案信息资源到档案数据资产: 转型逻辑、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 [J/OL]. 档案学通讯, 1-12 [2026-08-06].
- [6] 张素华, 刘寅.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益分配的实践困境及制度构建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5(5): 35-45.
- [7] 文杰.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困境与市场化构建——以信托机制为例的分析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6(1): 56-67.
- [8] David J. Kusterer, Patrick W. Schmitz. Public goods,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20, 177, 514-532.
- [9] HIRTLE P. Archives or assets? [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03, 66(2): 235-247.
- [10] 黄新荣, 张鑫雨. 档案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J]. 档案学研究, 2025(6): 76-84.
- [11] 加小双, 牛力. 档案所有权的制度结构及其数据资产化转型困境 [J]. 浙江档案, 2025(6): 10-14.
- [12] 许晓彤. 电子文件 - 电子证据保管链研究 [J]. 档案学研究, 2022(3): 108-116.
- [13] 支凤稳, 王杨煜, 王梓萌, 等. 档案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模型构建与路径设计 [J]. 档案学通讯, 2025(6): 21-29.
- [14] 郭一帆. 数据要素市场赋能数字经济: 价值、困境与发展路径 [J]. 财会月刊, 2025, 46(4): 124-129.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PFS Technology in the Capitalization of Archival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ipartite Rights Separation

XU Xiayuan¹, WANG Yin², XUE Tong³

(1. Shenzhen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00;

2. ZTE Corporation ZTE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000;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Abstract: The market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creates an urgent need for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innovation in the cap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al data. Although the "Tripartite Rights Separatio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rovides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tion of archival data, its implementation faces three major technical adaptation challenges: difficulty in anchoring ownership, high risks to asset sustainability, and significant costs in circulation tru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technology" co-evolu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how the 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 (IPFS), as a new distributed infrastructure, addresses these challenges: at the foundational layer, IPFS enables credible verification and persistent preservation of data resource ownership through content addressing and distributed storage; at the interaction layer, it combines smart contracts and privacy computing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secure and controllable circul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rights; at the value layer, it utilizes non-fungible tokens and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innovation of data product operation righ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PFS can systematically empower archival data to complete the value transition from "resource to asset to capital," providing a theoretically viable path with both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technical feasibility for building a credible data space and activating the value of archival elements.

Keywords: Tripartite Rights Separation; IPFS; Archival data; Data capitalization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能力体系、价值导向与推进策略

周林兴 刘诗桦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随着《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深入实施, 文化遗产传播迎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转型机遇。文章以政策为依据, 梳理文化遗产传播发展脉络, 围绕内容创作力、叙事传播力与产业转化力探讨文化遗产在新表达、新体验、新业态中的传播能力; 立足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导思想, 从“在地性”转向“全球性”视角, 阐释文化遗产传播走向全球性资产、全球性对话与全球性流动的价值导向。基于此, 未来应聚焦文化遗产传播主体、传播空间与传播媒介三个维度, 以推动文化遗产传播创造性发展, 提升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国家文化数字化; 文化遗产; 文化传播; 数字传播; 传播媒介

【作者简介】周林兴,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教授, 邮箱: zlx5555@163.com, 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文化、文化遗产; 刘诗桦,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档案文化服务、文化遗产。

1 引言

2002年, 文化部启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计划,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依托公共文化设施, 通过互联网、卫星网、广播电视/数字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新型传播载体,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这一计划是我国开展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早期探索。2005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列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设立特定时间唤醒公众文化记忆, 这意味着国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力量从文化遗产专业保护转向文化遗产全民参与。2022年,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 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 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可见, 文化遗产传播进入以科技深度融合为驱动、以增强文化影响力为核心的新阶段。具体而言, 我国文化遗产传播表现为在地性传播转向全球性传播。一方面, 地方文化遗产作为地方性和独特性文化的象征, 能有效避免全球化浪潮导致

的各地文化趋同和扁平化。另一方面, 面对全球化格局深刻演化的趋势,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与对话资源, 借助数字技术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 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 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

2 文献回顾

在初始阶段, 文化遗产传播被理解为“传播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是传播学理论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这一阶段依据文化遗产“真实、完整”原则, 创新打造以受众为核心的传播平台, “大运河遗产小道”^[1]正是基于此理念, 通过公众参与实践进行理论规划。从拉斯韦尔“5W”模式^[2]、霍尔的编码/解码^[3]等传播学经典理论出发, 阐述大众传媒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机制等有效路径。电视媒体作为当时主流传播渠道, 通过电视节目的方式, 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地将文化遗产信息传递出去^[4], 例如北京卫视《传承者》, 打破了以往以“高冷”为主调的节目风格^[5]。除电视外,

报纸和网络文本也是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载体，但仍以单向线性模式为主，内容与形式单一，受众互动与参与程度较低^[6]。此时，早期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开始探索，数字影像、三维虚拟等技术分别应用于无锡运河文化遗产^[7]、广西壮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中^[8]。

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兴起，文化遗产除原先口头、纸张、舞台、影像等传统媒体展示形式外，还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富媒体、数字舞台、网络电视、3D/4D 影院等进行传播^[9]。有研究剖析了媒介如何激发公众参与式传播，表明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 UGC 内容生成、弹幕互动、社群分享等方式，成为文化遗产阐释者与传播者^[10]，使一些小众化文化遗产得以展示，如古琴、川剧、盘纸、皮影戏等^[11]。尤其在全球性传播中，传播主体进一步多元，形成国务院组成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海内外非遗爱好者、中文教师和志愿者等传播共同体^[12]。以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为例，它通过传播文化对集体记忆进行编码，展示物质文化遗产、扩散民族集体记忆，使文化遗产与公众发生关联，有助于构建民族国家认同感^[13]。

当前，研究进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赋能为特征的“数智融合”新阶段。通过智能化媒介和智能化平台突破人们对文化传播认知结构及构建新的传播形态^[14]，例如利用 AR 扩展受众对文化遗产的直观感受，更好地展示文化遗产本体^[15]。面对非遗数字化传播中存在过度娱乐化、传播方式单一等问题^[16]，传播形式从知识传递转向文化叙事，以“数字敦煌”知识图谱应用为例，阐释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服务运作过程^[17]，实现文化内涵深度解析。《逃出大英博物馆》等网络微短剧通过“策展流”框架实现内容共创，进一步提出文化遗产影视化传播模式^[18]，景德镇陶瓷通过矩阵式传播讲好陶瓷故事^[19]。在国际传播上，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践行“天人合一”理念传播，增进国际社会认知^[20]。

3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能力体系

《意见》确立了“科技支撑，创新驱动”的核心原则，系统部署了资源关联、基建夯实到业态创新的任务。为有效响应战略对“创新文化表达方式”“增强文化传播力”“培育文化新业态”的要求，笔者提出文化遗产传播需构建以内容创作力、

叙事传播力与产业转化力协同共进的能力体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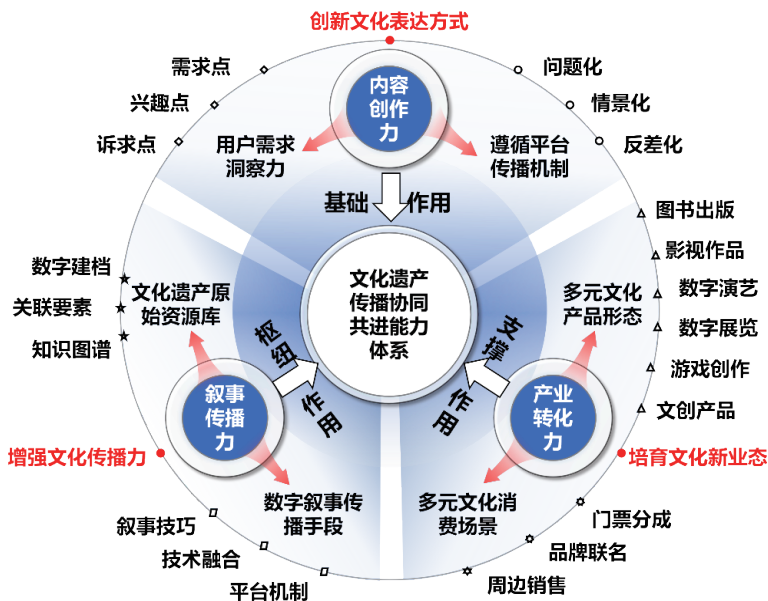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能力体系

3.1 构建文化遗产新表达的内容创作力

《意见》注重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以现代理念审视当代价值，摒弃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和负能量，以贴近现代生活实际的语义表达和传播^[21]，有助于推动文化遗产在数字环境中“被看见”。由此，文化遗产机构需构建文化遗产新表达的内容创作力，贯彻《意见》对文化数字内容需求实时感知、分析和预测的要义，加速探索平台化、集成化、场景化的增值服务。据 QuestMobile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10 月，抖音以 9.07 亿规模领跑行业，同比增长 15.4%，小红书以 11.1% 的增速达到 2.28 亿用户，微博、快手、哔哩哔哩分别以 4.48 亿、4.62 亿和 2.25 亿规模构成第二梯队^[22]。以抖音为例，其用户平均划走一条视频的决策时间仅为 1.7 秒，面对平台高度竞争、用户注意力分散的传播环境，文化遗产内容创作力决定了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中是否被接受并进入公众视角。这意味着文化遗产传播内容在起点若无法抓住用户，便难以进入后续传播环节。因此，文化遗产传播的内容创作力在数字化传播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方面，深化用户需求洞察力，丰富文化遗产传播内容的新表达。基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立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其时代局限的价值^[23]，文化遗产内容创作应致力于创造性转化，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中提炼精髓，注入与现代生活场景密不可分的新载体、新语境与新叙事中。在实践层面，“文化遗产+”跨界融合是这一转化的关键路径，文化机构应有意识运用计算

传播学方法,运用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和数据科学等工具,挖掘用户对文化遗产内容的需求点、兴趣点、诉求点,以“文化遗产+游戏”“文化遗产+服饰”“文化遗产+影视”“文化遗产+小说”等跨界融合,催生文化遗产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另一方面,遵循平台传播机制,强化用户对内容注意力的捕获能力。遵循短视频“黄金3秒”原则,开篇通过强烈的视觉震撼、认知反差或情感悬念,在短时间内将用户引入专注的心流状态。在表达层面,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潜能,借助超高清扫描、沉浸式三维重现、空间音效等手段,以问题化、情景化、反差化方式将文化遗产内容嵌入社交平台,引发用户认同。

3.2 激活文化遗产新体验的叙事传播力

《意见》强调利用新型体验技术发展数字化文化新体验,这与激活文化新体验的叙事传播力的构建不谋而合,契合《意见》的目标指向。所谓叙事,就是通过情节、场景、来龙去脉等故事要素有目的地说事^[24],用倒叙式、领悟式、失得式、悬念式、集锦式和对比式等表达手法,以讲故事方式对文化遗产内容加工重组,辅以细腻、生动的表现形式^[25]。由此,文化遗产机构需激活文化遗产新体验的叙事传播力,将文化遗产知识转化为具有情感温度与现实指向的叙事文本,激发受众对文化遗产的主动传播意愿。但就现实而言,技术驱动下的传播由众媒时代跨越到智媒时代,对整个传播生态和格局都带来了改变^[26]。由此,文化遗产机构应综合运用数字技术以超越单一文本表达,转而构建真实、可信、可重复、可验证、可持续的叙事传播体系。利用多种媒介形象表现文化遗产过去、现在、将来发生的变化,通过多媒体展示和交互方式减轻对文字性叙事的认知负担^[27],调动用户多重感官参与,增强用户沉浸感与体验感。因此,文化遗产传播的叙事传播力在数字化传播中具有枢纽性作用。

一方面,以叙事要素为基础,构建文化遗产原始资源库。立足于数字影像采集、三维建模与虚拟复原、数据标注等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建档”,将分散于不同实体中的有关人物、工艺、技艺、历史等关联要素汇聚起来,赋予不同时代、不同材质、不同功能、不同文化的语义信息,形成具有叙事脉络的文化遗产知识图谱。如截至2025年9月,敦煌研究院完成212个洞窟的三维重建、169个洞窟的虚拟漫游,数字化数据总量达4PB,同时“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发布敦煌文化经卷9900多卷、图像60700多幅,经卷内容识别8400万字^[28],形成丰富的资源库。另一方面,以叙事技巧为中介,

构建数字驱动的叙事传播手段。在拥有资源库基础上,重新激活悬念、对比、突转、抑扬等传统叙事技巧,与算法推荐、数据分析、交互设计等技术融合,洞察不同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社群文化特质与用户接受心理,选择可持续的叙事传播手段。

3.3 赋能文化遗产新业态的产业转化力

《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演艺等传统业态升级,调整优化文化业态和产品结构。就现实而言,无论保护中的利用还是利用中的保护,文化遗产都成为一种资源和文化资本,被赋予商品属性,遵循市场原则^[29],其既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基因,又被纳入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体系中。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产业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其中文化传播渠道资产总值2859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0%,营业收入21421亿元,比上年增长7.7%^[30]。在此背景下,文化遗产机构需具备赋能文化遗产新业态的产业转化力,以深厚的文化基因为内核,推动文化遗产向市场化开发与可持续再生产的文化资本与生产要素转变,将具有高度文化附加值与情感认同基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文化资产,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巩固与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因此,文化遗产传播的产业转化力在数字化传播中具有支撑性作用。

一方面,以数字资源为核心,推动文化遗产传播成果向多元文化产品形态转变。通过价值链延伸、业态融合与品牌化运营等,对文化遗产元素再设计与再表达,融入图书出版、影视作品、数字演艺、数字展览、游戏创作、文创产品等形态中,推动文化遗产以可购买、可使用、可体验的多元形态融入产业体系。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到第四季,以5分钟一集的微记录体量,不仅在国内“C位出圈”,也成为海外观众追捧的“爆款”^[31]。另一方面,以场景体验为导向,推动文化遗产传播空间向多元消费场景转变。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举办展览2.3万场^[32]。可见,依托多类型展演活动,文化遗产正加速传统展示空间向多元场景转换。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借助新型媒介形态,将文化遗产嵌入旅游、教育、演艺等场景,与影视、动画、时尚、设计、游戏等产业融合,通过门票分成、品牌联名、周边销售等方式推动文化遗产传播空间进入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4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价值导向

在明确文化遗产传播的能力构建后，其价值导向亦需在《意见》的指导下推动，着眼于文化遗产传播从“在地性”转向“全球性”。这种转向不仅是技术赋能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文化瑰宝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一部分，有助于将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价值导向如图 2 所示。

4.1 从在地性资源到全球性资产：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增值

传统意义上，文化遗产依赖物理空间与在地语境，其价值实现受制于地域边界、承载能力及保护条件，使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在地性整体意义，造成碎片化和同一化问题^[33]。随着数字时代到来，数字技术推动文化遗产从地方固有文化资源转变为可流动、可估值、可交易并持续衍生价值的全球性数字资产。这一转化并无削弱文化遗产的在地性整体表达意义，反而通过高精度数字记录与场景化还原，更系统、完整且准确传播在地文化。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体系，包括 41 项世界文化遗产、25 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42 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数量庞大的国家与省级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国悠久文明的见证，也构成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背景下，文化遗产逐步突破地域限制，完成从“在地性资源”向“全球性资产”的范式转变。具体表现为内在的固有的、传承于过去、生存于现在、持续于未来的文化价值，外在的衍生的、创生于需求、运作于交易、终结于

收益的经济价值，介于两者间以能动的人作为关照对象的体验价值^[34]。数字增值的本质正是通过技术手段，将文化遗产嵌入全球经济网络，实现从民族瑰宝到世界资产的跨越。

4.1.1 以大数据体系建设推进文化遗产数据资产化

《意见》明确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加工、挖掘与数据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要求将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可见，《意见》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与资产化价值转化指明了发展路径。根据《意见》要求构建文化遗产大数据体系，核心在于数据本身，其生命周期包括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资源资产化、数字资产服务化三阶段^[35]，通过对大数据管理全链条的系统性建设，可充分释放文化遗产数字资产增值服务潜力。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采集、三维建模、高清影像技术还原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纹理、色彩，利用数字化信息获取技术、多媒体虚拟场景建模技术再现场景、事件、过程等，也有助于推动文化遗产从在地性资源走向全球性资产，实现文化遗产数字资产增值。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其于 2018 年实施“智慧国博”建设工程，成立数据管理与分析中心从事数据管理工作，初步构建了“采—存—管—用”全链条文化遗产大数据体系^[36]。

4.1.2 以全球产业体系建设拓展文化遗产国际增值

《意见》强调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将文化遗产嵌入全球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经济体系中，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数据显示，2025 年我国文化产业总资产 374474 亿元，文化核心领域及文化相关领域资产分别为 294145 亿元和 80329 亿元，其中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

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6 个行业^[37]。可见，我国文化产业资产化运营为文化遗产资产化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然而，目前我国文化遗产在全球产业体系中转化动力稍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推动文化遗产资源国际合作与文化产业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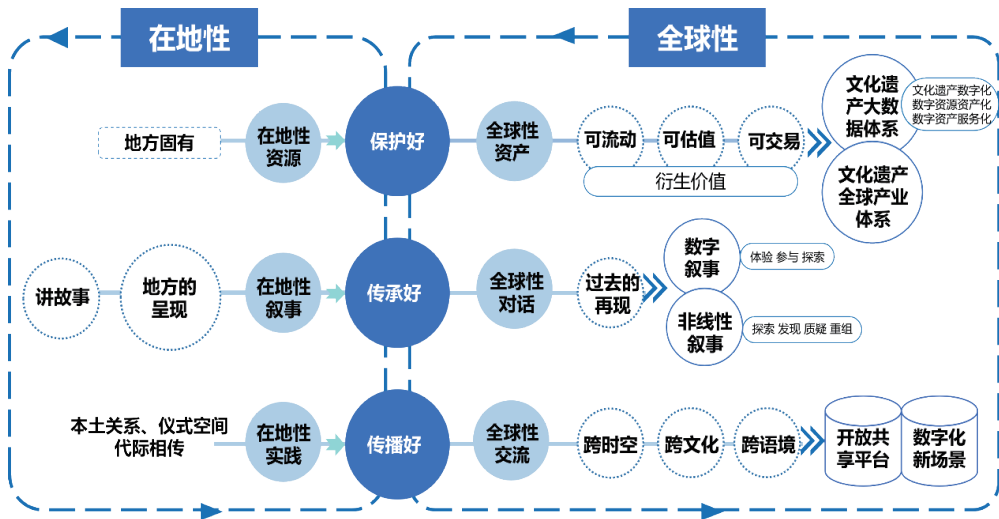


图 2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价值导向

国联动,成为拓展文化遗产国际增值的关键措施。结合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与国际博物馆、文化机构和创意产业合作,关注全球文化市场需求趋势,共同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形式,提升国际认知度与文化吸引力。

4.2 从在地性叙事到全球性对话: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桥梁

《意见》注重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为文化遗产从在地性叙事到全球性对话提供了目标指引,表明文化遗产不应止于在地叙事,应指向全球对话与共享。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8],所谓中国的地方感就是乡土感,基于特定文化景观与表征展演,文化遗产在实现“过去的再现”之同时,也促成了一种“地方的呈现”^[39]。梳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发现,传播从历史文明单向叙事向多元文化全球表达转变。1987年列入名录的长城、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塑造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近年来,福建土楼、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鼓浪屿等后续新增世界文化遗产,则聚焦展现不同地域、族群、乡土社区内部人文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独特文化内涵。可见,从展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普遍文明价值到突出地方特色转变,是全球在地化的一种体现。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为维持在地性与全球性相对稳定,回归生活本身^[40],推动文化遗产在地全球化,符合我国文化遗产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

4.2.1 以数字叙事赋能塑造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标识

《意见》强调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立足《意见》发展要求,打造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标识,突破文化遗产在地叙事表达,聚焦文化遗产全球叙事对话,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遗产传播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对文化遗产蕴含信息与知识的洞察、呈现与共生发展^[41]。文化遗产具有“受损即消失”的基本特征,作为文明资源在受到损坏和破坏后,会淡化其承载的文明特征和文明记忆^[42]。截至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列出53处濒危遗产,其中包括39项文化遗产,正面临武装冲突、无序开发、污染、气候变化、野生动物减少以及旅游业压力。如长达14年的内战,导致叙利亚6处文化遗产全部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数字叙事赋能文化遗产传播成为赓续文明的必然路径。具体而言,依托交互式叙事、跨媒体叙事与虚拟现实叙事等数字手段,将文化遗产相关主体、时空、人物、事件和关系^[43],转化为

可体验、可探索、可参与的多模态叙事网络,使地方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对话媒介。

4.2.2 以非线性叙事构建文化遗产沉浸式传播体系

《意见》大力推进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为构建文化遗产传播体系打下基础。非线性叙事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单向性与封闭性,构建了一个供用户探索、发现、质疑、重组的意义场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数字地图、知识图谱交互叙事等,允许用户在文化遗产内部构建个性化认知网络、自主选择路径、关联要素、发掘意义等,极大增强用户参与感、互动感。具体而言,通过数字地图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自由导航,在不同历史场景中探索建筑结构、文物起源、历史人文等,而知识图谱以可视化方式展现各文化元素间的关联,用户通过点击、拖动、链接等方式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网络。如数字故宫项目成功验证了非线性叙事构建的可行性。数字故宫通过三维扫描、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构建立体文化生态系统,借助AI算法与“数字文物”趣味互动,让文物“活”起来。同时,故宫上线的“紫禁城600”APP,用户可沿帝王理政、后宫生活、建筑工艺等不同主题线索进行非线性探索。

4.3 从在地性实践到全球性流动:贡献文化遗产数字化方案

在全球传播格局下,人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一个同步的世界史时刻,文化传播正以一种更直观、可视化、可存储的方式蓄力^[44]。这一契机推动文化遗产在地性实践转化为全球性流动,是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方案走向国际的核心要义。传统上,文化遗产在小范围传播,附着于本土社会关系、仪式空间与代际相传中,在跨文化、跨语境传播中面临传播主体协同度、传播客体区分度、传播内容记忆度、传播媒介接受度和传播效果满意度等问题^[45]。传统文化遗产传播模式虽维系了本土文化根脉,但每一次本土与全球的对接都可能经历充满摩擦的协商^[46],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进行对话交流的可能。当前,中国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全球流动已有许多探索。从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敦煌学学术资源面向国际学界开放,通过“无门槛”共享模式,推动敦煌学从“国际显学”迈向“全民参与”;到“故宫以东”联合2025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联盟嘉年华,开启“文旅+电竞”新玩法;再到云南傣族织锦、彝族漆器等元素转化为跨境电商图文/短视频素材,通过Shopee、TikTok等国际平台触达目标市场,这些实践都为连接全球文化提供了清晰路径。

4.3.1 以开放共享平台建设促进文化遗产全球参与

《意见》鼓励文化机构拓宽文化数字内容分发渠道，培育新用户群体，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立足于《意见》发展要义，推动文化遗产全球性流动，贡献文化遗产数字化“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数字化跨地性参与、跨地性构建起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关系，使每一个“本土”不再是孤立和隔离的^[47]。由此，建立面向全球研究者、设计师、艺术家、企业家、公众等群体的开放共享资源平台，成为推动文化遗产全球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鼓励基于中国文化遗产元素的二次创作、学术研究、场景应用和产品开发，使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创意开发的活素材。以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为例，该平台面向海内外学者、文化爱好者以及艺术创造者开放了 6500 余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打造了“一站式”文化共享共创平台^[48]。

4.3.2 以数字化新场景构建拓宽文化遗产全球流动

《意见》注重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数字化文化体验场景。在《意见》指导下塑造面向全球传播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场景，需加强与海外博物馆、国际教育平台、国际影视业、游戏公司等文化产业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联名 IP 开发、内容共创与收益分成等机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内容在合法合规基础上有序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协同提升。在技术层面，依托全息呈现、数字孪生、跨时空交互等新型体验技术，推进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实现对全球受众的在线触达。同时，通过线上数字场景与线下文化空间融合，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体验体系，推动文化遗产“走出去”。以四川古蜀文明数字传播为例，其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受众的文化背景与兴趣特征，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如在日本推出“三星堆百科问答挑战”，在泰国与越南举办“三星堆遇见出海游戏”主题文创市集，在巴西邀请百万计大 V 体验“文化盲盒开箱”^[49]。

5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推进策略

《意见》强调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为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创新驱动与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遗产传播应坚持以内容为本，以科技为翼，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传承、从专业场域走向公共空间，从在地记忆走向世界表达，呈现中华文化全景，推动中华文化成果全民共享，使其享誉海内外。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推进策略如图 3 所示。

5.1 主体维度：建立多元参与的协作网络

由于“国家—社会”语境下主体价值诉求的不同致使文化遗产在多个向度连接中产生“脱域”与“嵌入”张力^[50]。文化遗产传播要打破单一主体局限，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国际联动的多元协作网络，促进文化遗产在不同向度传播中有机融合。

一方面，激活在地传播，筑牢本土文化根基。文化遗产根植于地方实践，形成在地化传播，符合《意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的目标，是实现文化遗

产在地文化延续与价值再生产的路径之一。具体而言，文化遗产在地传播并非简单的“地方展示”，而是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地方情感认同的深度耦合。依据《意见》贯通各类文化机构数据中心的要求，各地方文化遗产机构有必要搭建专题档案数据库。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契合我国现行文化遗产法律法规的内容，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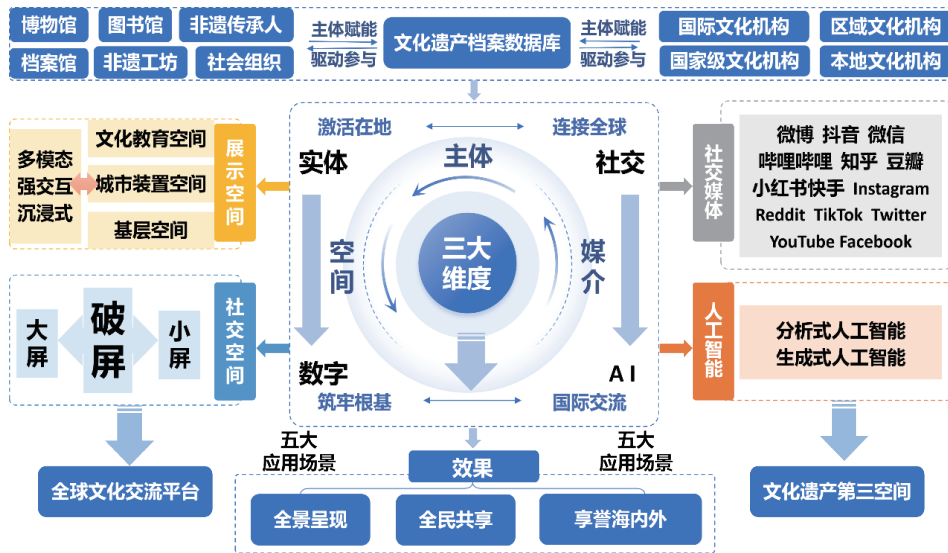


图 3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文化遗产传播的推进策略

网络化、结构化、系统化保护。各地政府部门通过制度设计与公共资源配置,支持地方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协会组织、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人、基层文化空间成为资源聚集节点,激活地方主体传播能动性,下沉基层配置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加速在地文化与档案数据库对接进程,筑牢本土文化根基。如“美国记忆”工程、日本“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台湾地区“兰屿媒体与文化数字典藏”等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建设经验^[51],均可供借鉴。

另一方面,连接全球传播,打通国际合作交流。文化遗产连接各国实践,形成全球性传播,契合《意见》鼓励文化机构拓宽文化数字内容分发渠道并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要义,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遗产国际可见度与话语权。2025年《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指数(CSIC)报告》将构建可持续全球传播体系纳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未来趋势中。具言之,全球文化机构需建立长效与深度合作机制,确保中华文化符号在全球传播体系中长期可见、广泛认同与持续增值。从主体维度看,应厘清国际文化机构、国家级文化机构、区域文化机构、本地文化机构的功能分工,明晰各主体在文化遗产内容生产、技术支撑、平台运营与传播扩散中的角色定位。同时,各文化遗产机构应紧密围绕国际受众需求与跨文化传播规律,推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网络精细化运营,通过数据分析、用户画像与内容反馈机制等优化传播结构,提升文化遗产全球传播可持续性。如截至2025年9月,我国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汇聚来自18个国家的44家文博机构参与合作,收录高清数字化文物5000多件,以虚拟博物馆方式满足公众互动性、沉浸式体验需求^[52]。

5.2 空间维度:构建虚实结合的复合场域

文化遗产传承的理论与实际、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等都要求人们把文化空间和文化遗产结合起来^[53]。文化遗产传播要突破传统物理空间局限,构建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并存的复合场域,协同文化遗产在不同空间的传播中实现有效传承。

一方面,扩大实体展示空间,强化现场感知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国有博物馆、文物保护科研机构、其他文物事业机构和文物企业等各类文物机构974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54]。由此,文化遗产机构需秉承《意见》利用现有公共设施推进数字化文化体验的思想,结合《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55]等政策指引,着力推进文化遗产传承展示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传播展示空

间应包括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档案馆等文化教育空间;文化广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户外大屏、楼宇投影等城市装置空间;社区、学校、乡村、企业等基层空间。具言之,文化遗产机构应积极运用扩展现实、高精度三维建模、空间音频及物联网传感等集成技术,对传统展厅、遗址现场、历史街区等实体空间升级,部署增强现实导览、混合现实叙事场景、全息投影剧场及可交互数字展墙等,将实体空间转为多模态、强交互、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如澳门保利美高梅博物馆打造的“蓝色飘带——探索神秘海域邂逅丝路遗珍”特展,依托500平方米8KLED屏构建全包裹沉浸式场景,融合透明OLED屏与触控传感膜,实现虚实叠加,支持观众操控数字模型等^[56]。

另一方面,拓展数字社交空间,共创文化交流平台。结合《意见》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体验要求,我国文化遗产机构应致力于构建开放互联、支持多语言虚拟空间入驻和共创的全球文化交流平台。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论坛吸引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及9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交流,发布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40项文化遗产案例^[57]。由此,建设全球文化交流平台有助于推动跨国、跨机构文化遗产整合,为跨国、跨机构协作提供稳定社交空间。融合《意见》提及推动“大屏”“小屏”跨屏互动措施,加速文化遗产传播从“大屏”观看转向“小屏”探索。利用超高清、HDR、三维声效及VR影院模式,通过史诗性纪录片、沉浸式考古直播、交互式艺术展映等形式,将数字电视、数字投影等大屏转化为集体文化交流空间。在观看大屏时,小屏应同步接收文物链接、扩展阅读、互动任务等个性化探索,即时聚合并可视化小屏的群体行为数据,实现双向融合。如首个“元宇宙”概念的大型数字交互空间《三星堆奇幻之旅》,用户扫描新闻直播旁的二维码,即可“穿越”时空,打破大屏与小屏之间的“次元壁”,实现“破屏”融合传播^[58]。

5.3 媒介维度:拓宽文化遗产的传播边界

媒介即连接。媒介连接着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各种关系,对拓宽文化遗产传播边界具有重要意义。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意义世界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立足文化间性,克服文化偏见,经由理解他者图式来反观自身^[59]。文化遗产传播要打破传统媒介传播藩篱,转而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消解国界和语言障碍带来的偏见和误解。

一方面,善用社交媒体传播,消解传播时空局

限。文化遗产机构应打造文化遗产“第三空间”，契合《意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与“增强文化吸引力”的核心要义。依托数字化采集、关联数据与语义标注技术等将文物、古遗址、古建筑、历史名城、文献等转为可利用的数字资源。同时，积极利用 Instagram、TikTok、Twitter、Reddit 等全球化社交媒体平台策划并推送文化遗产跨国创意挑战，鼓励全球网络用户基于本土音乐、舞蹈、服饰、影视、游戏等进行艺术转译、叙事改编与跨媒介创作等。如 TikTok 上有关“#hanfu（汉服）”“#kungfu（中国功夫）”等话题激发海外用户新鲜感和好奇心^[60]。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交媒体激活文化遗产传播互动机制，将增强现实滤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嵌入社交媒体创作接口，围绕平台热门参与话题，设置话题标签、讨论社区、互动挑战、共创任务等，引导用户点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如一位外国网民将费玉清的《一剪梅》应用到 TikTok 视频拍摄中，两周内赢得 60 多万好评，“#XueHuaPiaoPiao（雪花飘飘）”话题吸引数千万人关注^[61]。

另一方面，善用人工智能媒介，重塑文化传播逻辑。人工智能可划分为分析式人工智能（Analyt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分析式人工智能善于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从中发现规律并辅助决策。依托分析式人工智能，文化遗产机构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算法，挖掘全球社交媒体、新闻报道、学术出版物中涉及中国文化遗产的多语种文本、图像、视频数据，识别不同地区、年龄、文化背景的兴趣偏好。基于此，分析用户在数字平台的行为轨

迹与交互数据，追踪传播数据曝光率、互动率，提升文化遗产的内容触及率及用户黏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内容创造力与情景生成力，是践行《意见》“创新文化表达方式”与“培育文化新业态”的创新引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eepSeek 上线不足 20 天全球日活跃用户突破 3000 万，登顶全球 140 个国家及地区的应用市场^[62]。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大规模、高效率生成多元平台语境的阐释文本、短视频脚本、文物修复影像、虚拟展览大纲、历史动画场景、数字艺术品等，以历史人物、文物专家、非遗传承人为原型，开发具有拟人化、交互式特性、可回应公众查询、知识讲解以及跨时空对话的 AI 数字人。

6 结语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从能力构建、价值导向与推进策略三个维度探索文化遗产传播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文化遗产不仅依托技术赋能传播，还应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实现文化意义深度表达与价值共创，为全球文化交流互鉴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未来，文化遗产传播要持续深化技术应用，使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可对话、可衍生、可持续的文明资产。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资源创意开发协同机制研究”（23BTQ001）的阶段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陈伟. 大运河遗产小道系统的实践——以杭州段为例 [J]. 东南文化, 2014(4):25-30.
- [2] 柴颂华, 吕尚彬. 基于“5W”模式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J]. 学术论坛, 2016, 39(7):149-153.
- [3] 张允, 周晶. 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电视媒体中的传播 [J]. 中国电视, 2018(7):44-47.
- [4] 高晓芳. 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传播 [J]. 文艺争鸣, 2015(4):207-208.
- [5] 张静, 杜煌, 肖玮.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播方式——以《传承者》为例 [J]. 中国电视, 2016(6):109-112.
- [6] 赵路平, 吕颜婉倩, 黄琰秋. 基于报纸和网络文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14):37-45.
- [7] 李剑. 无锡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 [J]. 装饰, 2016(8):132-133.
- [8] 梁嘉, 赵颜, 王庆. 壮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路径新探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1):105-109.
- [9][26] 谈国新, 何琪敏.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 [J]. 理论月刊, 2021(9):87-94.
- [10] 张兰, 伍嘉欣, 陈可新. 弹幕如何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传承——基于 B 站 UGC 短视频的互动仪式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 54(4):146-156.
- [11] 任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短视频的传播策略探析 [J]. 传媒, 2024(5):68-70.

- [12][42] 李宝贵,陈海峰.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的现状、困境与纾解[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64-74.
- [13] 赵哲超,王昕.媒介记忆视域下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以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1(3):99-102.
- [14] 黄永林,余欢.智能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运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6):122-129.
- [15] 王圣华,谭剑.AR技术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中的应用[J].美术观察,2020(4):75-76.
- [16] 郭新茹,沈佳.价值链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分析[J].东南学术,2024(3):226-236.
- [17] 毕翔,葛宇,程秀峰.活动理论视域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服务的价值体现、场景应用与实现路径[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5(10):12-23.
- [18] 邓又溪,朱春阳.网络微短剧何以创新文化遗产影视化传播——基于《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案例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9):161-171+188.
- [19] 林琳.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陶瓷”的文化创新传播策略[J].传媒,2024(19):72-74.
- [20] 王倩,逯汉宁,曾子心,等.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路[J].世界农业,2025(8):138-140.
- [21][23] 牛凤燕.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转换[J].理论学刊,2018(5):162-168.
- [22] QuestMobile 研究院.2025 年新媒体生态盘点[EB/OL].(2025-12-16)[2026-07-08].<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2000767092954075138>.
- [24] 聂晓阳.叙事传播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启发[J].中国记者,2023(1):102-104.
- [25] 刘芳.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叙事的理论与应用模式研究[J].东南文化,2025(1):22-29.
- [27] 刘芳,吴振新.文化遗产的数字叙事现象分析及应用建议[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3,19(11):46-52.
- [28] 甘肃省文化博览局.千年敦煌谱新篇②|千年敦煌迈入数字新生:文物数字化让流失珍宝“云端”重聚[EB/OL].(2025-09-12)[2026-07-08].<https://www.gswbj.gov.cn/a/2025/09/12/25885.html>.
- [29] 吴兴帜.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逻辑与转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8):27-32.
- [30][37] 国家统计局.2025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EB/OL].(2025-06-27)[2026-07-08].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6/t20260629_1964025.html.
- [31] 黄兴,梁君健.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看文物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J].东南传播,2025(9):44-46.
- [32][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5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5-30)[2026-07-08].https://www.gov.cn/lianbo/202606/content_7070917.htm.
- [33] 宋俊华,王明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文化遗产,2015(6):1-9+157.
- [34] 杨亮.文化遗产资产价值的均衡分析[J].东岳论丛,2008(4):183-186.
- [35] 李华飙,史雪振,李洋.文化遗产大数据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J].东南文化,2021(S2):78-82.
- [36] 王春法.关于智慧博物馆建设的若干思考[J].博物馆管理,2020(3):4-15.
- [3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5.
- [39] 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4):6-12.
- [40] 张颖.回归生活本身: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地方转向”的理念与方法[J].贵州社会科学,2021(1):100-106.
- [41][43] 王晓光,赵珂.文化遗产数字叙事信任模型:概念与框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50(2):30-41.
- [42] 张海波.“受损即消失”: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文化遗产应急管理[J].行政论坛,2025,32(6):5-15+2.
- [44] 苏畅.“世界方法”与“中国表达”:数智时代非遗国际传播之道——以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四川戏剧,2023(12):99-102.
- [46][47] 魏雷,朱竑.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J].地理学报,2022,77(2):492-504.
- [48] 国家文物局.“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 6500 余份档案开放下载[EB/OL].(2022-12-13)[2026-07-08].http://www.ncha.gov.cn/art/2022/12/13/art_723_178667.html.

- [49] 数字技术助推中华文明出海, 四川创新谱写古蜀华章 [EB/OL].(2025-12-11)[2026-07-08].<https://www.thecover.cn/news/chZyXBsA00iH90qSdq8Jkw==>.
- [50] 李青梅, 张华. 脱域与嵌入: 民俗体育文化传播的多元共生与价值整合——基于遂溪醒狮的田野考察 [J]. 体育与科学, 2024, 45(5): 94-102.
- [51] 徐拥军, 王薇. 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资源建设的经验借鉴 [J]. 档案学通讯, 2013(5): 58-62.
- [52] 让文明永续传承: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全球合作 [EB/OL].(2025-09-19)[2026-07-08].<https://www3.xinhuanet.com/ci/20250919/c7e4014dadab451db0dd7ae7444a3fc3/c.html>.
- [53] 李银兵. 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5(9): 14-18.
- [55] 中国政府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修订印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2024-03-22)[2026-07-08].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3800.htm.
- [56] 艺术中国. 大湾区文旅新地标“保利美高梅博物馆”亮相, 带你沉浸体验首展“蓝色飘带” [EB/OL].(2024-11-22)[2026-07-08].http://art.china.cn/txt/2024-11/22/content_42969371.htm.
- [57] 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 让文化遗产获得“数字生命” [EB/OL].(2025-09-17)[2026-07-08].<https://www.news.cn/20250917/000f65a2efd04cb9b68e38b1f2ffcf3b/c.html>.
- [58] 高红波, 林颂然. 文化遗产的叙事重构与互动传播——以第 32 届至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三星堆主题获奖作品为例 [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5(5): 10-14.
- [59] 陈先红, 秦冬雪. 全球公共关系: 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论方法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6): 44-56.
- [60][61] 王灿. 中国国际形象在短视频传播中的构建——以 TikTok 为例 [J]. 国际公关, 2021(22): 163-164.
- [6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2025-07-21)[2026-07-08].<https://www.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Capacity System, Value Orientation, and Advancement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Under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ZHOU Linxing, LIU Shihua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faces transformative opportunities suppor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Grounded in policy, this study trace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It explores dissemination capabilities in new expressions, experiences, and business models by examining content creativity,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Guid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s guiding principles,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transitioning from "local" to "global" perspectives—toward becoming global assets, fostering global dialogue, and achieving global circulation. Consequently,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ree dimensions: dissemination entities, dissemination spaces, and dissemination media. This approach will drive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while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reach and influence.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行为选择基础视角下的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 含义解读与关系辨析

王巧玲 杨梓晔 岳冷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大力推进档案开放、保障档案利用权是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对档案开放与利用的基础理论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使相关实践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概念解释含混与理论依据不足的困境。文章从现代治理理论的行为选择基础视角出发,对档案开放和档案利用进行了含义解读和两者关系辨析。档案开放的行为合法性基础为档案开放决策权,档案利用的行为合法性基础为档案利用权。虽然这两种权利都根源于档案所有权,但档案利用权既可以作为所有权的组成部分,为所有者所行使,也可以分割出来,经所有者授权给他人;而开放决策权通常只能由档案所有者行使,无法从档案所有权中单独分割出来。档案利用的动力性基础主要来自行为主体对“实用”和“情感”的追求,而档案开放的动力性基础与档案的所有权性质密切相关。

【关键词】档案开放;档案利用;档案治理

【作者简介】王巧玲,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箱:wangql@bnu.edu.cn,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治理与档案教育;杨梓晔,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开放与利用;岳冷,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资源开发与档案教育。

1 引言

档案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通过促进档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出台在我国档案事业迈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大力推进档案开放,保障档案利用权是其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档案法》缩短了档案的常规封闭期,首次提出了“档案开放审核”概念,并明确将档案形成或移交单位纳入审核工作责任主体之列,同时强化了对档案部门开放利用的监督。基于此背景,近年来,档案开放与利用相关主题成为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档案开放与保密^[1-2],政府信息公开工作^[3-4]之间的协同,档案利用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5-6],档案开放审核工作机制和流程的设计思路^[7-8],国外的相关经验借鉴^[9-10]等方面,而对于档案开放与利用的基础理论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相

关实践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概念解释含混与理论依据不足的困境。

治理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相关主体的行为选择,而行为背后的合法性基础与动力性基础则是影响相关主体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现代治理理论的行为选择基础视角,对档案开放和档案利用进行含义解读和两者关系辨析,能够更好地为理解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科学推进相关实践提供学理上的指导和支持。

2 合法性与动力性:现代社会行为选择的两大基础

所谓合法性基础,指行为选择的发生以主体拥有相应的权利为必要条件,这个相应的权利即为该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以合法性作为行为选择的基础,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法律的赋予,而其强度大小则取决于该权利所受保障强度的大小。

所谓动力性基础,指主体在行为选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我目的指向,且考虑目的实现的收益成本比。以动力性作为行为选择的基础,是现代治理理论以人的“理性自利”假设具有普遍解释力为前提的。现代治理理论认为,行为目的具体指向的内容,与行为主体的需求有关,而这些需求主要包括实用、财富、政绩、声誉、情感和责任等六大类。其中,实用,追求利用物品为生产或生活带来的便捷;财富,追求经济收益;政绩,追求上级对工作业绩的认可和肯定;声誉,追求社会声望与名誉;情感,追求内心的审美体验或归属感;责任,追求使命的实现。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思路,可将这六类需求也进行层次划分,实用、财富和政绩处于最基础层级,它们的满足是相关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情感和责任处于最高层级,它们是纯精神层面的;声誉处于中间层级,很多时候声誉可以转化为或带来财富和政绩上的收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行为主体自我需求的满足,并不意味着行为结果的受益主体仅限于行为主体,很多时候,行为主体理性自利的行为选择,也可能同时带来他利的结果。

3 档案利用的含义及其行为选择基础

从各业务工作的逻辑关系来看,除利用以外的其他所有档案业务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促进档案利用而服务的,因此,先对档案利用进行剖析,便于深入探讨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

3.1 档案利用的一般含义

档案利用,指档案利用者通过利用档案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这是档案学专业领域对档案利用含义的一般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档案利用”有时会被当作“档案利用服务”这一术语的简称来使用。档案利用服务,指的是档案工作者向利用者提供服务的过程。对于档案工作者而言,档案利用服务,属于档案业务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将“档案利用”作为“档案利用服务”简称的做法并不严谨。虽然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且在实践中有时会是同一个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但两者的行为主体不同,前者是利用者,后者是档案工作者^[1]。因此,其背后的行为选择基础也不同。为避免混淆,本文严格采用“档案利用”含义的一般解释。

从构成上看,档案利用概念的一般解释包含三个要素:主体、行为和目的;从逻辑关系上看,这三个要素中最核心的是档案利用行为,其他两个要素与之密切相关,一个是行为的主体(即利用主体),另一个则是行为的目的(即满足利用主体的自身需求)。

3.2 档案利用行为选择的基础

3.2.1 合法性基础

根据前文对行为选择合法性基础的解释,档案利用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即档案利用权。从法理上来说,档案利用权是以档案为客体对象物的一种派生物权,其派生的源头为档案客体的所有权。而作为源头的所有权属于原始物权,是法律直接确认或认可的结果。

作为派生的物权,档案利用权的内容包含在完整的档案所有权之中。一方面,所有权在权利内容上是一个涵盖“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种主要权利类型的完整权利束。所谓占有,即对物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直接控制;使用,即在不改变物的性质或状态的前提下利用物的特性满足需求;收益,即通过占有或使用物而获取收益;处分,即对物进行事实或法律上的处置。档案利用权,显然属于对物的“使用”这一权利类型。另一方面,所有权在权利特性方面具有“可分割性和独占性”。其中,可分割性指所有者可将部分权利(如使用权或某些方面的使用权)让渡或授权给他人;独占性指所有者不仅可将他人完全排除在外,自行统一行使该权利束中的所有权利,并且在将部分权利让渡给他人的情况下,该物的最终支配权仍归所有者所有。所有权所包含权利的可分割性,为档案的非所有者拥有档案利用权提供了可能。

因此,档案利用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来源,根据利用主体是否拥有档案所有权的情况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利用主体为档案的所有者。所有者主体的档案利用行为“天然”就具有合法性基础,因为其档案利用权直接来源于主体所拥有的档案所有权,在法理上属于“自物权”;二是利用主体并非档案的所有者。这类主体的档案利用行为的合法性基础,需要通过档案所有者的让渡或授权才能获得,其档案利用权在法理上属于“他物权”。而所有权的独占性为档案所有权所有者改变档案利用权的授予或让渡状况奠定了理论基础。

3.2.2 动力性基础

档案利用一般含义中的行为目的要素,即利用主体对满足自身需求的追求,其实就包含了对该行为选择动力性基础的解释。在理性自利人假设的视角下,档案利用的动力性基础实际取决于以下两个维度的内容。

一是,档案利用行为选择所能满足的主体需求及其强度。根据档案学领域经典教材《档案学概论》最新版的相关论述,档案具有“凭证”“情报”“数据要素”和“记忆”四种价值^[12]。将这四种价值与

人的六类主要需求相对照，可以发现：档案利用行为能够满足的主要是“实用”和“情感”两类需求，其中“实用”需求的满足，体现的是档案的“凭证价值”“情报价值”和“数据要素价值”；“情感”需求的满足，体现的则是档案的“记忆价值”。档案所记录信息内容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则决定了档案利用动力性基础的强度大小，即匹配程度越高，动力性基础越强，反之越弱。

二是，档案利用行为选择所需的成本投入情况。档案利用行为选择的成本投入，即行为主体为利用档案而需要消耗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之和。显然，对于理性的行为主体而言，档案利用行为选择的成本投入越大，其动力性基础就会越弱；反之，则越强。若从利用行为的相对面，即利用服务提供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档案利用服务的收费越低，手续越便捷，行为主体的档案利用动力性基础越强。

4 档案开放的含义及其行为基础

档案工作实践自形成之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档案利用是其拥有者或少数上层人物才能享有的权利。直到 18 世纪末，法国在其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档案改革中才首先提出档案开放原则^[13]。

4.1 档案开放的一般含义

国内目前能够查找到的有关“档案开放”含义的权威解释来源主要有两处：一是《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 1-2000），二是《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国家档案局令第 19 号，2022）。其中，前者将“档案开放”定义为“档案馆将达到一定期限、无需控制使用的档案向社会公开提供利用的活动”；后者的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档案开放，是指国家档案馆按照法定权限将形成时间达到一定年限、无需限制利用的馆藏档案经过法定程序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这两个定义的来源都是国家

档案局制发的正式文件，在性质上都属于实践层面的术语解释。若从构成要素和具体文字表述两个维度，对两者进行对比，会发现两个定义都包含了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和行为内容三个要素，且这三个要素的核心词汇相同，分别是“档案馆”“档案”与“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基本内容也大致相同。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个行为条件要素，即“按照法定权限，经过法定程序”；二是，三个共同要素的限定词语使用有不同（见表 1）。在行为主体要素中，后者在“档案馆”前增加了“国家”一词，从而使档案开放的行为主体被明确限定为“国家档案馆”这一类别。在行为对象要素中，后者用“形成时间达到一定年限”替换了前者的“达到一定期限”，用“无需限制利用”替换了“无需控制使用”，并在“档案”前增加了“馆藏”一词。不难看出，行为对象要素这几处限定词语的变化使得后者与《档案法》所使用的语言之间契合度相对更高。如《档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再如，“控制使用”一词最早是在《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中被使用的，但各版本的《档案法》中都只有“利用”，而从未出现过“使用”一词。在行为内容要素中，后者删掉了前者的“向社会公开提供利用的活动”中的“公开”一词，从目前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严格区分的实践背景来看，后者的表述更加严谨。导致两处含义解释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显然与两份文件自身的性质、使命定位、发布时间及随时间推移相关认知发生变化有着重要关联。《档案工作基本术语》是针对整个档案行业的非强制性行业标准，而《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则是针对国家档案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且两者的发布时间相距 22 年。

档案开放，最初是作为一种原则和思想被引入档案工作实践的。在业内被奉为经典的档案业务工

表 1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与《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中
“档案开放”的构成要素与文字表述对比

构成要素	前者的文字表述	后者的文字表述
行为主体	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
行为对象	达到一定期限、无需控制使用的档案	形成时间达到一定年限、无需限制利用的馆藏档案
行为内容	向社会公开提供利用的活动	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
行为条件	无	按照法定权限，经过法定程序

作八大环节中,并没有“档案开放”。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档案开放”的界定问题在理论研究领域一直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较于实践层面的术语解释,理论层面的概念界定一般是直接揭露本质特征,抽象程度更高。严格来说,将档案开放的行为内容界定为“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是不太确切的,因为档案开放的行为结果并不等同于“向社会提供了利用服务”,而是“让社会公众都平等地拥有了档案利用权”,至于是否行使该权利来享受利用服务,则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行为选择。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开放的本质特征是“授权”。档案开放的一般含义,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行为主体将档案利用权授予社会公众的过程”。

4.2 档案开放行为选择的基础

4.2.1 合法性基础

档案开放的合法性基础,即将档案利用权授权给社会公众的权利,或简称档案开放决策权,属于所有权中的处分权。由于处分权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也是拥有所有权的最根本标志,通常只能由所有者自己行使。因此,档案开放决策权通常只掌握在档案所有者手中,档案开放行为的合法主体通常为档案所有者。

由于档案利用权是档案所有者“天然”就拥有的权利,非所有者的档案利用权只能在档案所有者授权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同时,档案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共同组成的集合就是全体社会公众,因此,档案所有者将档案利用权授予所有非档案所有者的结果,就是全体社会公众都拥有档案利用权,也即档案开放的结果。

上述“档案所有者拥有档案开放决策权”的理论判断,在我国《档案法》第三十一条中得到了实践层面的体现,该条款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予以支持,提供便利”。

因此,私人或集体组织形成的档案,在其所有权转让给国家之前,其档案开放决策权的主体是具体而明确的,即档案的所有者。而公共组织形成的档案,因公共组织属于国家所有,其档案所有权亦属于国家。与一般的所有权相比,国家所有权有两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国家所有权通常不可转让。正是基于此,我国《档案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二是,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只能通过建立一定的治理体系并授权相关主体代为行使的方式来实现。根据我国目前所建立的档案治理体系,代表国

家行使档案所有权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作为档案形成(或移交)单位的公共组织和国家档案馆。

4.2.2 动力性基础

从行为目的指向方面来看,由于档案开放是将档案利用权授予他人,其行为的动力性基础显然不会是来自“实用”和“情感”这两类与档案利用密切相关需求的满足,因此,需要考虑的需求就是最基础层级的“财富”“政绩”,中间层级的“声誉”和最高层级的“责任”。

公共组织形成的档案,首先,在所有权性质上属于国家所有,无论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主体是哪个组织,其档案开放都不能以追求“财富”作为行为的动力性基础。其次,公共组织形成的档案,在我国目前的档案治理模式下,其最终的归属流向有两种情况:一是,移交进国家档案馆;二是,留存在形成单位。《档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因此,对于要移交进国家档案馆的这部分档案而言,追求“政绩”可以成为其决策权主体选择档案开放的动力基础。当然,以追求“政绩”为动力性基础,要求相关行为被纳入行为主体的绩效考核指标之中,并且绩效考核指标越清晰,所占权重比例越高,行为主体的动力性基础越强。最后,虽然《档案法》明确将这部分档案的开放决策权同时赋予了国家档案馆和档案形成(或移交)单位,但从两者的组织使命定位来看,国家档案馆是负责档案工作的专业组织,馆藏档案开放作为其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字面含义上就显而易见,追求“责任”或可成为国家档案馆在追求“政绩”基础上更高层级的动力性基础,而档案形成单位则各有其负责的其他专门领域,且档案开放工作与其自身的使命定位在目前的治理体系下无直接关联。因此,追求“责任”很难成为其档案开放行为选择的动力性基础。

个人或非公共组织形成的档案,在其所有权未转让给国家以前,其所有权性质都属于非国家所有。对于这部分档案,法律并未规定其不能买卖,亦未规定其有向社会开放的法定义务。因此,最基础层级的“财富”需求、中间层级的“声誉”需求以及最高层级的“责任”需求都可成为其所有者档案开放行为选择的动力性基础,究竟哪种需求提供的动力性基础更强,则取决于决策者目前的主导需求处于哪一层次。

从成本方面来看,档案开放(将档案利用权授予社会公众的行为)本身所需消耗的财务成本是非常少的,但它还面临着因档案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涉

及敏感信息（即开放给公众可能会导致自身、第三方、国家或社会利益受损）带来的风险成本。显然，对于理性的行为主体而言，该风险成本越高，其动力性基础就会越弱，反之，则越强。同时，这个风险成本又与对敏感信息的判断难易程度相关，判断越容易做出，敏感信息就越容易被排除在开放之外，风险成本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5 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之间的关系辨析

综合前文的讨论，从行为性质、行为合法性基础、行为动力性基础三个层面对比考察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

从行为性质的视角来看，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是行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其中前者属于权利授予行为，而后者则属于权利行使行为，但两种行为所涉及的权利都是档案利用权。只不过，对于档案开放而言，档案利用权是其行为的对象；而对于档案利用而言，档案利用权是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从行为合法性基础的视角来看，档案开放的行为合法性基础为档案开放决策权，档案利用的行为合法性基础为档案利用权。虽然这两种权利都源于档案所有权，但档案利用权既可以作为所有权的组成部分，为所有者所行使，也可以分割出来，经所有者授权给他人；而开放决策权通常只能由档案所有者行使，无法从档案所有权中单独分割出来。据此，可以对档案开放与档案利用两者的关系做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推断：一是，档案利用可独立于档案开放而存在，档案开放并不是档案利用发生必须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档案所有者的档案利用权无须经历专门的权利授予过程；二是，对于同一档案

客体而言，档案利用的行为主体范围，可能与档案所有者的范围完全相同，也可能比后者大。只要所有者授权给了非档案所有者，就意味着档案利用权拥有者主体范围的扩大。所以，理论上，档案利用权主体范围的扩大可以有程度之分，其最大程度就是授权给每一位非所有者，从而使全社会所有成员都拥有档案利用权。由此可见，档案开放对于档案利用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主要体现为“通过授权将档案利用权拥有者主体扩至最大范围”。在这个视角下，档案利用可以被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档案所有者的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和非所有者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

从行为的动力性基础视角来看，档案开放的动力性基础与档案的所有权性质密切相关。国有档案开放的动力性基础，主要来自对“政绩”和“责任”的追求；非国有档案开放的动力性基础，主要来自对“财富”“声誉”和“责任”的追求；档案利用的动力性基础，则主要来自对“实用”和“情感”的追求。由于档案开放的结果并不等同于档案利用行为的做出，因此，档案开放率的提高，并不会直接表现为档案利用率提高。但笔者认为，档案开放的价值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对档案利用的促进作用上的，档案开放——尤其是国有档案的开放，也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那就是为民众的基本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档案开放审核治理体系创新研究”（25BTQ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孙大东, 王文博. 新修订《保密法》背景下涉密档案工作的推进路径[J]. 中国档案, 2024(12):58-60.
- [2] 肖秋会, 王玉, 张博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档案解密现实困境及对策[J]. 档案学通讯, 2023(2):31-38.
- [3] 潘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档案法实施条例》的衔接配套[J]. 山西档案, 2026(4):83-86.
- [4] 张健, 汪若瑜. 档案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实证解析与制度完善——以109起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J]. 档案学研究, 2022(3):44-51.
- [5] 肖秋会, 王玉. 档案开放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研究[J]. 档案学研究, 2025(4):20-28.
- [6] 李雪健. 档案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研究[J]. 档案学研究, 2026(1):104-113.
- [7] 黄孟苏. 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 理论阐释、制度困境与构建路径[J]. 档案学通讯, 2025(2):39-45.
- [8] 陈俐, 金霞. 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审核业务流程的科学设计[J]. 中国档案, 2020(10):40-41.

- [9] 王巧玲, 杨佳琪. 制度分析视角下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率高之原因探究 [J]. 北京档案, 2025(2):58-62.
- [10] 陈海平. 国外档案限制利用制度研究——基于 ICA 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 [J]. 山西档案, 2021(4):22-29.
- [11] 冯惠玲, 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240.
- [12] 冯惠玲, 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42-47.
- [13] Schellenberg T R. Modern archive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5,13-15.

Archives Opening and Archives Ut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Choic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and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WANG Qiaoling, YANG Ziye, YUE Ling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eaning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opening and archives ut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choice foundation in modern governance theory,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to understand archives opening review. The legitimacy of the act of opening archives is based on the decision-making right of archives opening, while the legitimacy of the act of utilizing archives is based on the right to utilize archives. Although both of these rights are rooted in archival ownership, the right to use archives can be exercised by the owner as a component of ownership, or can be separated and authorized by the owner to others; however, the right of archives opening decision-making can usually only be exercised by archive owners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rchive ownership. The dynamic foundation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mainly comes from the pursuit of "practicality" and "emotion" by the behavioral subject, and the dynamic foundation of archives ope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wnership nature of archives.

Keywords: Archives opening; Archives utilization; Archives governance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数字监管实践及特点

李怡婷 徐辛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州 350117)

【摘要】档案数字监管是将数字技术与档案监督管理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是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章以英国国家档案馆为研究对象,从档案人员、机构、资源和业务四个维度系统梳理其数字监管实践,归纳分析后发现其核心特征为公众参与得到保障、监管科技深度应用和监管法治不断完善三个方面。该研究对我国探索档案数字监管的实践路径有着启发意义。

【关键词】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监管;数字监管

【作者简介】李怡婷,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邮箱:357631662@qq.com,研究方向为档案数字治理、数智素养培育;徐辛酉(通信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箱:357631662@qq.com,研究方向为档案数字治理、数智素养培育。

1 引言

202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探索创新档案监管手段,加快数字转型^[1]。这说明在数字时代,加强档案数字监管,即一种将数字技术与档案监督管理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是推进档案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我国相关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2],亟须吸收借鉴国际经验。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在此方面起步较早。依据英国《公共档案法》,TNA早在1958年就承担起了公共档案监督和指导职责^[3],并负责监督政府部门履行档案管理义务。在数字环境下,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记录移交模式(Transfer Digital Records, TDR)^[4],实现了数字档案从移交到保存的全过程监管。同时持续开展了信息管理评估计划(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essment Programme, IMA)^[5-6],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数字鉴定、筛选和敏感性审查(Appraisal, Selection and Sensitivity Review, ASSR)成熟度评估工具^[7]。近年来还启动了云端数字保存服务(Cloud Digital Preservation Service)项目^[8],试行了人工智能^[9]在档案监管中的应用,影响较大。

为此,本文拟针对TNA的档案数字监管实践开展专项梳理,以期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TNA官方网站、英国政府公开政策文件、战略规划、法律法规等,详见表1和表2。由于档案数字监管实践涉及多个方面,为便于梳理,本文依据监管对象不同,将其划分为档案人员、档案机构、档案资源、档案业务四大方面。这一分类与“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机构职能优化、档案资源治理、业务规范升级的任务目标相契合。

3 英国国家档案馆数字监管实践

TNA的数字监管并非单纯依靠技术工具实现,而是通过法律规范、能力建设、标准体系和数字技术的协同作用,将监管要求嵌入档案治理全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监管体系。

3.1 对档案人员的数字监管

在数字环境下,档案人员既是数字档案管理的执行者,也是数字监管的关注对象。档案人员数字能力不足,可能直接引发数字档案在形成、保存和管理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数据丢失或管理失范等

表 1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数字监管相关政策与战略规划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接入、赋能与升级》 (Plugged In, Powered Up)	7	《我们的数字世纪》 (Our Digital Century)
2	《理解数字连续性》 (Understanding Digital Continuity)	8	《管理数字连续性》 (Managing Digital Continuity)
3	云端数字保存服务计划 (Cloud Digital Preservation Service Programme)	9	数字记录移交服务计划 (Transfer Digital Records)
4	信息管理评估计划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essment Programme)	10	数字鉴定、筛选和敏感性审查成熟度评估工具 (Digital Appraisal, Selection and Sensitivity Review)
5	第 46 条行为守则成熟度评估工具 (Section 46 Code Maturity Assessment Tool)	11	《再封闭政策》 (Reclosure Policy)
6	《英国国家档案馆 2024—2025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24–25)	12	《解锁档案：英格兰档案战略愿景》 (Archives Unlocked: The Vision for Archives)

表 2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数字监管相关法规与制度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公共档案法》 (Public Records Act 1958)	4	《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2	《数据保护法》 (Data Protection Act 2018)	5	《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UK GDPR)
3	《档案管理行为守则》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Management of Records)	6	《数据（使用与获取）法》 (Data (Use and Access) Act 2025)

风险，进而影响数字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长期可用性。因此，TNA 将提升档案人员数字能力作为数字监管的重要内容。

在制度框架层面，TNA 在 2019 年和 2023 年先后实施了《接入、赋能与升级》^[10]和《我们的数字世纪》^[11]等数字能力建设战略，围绕数字保存、数据管理和数字服务等领域构建行业能力框架。与传统培训不同，这类战略不仅关注知识传授，更强调建立统一的能力标准。通过明确数字环境下档案人员应具备的核心能力，TNA 在实际行动上将数字能力纳入行业规范体系，从而实现对相关人员数字胜任力的持续性制度约束。

在具体实施层面，TNA 与数字保存联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合作推出从新手到专家(Novice to Know-How)等免费培训项目，帮助档案人员掌握数字保存和数字连续性管理等专业技能。这类培训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业务水平，更在于降低数字档案管理中的人为风险，增强档案机构落实数字监管要求的能力^[12]。此外，TNA 还通过

数字领导力培养、同行交流和知识共享等方式推动数字管理经验的交流与传播^[13]。其关注重点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技能提升，而是通过能力建设增强整个行业对数字监管要求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总体而言，TNA 对档案人员的数字监管并非停留在检查层面，而是通过对其数字能力的制度性规范，将监管要求转化为从业人员必须达到的能力基准，从而在源头上降低数字环境下的管理风险。

3.2 对档案机构的数字监管

档案机构是数字监管责任落实的主要载体。TNA 作为法定监管机构，主要通过法律约束、标准规范和监督评估等方式，对相关机构实施数字监管。

在法律层面，TNA 依据《公共档案法》履行监督职责，负责检查政府部门和公共档案机构档案管理责任落实情况^[14]。随着电子文件数量不断增长，监管范围也由传统载体逐步扩展至数字档案领域，相应的监管对象也由传统古籍手稿管理部门，拓展至档案数据管理部门，法律的授权使数字档案监管

从机构内部事务转变为具有外部监督性质的公共监督职责。

在标准层面，TNA 根据《信息自由法》第 46 条发布《档案管理行为守则》^[15]，该守则围绕数字记录移交、元数据管理和数字保存等领域制定业务指南^[16]。其作用不仅是为相关档案和文件机构提供了工作参考性建议，更是将监管要求转化为统一的操作标准，使各档案和文件机构能够按照同一规则开展数字档案管理，从而保障监管的一致性和可执行性。

在监督层面，TNA 持续实施信息管理评估计划^[17]。该计划通过成熟度评估和风险分析，对英国政府部门及公共档案机构的文件管理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特别是 2025 年推出的数字鉴定、筛选和敏感性审查成熟度评估工具，进一步将数字档案管理纳入评估范围^[18]。与传统阶段性检查不同，这类评估工具能够持续识别相关机构在档案或文件管理中的风险和薄弱环节，推动监管由定期抽查逐步转向持续性监督。

3.3 对档案资源的数字监管

数字档案资源是数字监管的直接对象，也是核心对象。与纸质档案相比，数字档案更容易面临技术迭代、格式淘汰和系统更新等多重风险，其长期可用性更加依赖外部技术环境的稳定。因此，TNA 将档案资源风险控制作为数字监管的重要内容，围绕格式管理、数字连续性管理和数字保存三个层面展开持续性监督。

在格式管理方面，TNA 持续维护 PRONOM 文件格式注册库，对数字文件格式进行系统性识别、记录和风险监控^[19]。其核心功能在于：当某种格式面临淘汰或兼容性下降时，相关信息能够被及时捕获并更新。其监管重点并非档案内容本身，而是影响数字档案长期保存和利用的技术因素。通过对格式风险的持续性监测，TNA 能够在资源损失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在数字连续性管理方面，TNA 提出数字连续性（Digital Continuity）理念，并发布《理解数字连续性》《管理数字连续性》等指南^[20]。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数字信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始终保持可发现、可访问、可理解和可利用状态。从监管角度看，数字连续性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前置式风险预防机制，通过识别系统、软件和数据之间的潜在依赖关系与脆弱环节，TNA 能够在问题暴露之前加以干预，从而降低数字资源失效的可能性。

在数字保存方面，TNA 于 2023 年启动云端数

字保存服务建设，将数字档案的保存过程纳入自动化监管体系^[21]。云平台能够自动完成校验、监测和备份等操作，对保存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现即时发现与响应。这种做法改变了传统依赖人工抽查的监管方式，使数字档案的保存状态能够接受持续性监测。同时，该平台采用单独保存副本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资源管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2]。

3.4 对档案业务的数字监管

档案业务是数字监管发挥作用的具体环节。近年来，TNA 不断将数字技术嵌入档案业务流程，使监管活动从结果检查逐步向过程控制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数字档案移交方面，TNA 依托数字记录移交服务（Transfer Digital Records, TDR）实现在线移交、元数据审查和格式验证的自动化^[23-24]。过去，档案移交质量主要依赖人工审核，监管通常发生于移交完成后的检查阶段；而在 TDR 体系下，服务平台将监管规则嵌入数字记录移交流程，通过自动校验待移交数字记录的文件格式符合性与元数据完整性，对不符合要求的记录进行即时提示，并暂停其移交流程。同时，TDR 通过校验和比对、元数据提取、文件格式识别以及病毒扫描等自动化检测手段，对数字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全过程验证，实现了数字档案移交环节由人工审核向智能化、流程化监管的转变，体现了 TNA 以技术手段强化数字档案移交质量控制和风险防范的监管模式。

在数字档案鉴定、筛选和敏感性审查方面，TNA 引入 ASSR 成熟度评估工具，对公共机构数字档案管理流程进行规范化检查。该工具主要围绕数字档案鉴定标准执行、筛选流程规范性、敏感信息识别与审查要求等方面开展评估，通过对机构相关业务环节的检查，识别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标准落实不到位、流程衔接不顺畅以及风险识别不充分等问题^[25]。同时，各公共机构需定期开展评估并向 TNA 反馈结果，TNA 据此了解不同机构数字档案管理的情况，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要求。ASSR 的应用使 TNA 能够将监管范围由移交后的结果检查进一步延伸至档案形成和处置过程，通过持续评估及时发现管理风险，提升数字档案鉴定、筛选和敏感性审查工作的前瞻性和精准性。

在监管手段层面，人工智能已开始进入档案业务监管领域。根据英国议会 2025 年书面问答披露的信息，TNA 已试验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开展历史文件转录、数字档案鉴定和敏感性审查等工作^[26]。与传统人工抽查相比，人工智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

进行风险识别与异常筛查,提升监管效率。虽然相关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其已经展现出利用技术手段强化业务监管的可能性。

4 英国国家档案馆数字监管的特点

得益于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早、法制基础良好、新技术得以广泛采用等优势,TNA的档案数字监管工作近年来取得较好成效,呈现出一些明显特点。

4.1 公众参与得到保障

公众参与是TNA数字监管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TNA并未将公众限定于档案服务对象的单一角色,而是通过法律赋权、渠道搭建和协同治理,将公众监督嵌入数字监管的运行过程之中,构建了较为开放的数字监管格局。

一是以法律制度保障公众监督权利。英国《公共档案法》和《信息自由法》明确赋予公众获取档案信息和政府记录的权利,为公众参与档案数字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前提^[27-28]。如在涉及档案再封闭管理时,TNA设立再封闭审查小组(Reclosure Panel),由具有信息自由和数据保护专业背景的公众参与审查,对再封闭行为进行独立评估^[29]。这一机制使监管决策不再由档案馆单方面决定,而是置于外部监督之下,增强了监管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二是不断拓宽公众参与数字监管的渠道。TNA依托官方网站、数字平台和社区项目拓展公众参与数字监管的路径。例如,以“Community Hub”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中,公众不仅能够获取档案资源信息,还能够参与档案利用、项目合作和意见反馈等交互活动,使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档案资源监管过程^[30]。同时,TNA通过“Spaces, Places and Belonging”等项目,资助社区组织参与档案和文化遗产研究^[31],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引入了社会力量对档案资源管理和利用活动的监督。

三是通过行业协同机制提升公众参与广度。TNA推动制定的战略愿景《Archives Unlocked》^[32]以及“Our Digital Century”数字能力建设战略^[33],均是在广泛征求档案机构、文化遗产组织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使监管要求的确定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而是吸纳了来自行业和社会层面的反馈。

4.2 监管科技深度应用

技术手段在TNA数字监管体系中的深度嵌入,是其区别于传统档案监管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面对数字档案数量持续增长与业务流程日益复杂的现

实挑战,TNA将数字技术从辅助管理工具逐步提升为监管运行的核心支撑,推动监管方式从人工检查向技术驱动转变。

一是数字平台支撑监管活动全过程运行。如前所述,TNA持续完善了数字记录移交服务,实现数字档案在线移交、格式验证、元数据审核和风险识别等功能^[34-35]。该平台对不符合要求的记录可即时提示并中止移交。监管要求被嵌入档案移交流程之中,使档案质量控制从依赖事后审查转变为实时过程控制,有效提高了数字档案移交的规范化水平。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成为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TNA于2023年启动的云端数字保存服务建设,将数字档案长期保存纳入自动化监测体系^[36]。该平台可自动完成档案数据校验、监测和备份等操作,对保存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现即时发现与响应。与此同时,TNA持续维护PRONOM文件格式注册库,对数字文件格式进行系统识别与风险检测^[37]。通过云平台 and 格式注册库的协同运行,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且持续地掌握数字资源的技术状态,增强对数字档案长期保存风险的控制能力。

三是智能化手段开始进入监管执行层面。如前所述,TNA已经试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记录进行模式识别与异常筛查^[38],相较传统人工抽查,在监管覆盖面与响应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

四是技术标准将风险管理纳入常态化监管框架。TNA提出数字连续性理念,并配套发布《理解数字连续性》《管理数字连续性》等指南^[39-40],将数字资源风险管理纳入技术监管框架。通过标准化工具,TNA对数字档案在系统迁移、软件更新和格式变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识别。由此,数字档案监管逐渐由依赖人工经验的事后检查转向基于标准要求的持续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也由单一环节的检查延伸至数字档案生命周期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总体来看,技术在TNA数字监管体系中已经不再只是档案管理的工具,而是监管规则执行、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的系统性支撑。这种技术深度嵌入的监管模式推动了档案数字监管由人工监管向技术监管、由阶段性检查向持续性监测、由经验管理向数据治理的阶段演进。

4.3 监管法治不断完善

法治体系的持续完善,是TNA数字监管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档案数字监管法律框架。如前所述,英国已形成了《公共档案法》《信息自由法》《数据保护法》《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法规

体系^[41-44]。二是持续推动数字环境下监管规则的更新。随着数字档案和数据治理问题日益突出，TNA于2024年推动了《数据（使用与获取）法案》立法进程，该法案于2025年正式通过^[45]。该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共利益存档活动在数据保护框架下的合法地位，解决了档案机构在数字环境下长期面临的一项制度性障碍，即经数据主体同意收集的个人信息能否以存档为目的继续保存。法案通过后，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随即就研究、存档和统计条款发布了配套指引，为档案机构长期保存和利用数字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46]。三是行业组织和监管机构共同推动监管细则落地。在《数据（使用与获取）法案》审议期间，英国档案与记录协会（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联合TNA、苏格兰国家记录署（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和北爱尔兰公共记录署（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共同推动“公共利益存档”（Archiv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相关政策讨论与行业规范建设，推动形成行业的统一规范^[47]。特别是在此期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也同步更新了研究、存档和统计活动相关数据保护指引，为档案机构开展数字监管提供操作层面的参照^[48]。四是修订自身监管规则以适应法律环境变化。TNA的再封闭政策自2010年制定以来已多次修订，最近一次重大调整发生在2018年，以回应《数据保护法》实施后的新要求^[49]。信息管理评估计划（IMA）及其配套的成熟度评估工具，也随着数字档案管理需求变化不断更新^[50]。

5 结语

本文以TNA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文件、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及监管实践等公开资料，从档案人员、档案机构、档案资源和档案业务四个维度分析了其数字监管实践，并归纳出公众参与得到保障、监管科技深度应用和监管法治不断完善这三项主要特征。上述研究结果可对我国相关的监管实践提供参考和启迪。但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我国与英国国家档案管理体制不同，档案事业的实际情况也不同，在具体的参考借鉴中，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适用为准，不宜照搬。特别是，在倡导积极拥抱监管科技时，需避免“唯技术论”，尽量规避“技术监管”中的弱人文关怀与算法缺陷，必要时仍须辅以人工检查与确认，慎重处理数字监管中出现的明显违背常识的弱人工智能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监管能力是“现代国家的四大基础性能力之一”^[51]，加强档案数字监管对于维持新时期的档案工作秩序、助力档案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档案信息数据化生态安全治理体系研究”（21BTQ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EB/OL]. (2026-06-11)[2026-06-25].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6/c75591cb82564d669635c859041512cf.shtml>.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 (2021-06-08)[2026-06-25].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106/899650c1b1ec4c0e9ad3c2ca7310eca4.shtml>.
- [3][14][27][41] UK Public General Acts. Public Records Act 1958[EB/OL]. (1958-07-23)[2026-06-25].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Eliz2/6-7/51>.
- [4][16][23][34] The National Archives. Step 4: Preparation for Transfer [EB/OL]. (2024-03-13)[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e-information/digital-records-transfer/digital-transfer-steps/step-4-preparation-for-transfer/>.
- [5]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troduction to the Section 46 Code and Maturity Assessment Tool [EB/OL]. (2025-11-14)[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e-information/ima/introduction-to-the-section-46-code-and-maturity-assessment-tool/>.

[6][17][50]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essment (IMA) programme [EB/OL]. (2026-05-14)[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ategory/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e-information/page/11/>.

[7][18][25]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troduction to the Digital Appraisal, Selection and Sensitivity Review Maturity Assessment Tool [EB/OL]. (2025-08-06)[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e-information/ima/introduction-to-the-digital-appraisal-selection-and-sensitivity-review-maturity-assessment-tool/>.

[8][21][36] The National Archives. Cloud Alpha for Transfer of Digital Records [EB/OL]. (2023-12-19)[2026-06-25]. <https://www.contractsfinder.service.gov.uk/Notice/96dad213-dfca-4205-8a59-36bf4a00038c>.

[9] UK Parliament. Writt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EB/OL]. (2025-01-27)[2026-06-25]. <https://questions-statements.parliament.uk/written-questions/detail/2025-01-27/26414>.

[10] The National Archives. Plugged In, Powered Up: Highlights [EB/OL]. (2024-05-15)[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our-archives-sector-role/our-digital-century/plugged-in-powered-up-highlights/>.

[11][3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ur Digital Century [EB/OL]. (2024-03-27)[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our-archives-sector-role/our-digital-century/>.

[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Novice to Know-How [EB/OL]. (2025-05-12)[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advice-and-guidance/managing-your-collection/preserving-digital-collections/novice-to-know-how>.

[13][22][37]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24–25[R/OL].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2025-07-18)[2026-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national-archives-annual-report-and-accounts-2024-25>.

[15] UK Government.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Management of Records Issued under Section 46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EB/OL]. (2021-07-15)[2026-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on-the-management-of-records-issued-under-section-46-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2000>.

[19] The National Archives. PRONOM[EB/OL]. (2006-03-23)[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PRONOM/>.

[20][39]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derstanding Digital Continuity [EB/OL]. (2014-02-25)[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e-information/policy-process/digital-continuity/what-is-digital-continuity/>.

[24][35] 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TDR: The hard drive forward [EB/OL]. (2024-09-17)[2026-06-25]. <https://www.digipres.org/publications/ipres/ipres-2024/papers/tdr-the-hard-drive-forward/>.

[26][38] UK Parlia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EB/OL]. (2025-01-27)[2026-06-25]. <https://questions-statements.parliament.uk/written-questions/detail/2025-01-27/26414>.

[28][42] UK Public General Ac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EB/OL]. (2000-11-30)[2026-06-25].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ukgwa/20221201170002/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0/36>.

[29] UK Parliament. Written questions, answers and statements—The National Archives’ Reclosure Panel[EB/OL]. (2024-10-08)[2026-06-25]. <https://questions-statements.parliament.uk/written-questions/detail/2024-10-08/HL1366>.

[30]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mmunity Hub [EB/OL]. (2026-05-12)[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ommunity-hub/>.

- [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to establish new hub for community-led research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sector[EB/OL]. (2025-02-07)[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news/the-national-archives-to-establish-new-hub-for-community-led-research-in-the-cultural-heritage-sector/>.
- [32] The National Archives. Archives Unlocked: The Vision for Archives in England [EB/OL]. (2022-11-23)[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our-archives-sector-role/celebrating-archives/a-year-in-archives/a-year-in-archives-2022/forewords/>.
- [40] The National Archives. Managing Digital Continuity [EB/OL]. (2017-02)[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ocuments/information-management/managing-digital-continuity.pdf>.
- [43] United Kingdom. Data Protection Act 2018[EB/OL]. (2018-05-23)[2026-06-25].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2/contents>.
- [44]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Guide to the UK GDPR[EB/OL]. (2024-12-17)[2026-06-25].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uk-gdpr-guidance-and-resources>.
- [45]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Data (Use and Access) Act 2025[EB/OL]. (2025-06-19)[2026-06-25]. <https://bills.parliament.uk/bills/3825>.
- [46][48]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Research, Archiving and Statistics Guidance[EB/OL]. (2024-12-17)[2026-06-25].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research-archiving-and-statistics-provisions/>.
- [47] 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 Archiv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EB/OL]. (2026-06-25)[2026-06-25]. <https://www.archives.org.uk>.
- [49] The National Archives. Reclosure Policy and Guidance[EB/OL]. (2025-10)[2026-06-2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legal/takedown-and-reclosure-policies/reclosure-policy/>.
- [51] 王绍光. 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3):8-10.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upervision of Archive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LI Yiting, XU Xinyou

(College of Societ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Abstract: Digital supervision of archives is a new model that integrates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archiv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rchiv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aking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digital supervision practices from four dimensions: archival personne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strong public participation,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regulatory technologie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supervision. This study offers insights for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ways in digital supervision of archives in China.

Keywords: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Archival supervision; Digital supervision of archives

以人文关怀为桥，让档案服务“出圈”：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世代之旅”实践及启示

林禹彤^{1,2} 刘潇¹ 杨静¹

(1. 盐城师范学院, 盐城 224007; 2.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镇江 212013)

【摘要】文章以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的“世代之旅”项目为案例，分析人文关怀推动档案服务突破专业边界的实践路径。该项目的主要实践特色表现为：突破传统档案服务圈层，将档案服务融入社区发展场景；精准回应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档案服务的人文关怀；创新档案展示与叙事方式，促进公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该项目对我国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启示在于：强化社会责任，拓展档案公共服务边界；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分众化人文服务体系；创新档案叙事与活化方式，增强服务吸引力与感染力；健全多元协同机制，推动档案服务深度“出圈”。

【关键词】档案人文关怀；档案馆服务；国外档案工作

【作者简介】林禹彤，盐城师范学院本科生、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信息资源管理，邮箱：linyutong730@163.com；刘潇，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杨静（通信作者），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国外档案工作研究，邮箱：morning_2012@163.com。

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与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全球档案事业正经历从“保管型”向“服务型”的深刻转型。传统档案服务长期受困于“馆墙之内”的局限，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科研、公务等特定群体，服务形式以静态查询、文献借阅为主，难以满足公众对档案文化的多元化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档案资源与社会生活的联结。这一困境并非个例，而是各国档案机构在推进公共服务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共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打破档案服务的边界限制，让档案资源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融入社会生态”，成为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命题。

人文关怀理念的注入，为破解这一命题提供了关键思路。档案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不仅蕴含着客观的文献信息，更承载着个体情感、群体记忆与国家文化基因。当档案服务以人文关怀为导向，便不再是冰冷的信息传递，而是能够精准回应不同群

体的精神需求与情感诉求，进而搭建起档案机构与公众之间的情感桥梁。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总体要求中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并在“持续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能力”任务下提出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推动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向基层延伸等要求^[1]。这些部署体现了档案公共服务对公众需求、利用权益和服务可及性的重视，也为档案馆践行人文关怀、拓展服务边界提供了政策依据。这表明，档案服务的现代化转型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封闭边界，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具温度、更具广度的公共服务。

近年来，国际档案学界围绕档案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已展开深入讨论：有学者倡导档案工作者应承担社会责任，利用档案力量促进多元包容与社会正义^[2]；有研究揭示了社区驱动的档案实践如何挑战传统专业范式，推动主流档案机构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工作方式^[3]；档案工作者逐渐由“被动的保管者”转变为档案遗产的主动塑造者，并进一步承担社会中介者和社区促进者的角色，档案馆

也由相对封闭的记录保存场所逐步走向更加开放的社会参与空间^[4]。国内档案学界围绕这一命题已形成一定的研究积累。有学者聚焦档案人文关怀核心议题,以政策法律为支撑,强调以人为本、服务落地,契合档案向服务型转型的趋势^[5-7];有学者多维度探讨了档案机构的社会服务属性,提出档案工作应突破传统框架、赋能社会治理的重要观点^[8-10];还有学者结合“互联网+”背景,分析了人文理念在档案馆公共服务中的融入路径^[11-12]。同时,国内研究也关注到档案服务的代际传承与特殊群体关怀,有学者以档案文化养老为切入点,探索档案资源与不同群体需求的结合模式^[13]。然而,围绕人文关怀如何推动档案服务突破专业圈层、拓展社会边界的研究仍较为欠缺,相关实践案例的深度剖析与经验提炼尚有拓展空间。

近年来,部分国家的档案机构已展开积极探索,其中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The UAE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NLA)参与的“世代之旅”(Journey of Generations)项目,堪称以人文关怀推动档案服务“出圈”的典型实践。该项目跳出传统档案服务的框架,将档案资源与社区代际沟通、老年群体关怀等社会需求深度结合,通过跨界合作、沉浸式体验、精准服务等方式,让档案服务突破馆域限制,融入社区生活,不仅彰显了档案的社会价值,更重塑了公众对档案机构的认知。本文以“世代之旅”项目的实践为研究对象,挖掘其档案服务与社区生态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旨在为我国档案馆强化公共服务属性、践行人文关怀理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 阿联酋“世代之旅”项目的实践与特色

2.1 “世代之旅”项目概况

2019年2月,阿布扎比社区发展部成立名为玛安(Ma'an)的社会平台。该平台旨在将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当地社区四大主体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支持阿布扎比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目标,形成多元参与的社会发展合力^[14]。该平台通过促进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将各个年龄段的人聚集在一起,从而推动阿布扎比的文化转变。玛安致力于促进阿布扎比全体居民的社会融入与支持服务,重点关注“坚定者”(阿联酋对残障人士的官方称谓)、老年人、儿童、妇女及弱势群体,并通过相关项目为社区成员带来积极改变。

“世代之旅”项目是该平台的重要内容之一,于2019年启动,是一项代际参与计划,体现了阿联酋领导层对老年人和居民的关注,以及在他们和

更广泛的社区之间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15]。“世代之旅”项目自启动以来吸引了超过600名志愿者和450名老年人及居民。这些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聚集在一起,培养代际情感,并鼓励老年人和年轻群体之间传递知识、经验和智慧^[16]。“世代之旅”为老年人和年轻人营造了积极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有机会结识新朋友、探索新地方,并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来扩展参与者的知识。

2.2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世代之旅”项目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通过参与“世代之旅”项目活动,联合阿布扎比社区发展部,组织老年人、居民和志愿者参观档案馆,凸显了老年人的价值贡献。参观活动的内容包括:展示阿联酋部分领导人与老年人的历史照片、举行老年人与青少年的座谈会、参观展厅等,活动使老年人有机会重温其在过去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记忆,展现了阿联酋人民面对挑战的决心。此次参访既是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履行社会责任、肯定老年群体对国家建设贡献的具体行动,也是“世代之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通过档案展示与代际对话,进一步增进了老年人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世代之旅”项目旨在将年轻人与老年人联系起来,从而丰富年轻人的经验,推动代际经验传承与创新激发,让不同年龄阶段的智慧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老年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也得到了尊重、爱、善意和体面的生活^[17]。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与人文关怀,这一实践集中体现了档案馆以人文关怀拓展公共服务边界的可能性。作为阿拉伯海湾最古老且馆藏最为丰富的官方国家级档案机构,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自1968年成立至今,已发展成中东第一、世界第六的先驱性机构,长期致力于保存国家记忆、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并开展公共文化服务^[18]。其参与“世代之旅”的实践,为我国档案馆关注老年群体、彰显其社会价值提供了有益参考。

2.3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世代之旅”活动的亮点分析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世代之旅”活动,并非单纯开展档案展示或文化宣传,而是以档案资源为媒介,将老年群体关怀、代际交流、国家记忆传承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该活动通过跨部门合作拓展档案馆参与社会服务的场景,以老年群体的生命经验和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并借助现代展示技术与叙事方式激活档案价值,体现了档案服

务由馆藏利用向社会参与、由资源提供向人文关怀延伸的实践转向。

从档案服务“出圈”的角度看,“世代之旅”活动突破了档案馆以馆藏保管、查档利用、展览宣传为主的传统服务边界,将档案资源嵌入社区发展、社会关怀和代际沟通等更广阔的公共场景之中。其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主体与场景的跨界、服务对象与参与机制的转变、展示技术与叙事方式的创新三个维度,体现了档案服务突破专业边界、融入社会生态的实践特征。

2.3.1 突破传统档案服务圈层,融入社区发展场景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世代之旅”活动的首要特色,在于突破档案馆相对独立的业务边界,将档案服务纳入更广泛的社区发展和社会关怀项目之中。该活动并非档案馆独立策划的一般性参观项目,而是由档案馆与阿布扎比社区发展部合作开展,并作为“世代之旅”代际参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合作方式使档案工作与社区参与、老年群体关怀和代际沟通等公共议题建立起直接联系。在这一合作框架下,档案馆依托馆藏资源、展览空间和专业能力,为“连接青年与长者”“传递生活经验”和“彰显长者贡献”等社区发展目标提供文化支持。档案馆的角色因而不再局限于保存历史记录和提供查档利用,而是进一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政府部门共同设计和实施面向特定群体的文化服务项目。

由此可见,档案服务的“出圈”不仅表现为服务空间的延伸,更体现为合作主体、服务场景和公共议题的拓展。通过参与地方社区项目,档案馆将馆藏资源与社会需求相衔接,使档案服务由以馆藏和机构为中心,逐步转向以社会需求和公共价值为导向。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实践,拓展了档案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社区发展的路径,也推动其由历史记录保管机构向社会记忆服务者和公共文化参与者转变。

2.3.2 精准回应老年群体需求,彰显档案服务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精神需求、价值尊严和社会发展^[19]。“世代之旅”活动以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将档案展示、记忆唤醒和代际交流相结合,回应了老年人在情感联结、社会参与和价值认同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首先,活动通过档案资源重新呈现老年群体的社会贡献。参加活动的老年人被称为“长者公民”(senior citizens),这一称呼体现了对其人生经验、社会地位和国家贡献的尊重。通过展示反映教育、

采珠、农业和渔业等领域的档案与社会记忆,活动将老年人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国家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使其不再只是被关怀和照护的对象,而被呈现为社会历史的亲历者、国家建设的参与者和集体记忆的承载者。

其次,档案展示为老年群体提供了记忆唤醒与公共表达的机会。老年人在观看与自身生活经历相关的历史照片和展览内容时,可以重温过往经验,并通过回忆和讲述将个体记忆转化为可被倾听、理解和传承的社会记忆。在这一过程中,档案不再只是供人观看的历史材料,更成为连接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促进情感表达和经验分享的媒介。这种服务方式有助于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感、归属感和尊严感,也为档案机构加强口述历史采集、社会记忆保存和社区档案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

再次,代际交流机制提升了老年群体在档案叙事中的主体性。相关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理论指出,老年人在接受社会支持并获得社会认同时,更有动力向他人提供支持,由被动的支持接受者转变为社会互动的积极参与者^[20]。“世代之旅”活动通过组织老年人与青年开展交流,使老年人由展览中的“被呈现者”转变为档案记忆的“讲述者”和文化经验的“传递者”。他们通过分享个人经历、职业经验和生活智慧,主动参与档案意义的阐释与传播。由此,老年群体不再只是档案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档案记忆的亲历者、阐释者和传播者,体现了档案馆秉持人文关怀,对公众主体地位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尊重,使档案机构成为守护群体记忆、彰显群体价值和促进社会连接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21]。

2.3.3 创新档案展示与叙事方式,促进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在“世代之旅”活动中,通过现代展示技术和多元叙事方式,将国家历史、社会发展与个体记忆有机结合,拓展了档案展示的知识传播和情感沟通功能。参观者在谢赫·扎耶德·本·苏丹大厅的参观体验,不再局限于观看档案原件和阅读文字说明,而是能够通过互动化、情境化的展示方式理解档案内容。

首先,现代展示技术增强了档案信息的可感知性和参与性。相较于“文字说明+实物陈列”的传统模式,互动展示和多感官体验能够将抽象的历史信息转化为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降低公众理解档案内容的门槛。这种展示方式既有助于老年群体唤起与自身经历相关的历史记忆,也能够增强青年群体接触档案、了解历史的兴趣,使档案展示由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更具参与性的知识体验。

其次,“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叙事强化了档案资源的意义表达。展览以国家发展历程为线索,对不同时期的档案资源进行系统组织:通过历史档案呈现国家建设初期的发展历程和社会成员的贡献,通过记录当代发展进程的档案展示国家建设成就,并依托对档案资源的梳理与阐释展望未来发展愿景。这种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叙事结构,使分散的档案材料被纳入连贯的国家发展故事之中,有助于参观者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体经历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再次,人文关怀导向的档案叙事增强了展示的情感表达功能。档案展示不仅承担知识传播任务,也能够通过人物经历、生活场景和社会记忆的组织,引导公众从具体的个体故事进入更广阔的历史情境。参观者在理解国家发展历程的同时,也能够感知普通社会成员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从而形成对群体经验和国家记忆的情感共鸣。

因此,“世代之旅”活动中的档案展示实现了由静态陈列向互动体验、由材料呈现向叙事建构、由知识传播向情感沟通的拓展。档案不再仅仅是保存历史、证明事实的凭证,更成为激活社会记忆、连接不同群体和促进价值认同的公共文化媒介,体现了人文关怀导向下档案展示创新的实践价值。

3 “世代之旅”项目对我国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启示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世代之旅”活动的实践,为全球档案机构打破传统服务边界、践行人文关怀理念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范式,其以档案资源为核心,通过跨界融合、精准关怀、创新展示的多元举措,让档案服务真正走出馆舍、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实现了档案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也对我国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3.1 强化社会责任,拓展档案馆公共服务边界

档案馆不仅履行保存历史记录、传承社会记忆的基本职能,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也有责任依托档案资源和专业能力回应社会需求、参与公共服务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通过参与面向老年群体的社区项目,使档案馆由历史记录的保管者进一步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协同的参与者,其跳出“重保存、轻利用”的传统框架,以“社会责任”为核心,针对老年群体打造专属活动,让档案机构成为连接历史与公众的纽带。这对于我国档案馆强化社会责任和社会服务属性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档案馆从“历史

资料的保管者”向“社会服务的参与者”转变。

其一,锚定国家战略目标,彰显档案的社会治理赋能作用。我国档案馆公共服务应当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与功能属性服务于国家建设,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蓝图之中,实现从“幕后守护者”向“战略赋能者”跃升。档案馆公共服务融入国家战略,是确保档案工作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保障和战略需求。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应该深度契合“增进公民福祉、传承国家精神”等发展要求,以档案力量赋能社会治理。档案机构以自身资源为载体,将国家战略具象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民生活活动,既助力解决地区社会治理痛点,又让档案工作成为支撑国家文化建设、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力量,凸显出档案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其二,打破服务场景局限,延伸服务触角。借鉴阿联酋“跨出圈”的模式,我国档案馆可突破馆舍空间限制,将档案服务拓展出去,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社会建设大局,将档案服务与社区治理、文化传承、代际和谐等社会目标相结合。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机构的跨界合作,搭建多元化的服务平台,让档案服务走出馆门,融入社区生态、校园文化、社会公益等多个场景。另一方面,要拓展服务对象的覆盖面,打破科研、公务等特定群体的服务局限,关注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让档案服务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

其三,树立“大档案服务”理念,将档案资源转化为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我国档案馆应摒弃“重藏轻用”的传统思维,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挖掘档案资源的多元价值,将档案资源转化为服务社会、惠及民众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挖掘档案中的历史文化、红色资源、民俗传统、时代精神等内容,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档案服务项目,让档案在凝聚社会共识、传承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档案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让档案资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

3.2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分众化人文服务体系

人文关怀是现代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也是档案馆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公众黏性的关键。档案彰显过去、记录现在、预见未来,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也应当在人文关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档案事业中践行人文关怀理念的核心要求在于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重视人的发展、关心人的情感等^[22]。

一方面,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打造精准服务。

老年群体作为历史记忆的承载者,既拥有丰富的口述史料资源,也有重温过往、获得社会认同的需求。档案机构可联合社区、养老机构等,开展“老年记忆采集计划”,系统性记录老年人的职业经历、生活故事、地方习俗等口述档案;举办“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展览、怀旧主题活动,让老年群体在参与中获得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通过推动档案文化养老,扩大老年文化服务供给^[23]。对于青少年群体,可开发档案研学课程、历史文化体验活动,通过互动式、沉浸式的形式,让青少年了解历史、传承文化。同时针对专业研究者、普通市民等不同群体,开发分层级服务,比如为研究者提供专题档案查阅绿色通道,为普通市民提供普及性和多元化档案文化服务,让档案服务覆盖社会各年龄段、各领域。

另一方面,注重服务细节的人文设计,让档案服务更具温度。档案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可以发挥档案的人文关怀价值,还能促进社会的平等与和谐^[24]。例如,在档案展示中融入情感化叙事,让档案背后的故事引发公众共鸣;在服务过程中提供个性化指导,帮助公众更便捷地获取档案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破时空限制,让档案服务更贴近公众生活。通过精准化、人性化的服务设计,让公众感受到档案服务的温暖与价值,提升档案馆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3.3 创新档案叙事与活化方式,增强服务吸引力与感染力

20世纪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虽然产生于图书馆学领域,但其以用户为中心、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25]可为档案利用服务提供启发:档案资源应当得到有效利用,公众应平等享有档案利用权,档案服务应帮助用户发现与其需求相关的资源并提高利用效率,档案馆也应在持续发展中不断完善服务。

档案工作的“人文转向”是当代档案学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势,本质上是一场从“以机构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范式革命。它使档案馆从一个冰冷的“文件仓库”转变为一个温暖的、包容的、充满活力的“记忆家园”和“社会对话的空间”。其最终目标,是让档案不再是少数人研究的故纸堆,而是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寻找身份、连接过去与未来、促进社会公平与理解的宝贵资源。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在活动中并非简单陈列档案,而是通过历史照片展示、专题演讲、沉浸式场馆体验等形式,让档案资源与公众情感、代际沟通需求深度结合,实现了档案资源的活化利用。这对我国档案馆突破传统档案利用模式、提升服务吸引

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国档案馆应转变档案利用思路,从“被动查询”向“主动活化”转变。针对不同群体的兴趣点与需求,挖掘档案中的故事性、情感性内容,开发多样化的档案文化产品。例如,围绕老年群体的成长经历,整理相关历史事件、生活场景类档案,制作怀旧主题短视频、音频节目;针对青少年群体,将档案资源转化为研学手册、互动游戏、情景剧剧本等,让档案知识以更生动的形式传递。

此外,应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档案活化,借鉴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沉浸式展示经验,打造沉浸式档案体验空间。通过还原历史场景、模拟档案形成过程等方式,让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增强档案服务的趣味性与感染力,让档案资源真正“活起来”,走进公众日常生活。

3.4 健全多元协同机制,推动档案服务深度“出圈”

档案服务的“出圈”并非单一维度的形式创新,而是资源、主体、场景的全方位融合与延伸,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通过深度融入“世代之旅”项目,与政府部门、社区机构多元协同,将档案服务从馆内延伸至社区生态,实现了档案服务从“专业领域”到“公共空间”的延伸。这一实践为我国档案馆推动服务“出圈”提供了核心思路:档案服务“出圈”的关键在于打破单一运营模式,以多元协同构建服务生态,以场景延伸拓宽服务边界,让档案资源真正融入社会生活、触达广泛公众。

首先,构建多方协同的档案服务联动机制,凝聚服务“出圈”的整体合力。档案馆要树立大文化观念,主动打破机构壁垒,建立与文旅、民政、社区发展等部门,以及社会组织、高校、企业、社区服务中心等主体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围绕社会治理、文化遗产、民生服务等共同目标,整合各方资源,明确分工协作,将档案服务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多元社会主体,延伸服务触角,是创新档案服务模式的重要着力点^[26]。通过联合打造特色档案项目、共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让档案机构从“单打独斗”变为“多方共建”,借助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与传播渠道,让档案服务走出馆舍、触达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为档案服务“出圈”提供坚实的主体支撑与资源保障。

其次,推动档案服务场景的全域延伸,打造无边界的档案服务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服务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和创新。唯有厘清服务场景之间的差异,才能有的放矢地确定服务内容和形式,避免“一刀切”的粗放式服务。“把档案装进用户的口袋”已经成为新时代档案服务的

普遍追求^[27]。档案馆应摒弃“以馆为中心”的服务思维,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档案服务场景向社区、校园、养老机构等公共空间延伸,打造“馆内+馆外”“线上+线下”的全域服务场景。在社区,可联合打造“社区记忆角”,挖掘地方档案资源讲好社区故事;在校园,可共建档案研学实践基地,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档案文化;在养老机构,可开展档案文化养老活动,唤醒老年群体的时代记忆。通过场景的持续延伸,使档案服务融入公众日常生活,让档案资源在不同场景中得到活化利用,实现档案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融入”转变,进而在多元公共场景中发挥文化教育、记忆传承和社会连接功能。

4 结语

阿联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参与“世代之旅”项目的实践,为档案服务“出圈”提供了成功范例。

其通过突破边界的跨界合作、聚焦特定群体的人文关怀、创新多元的展示形式,让档案服务从馆内走向社区,从专业领域走向公共空间,实现了档案价值与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对于我国档案馆而言,应借鉴这一实践经验,强化社会责任与服务属性,以人文关怀为核心打造精准化、多元化的档案服务,让档案资源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与公众需求,在推进文化自信、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省级重点项目)“基于文化和教育功能视角的档案馆公共服务研究”(202410324011Z)、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于国内外档案新闻分析视角下的档案学前沿探索”(202310324074Y)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EB/OL]. (2026-06-11) [2026-06-16].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6/c75591cb82564d669635c859041512cf.shtml>.
- [2] Jimerson R. Archives for all: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07(2): 252-281.
- [3] STEVENS M, FLINN A, SHEPHERD E. New frameworks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the archive sector: from handing over to handing 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1-2): 59-76.
- [4] COOK T. Evidence, memory, identity, and community: 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J]. Archival Science, 2013(2-3): 95-120.
- [5][22] 孙大东, 白路浩. 论《“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人文关怀理念的呈现及实现[J]. 档案与建设, 2021(7): 9-13.
- [6] 黄霄羽. 用热门技术显人文关怀拓教育类型重气候档案——2023年国际档案界回眸[J]. 中国档案, 2024(2): 80-83.
- [7] 曹玉, 锅艳玲, 常家源. 论新时期档案事业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基于新《档案法》的文本分析[J]. 档案学通讯, 2022(2): 66-74.
- [8][18] 黄霄羽, 徐晓苗, 姚静.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阿联酋国家档案馆利用服务的特点与启示[J]. 档案管理, 2022(1): 100-104.
- [9] 周林兴, 姜璐.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公共文化服务: 价值阐释、逻辑导向与机制构建[J]. 档案学通讯, 2026(1): 61-69.
- [10] 何小梅. 提升档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水平[J]. 山西档案, 2026(2): 82-85.
- [11][21] 杨静, 李冰. “互联网+”时代档案馆公共服务中的人文理念[J]. 中国档案, 2018(8): 32-33.
- [12] 马仁杰, 蒋潇洁. 论“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特点[J]. 浙江档案, 2021(11): 28-33.
- [13] 王培培. 综合档案馆文化服务创新实践[J]. 中国档案, 2025(10): 40-41.
- [14] MA'AN. About Ma'an[EB/OL]. [2026-06-06]. https://maan.gov.ae/en/about/?_gl=1*nh46eg*_ga*MTE1Mjk3NzQzMCAxNzQxODY0MTIz*_ga_NWK5KVRPCB*cE3NjMzNDIzODEkbzEkZzAkdDE3NjMzNDIzODEkajYwJGwwJGgw.

[15]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MA' AN. Ma' an encourages community volunteering through Journey of Generations[EB/OL].(2023-07-06)[2026-06-06].<https://maan.gov.ae/en/news/2709/>.

[16]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MA' AN. The 7th edition of Journey of Generations program[EB/OL].(2023-03-01)[2026-06-06].<https://maan.gov.ae/en/news/1788/>.

[17]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receives senior citizens whom it holds in high esteem[EB/OL].(2023-08-09)[2026-06-06].<https://www.nla.ae/en/news/the-national-library-and-archives-receives-senior-citizens-whom-it-holds-in-high-esteem/>.

[19] 杨洁, 黄霄羽. 彰显档案的人文关怀价值——英国 BBC 发布记忆项目档案帮助痴呆症患者 [J]. 北京档案, 2017(7):40-42.

[20] 陈蔚佳, 史莹莹, 戴诗梦等. 双向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J]. 军事护理, 2024(2):56-59.

[23] 王培培. 综合档案馆文化服务创新实践 [J]. 中国档案, 2025(10):40-41.

[24] 黄霄羽. 用热门技术 显人文关怀 拓教育类型 重气候档案——2023 年国际档案界回眸 [J]. 中国档案, 2024(2):80-83.

[25] 苏瑞竹. 图书馆与人文关怀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29.

[26] 蔡梦虹.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服务转型升级策略 [J]. 山西档案, 2024(7):87-90.

[27] 刘世金, 田为付. 智能技术支持下面向用户需求的档案数字人文知识服务模式创新 [J]. 山西档案, 2025(9):131-133.

Humanistic Care as a Bridge to Broader Engagement in Archival Services: The UAE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Participation in the "Journey of Generations"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LIN Yutong^{1,2}, LIU Xiao¹, YANG Jing¹

(1.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7;

2.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Journey of Generations" initiative, in which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participated,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humanistic care enables archival services to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rogram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key practical features: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boundaries of archival servic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settings; responding precisely to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older adults and embodying humanistic care in archival services; and innovating archival exhibition and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foster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value recognition among the public. The program offer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services in Chinese archival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archival public services; adher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developing a differentiated humanistic service system for diverse user groups; innovating archival narratives and methods of archival resource activation to enhance the appeal and emotional impact of archiv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o enable archival services to reach wider audiences and become mo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society.

Keywords: Archival humanistic care; Archiv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archival practices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问题与路径

凡晓辉 聂云霞

(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苏州 215123)

【摘要】档案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老年群体与残障群体等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残障群体规模亦较为庞大,特殊群体对档案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但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仍面临诸多问题,制约特殊群体对档案资源的便捷获取。文章通过阐释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剖析当前体系建设在政策、设施技术、服务人员三大维度存在的问题,从健全专项政策法规、推进设施与技术精准适配、强化服务内容与人员能力建设三方面,提出科学可行的体系构建路径。

【关键词】档案服务;适老化;无障碍;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凡晓辉,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箱:837356101@qq.com,研究方向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聂云霞(通信作者),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yxnie@suda.edu.cn,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信息化。

1 引言

受生育率下降、大量人口步入老龄阶段等因素影响,全球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很多国家的重大挑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5.9%,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同时,我国残障群体规模同样庞大,总数超 8500 万^[2]。老年群体与残障群体的信息获取需求日益凸显,这些群体在利用档案资源时,不仅面临物理空间的通行阻碍,更存在信息获取的“数字鸿沟”。在人口结构变迁与社会公平诉求的双重推动下,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其服务的可及性直接关系到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与生活质量,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不仅是贯彻《“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3]等政策的基本要求,更是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伦理使命。因此,系统梳理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建设的问题,构建

科学有效的路径,已成为当前我国档案部门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十世纪末叶以来,档案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相关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国内,相关成果主要聚焦于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的现状问题、解决策略以及社交媒体的作用等方面。如田野^[4]从档案资源优化整合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构建了统一的老年服务档案知识本体模型,对老年服务档案的规范化建立与档案资源的便捷获取提出可行性建议。周铁梅^[5]以数智化为导向,分析档案信息服务适老化建设现状与困境,从档案信息服务资源、档案信息服务设施、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三方面构建优化档案适老化新路径。还有学者基于社交媒体环境下档案公共服务的优化,提出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提高无障碍档案服务质量的相关建议^[6]。

相比国内,国外更侧重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如 Ronald Gilardi^[7]认为,法律的规则和条例越来越频繁地规范着相关机构的运

作。如《美国残疾人法》不仅影响了档案服务的做法，还影响向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质量，因此，探讨档案服务与残疾人法案在一般情况下的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Clare Victoria Jeremy^[8]认为，尽管2010年英国《平等法》规定了为残疾人与老年服务使用者提供“合理调整”的立法义务，但档案服务的研究文献却忽视了无障碍主题。因此，制定法案框架是确保做出一致且充分合理调整的一种方式，以帮助和鼓励档案馆为用户提供平等的信息访问服务。同时，需要通过具体的档案认证标准和培训，以专业的方式推动持续的平等获取。

综观而言，无论是国内对于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的探索性成果，还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与实践经验，都是本文前期研究的良好借鉴。然而，当前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领域的研究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一是研究系统性不足，现有成果多为碎片化的实践总结或单一维度的理论探讨，未形成涵盖政策、设施、技术、服务、人员的完整研究体系；二是研究深度有限，对老年人以及残障群体的需求分析停留在操作不便等表层问题上，未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生理特征、心理需求与社会环境因素；三是研究实用性不强，多数理论研究提出的策略较为宏观，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与评估标准，难以直接指导实践。为此，本研究以构建“制度、技术、人员”三位一体的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为核心，深化对特殊群体需求的精准认知，提出可操作、可评估的构建路径，旨在推动档案服务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与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年人与残障群体在档案服务中感受到社会的温度与公平的价值。

2 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支撑

2.1 核心概念

2.1.1 档案服务适老化

适老化，指社会从各个层面做出调整，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过程。其低层次是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和社会参与环境；中层次是让老龄群体适应科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高层次是让社会适应人口老龄化，并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数字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老年人权益和维持社会均衡发展^[9]。在档案服务领域，适老化主要是指档案机构基于馆藏档案，借助相关仪器、设备，在指导公众查询和利用档案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提供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服务。具体而言：在内容方面，重点提供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民

生档案服务，如养老档案、医疗档案等；在服务方式上，简化档案查询流程，提供上门服务、电话预约查询等方式；在服务环境建设中，打造舒适、便捷、安全的档案利用空间，配备老花镜、轮椅坡道（或无障碍坡道）等设施。

2.1.2 无障碍体系

无障碍是指功能障碍者与其他人在平等基础上能够享用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设施、服务、信息、产品等^[10]。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既是无障碍环境的国家制度安排，也是无障碍体系的整体逻辑框架^[11]，遵循谁来构建、构建什么、如何构建、效果如何的逻辑思路（如图1所示）。在档案服务领域，无障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旨在消除老年群体、残障群体以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在利用档案资源和享受档案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障碍，确保他们能够平等、自主、便捷地获取档案信息，参与档案相关活动，从而实现档案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设施无障碍、信息无障碍与服务无障碍是无障碍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施无障碍聚焦于基础设施，具体指档案机构需优化线下服务环境，配备无障碍通道、低位服务台、防滑地面、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同时按需配置放大镜、盲文阅读器、语音提示设备等辅助工具，消除特殊群体进入档案机构、使用服务设施时的物理障碍与操作壁垒。信息无障碍是指在数字化时代，档案机构通过推进档案信息数字化，依托线上“一网通查”打破时空限制，确保特殊群体能够无障碍地获取和使用数字化档案信息。服务无障碍强调档案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仅要落实线下“一窗即办”等贴心高效的服务举措，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的需求和感受，还要提供热情、周到、专业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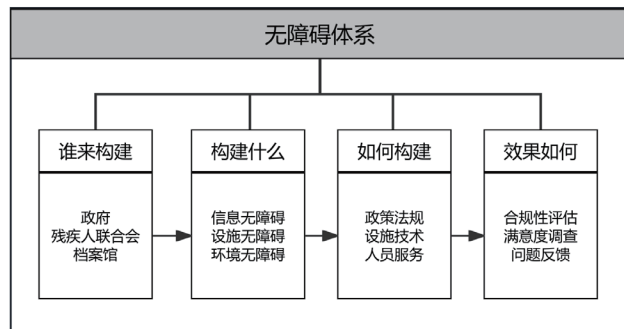


图1 无障碍体系整体逻辑框架

2.2 相关理论支撑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是心理学领域中人本主义流派的重要理论，

由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于1943年在《人类动机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12]。该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划分为生理、安全、情感、尊重、求知、审美和自我实现需求，而当下特殊群体不仅对物质层面的生理与安全有所需求，对精神性需求的追求也愈发强烈，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正是回应这一需求的关键。一方面，特殊群体查询档案、历史凭证等行为，本质是对情感需求的满足，通过档案唤醒记忆、维系情感联结；另一方面，档案机构针对特殊群体身体与行为特征设计的适老服务，如大字版指南、专人协助查档等，体现对特殊群体的尊重，满足其尊重需求。此外，部分特殊群体参与口述档案采集、展览讲解等活动，在服务档案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进一步印证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是需求层次理论在档案领域的具体实践。

2.2.2 信息公平论

信息公平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旨在扭转全球信息传播失衡、不公现状的传播改革理论。邵培仁^[13]于2008年对信息公平论进行了系统阐释，他认为，信息公平是在信息交流中，人类追求自己所选择的信息方面应享有均等机会，且最终不应出现有用信息匮乏和无用信息爆炸的结果。具体到档案服务领域，该理论要求档案机构为老年人和特殊群体提供平等的档案信息获取机会，保障他们在档案信息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性。在档案数字化建设中，要确保档案数字资源的无障碍访问，避免因技术门槛导致老年群体和残障群体被排除在外。

3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的构建不仅是特殊群体平等获取档案服务、维护切身利益的途径，更是夯实社会公平的基石、推动档案部门开发多元资源，实现档案事业从“标准化管理”向“现代化服务”转型的关键步骤。因此，实现“无障碍”与“普适性”双赢，提升档案整体服务效能，对档案事业发展大有裨益。

3.1 保障特殊群体权益，夯实社会公平基石

从信息公平论角度出发，老年、残障等特殊群体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利，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体现，而档案服务的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正是这一权利在档案领域落地的重要实现途径。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常需依赖档案维护切身利益，比如办理养老金核算时需查阅工龄档案、进行遗产公证时需调取亲属关系档案，这些需求若因服务障碍

而无法满足，将直接影响其基本权益。以随州市档案馆为例^[14]，针对老年人视力减退、行动不便的特点，馆内不仅设置了大字体导向标识，还在服务台配备老花镜、轮椅等辅助器具，同时安排专人协助老年人梳理查询需求、简化登记流程，让许多原本因“看不懂标识、走不动路”而怯步的老年人，顺利获取了所需档案材料，有效维护了自身权益。对于残障群体，依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15]中“确保残疾人无障碍获取信息”的原则，该体系是打破信息壁垒的重要支撑。视障群体难以通过传统纸质档案获取信息，盲文档案、有声档案便成为其接触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听障群体参与档案文化活动时，手语讲解、字幕辅助则是保障其有效参与的关键。北京市档案馆在2025年国际档案日举办“触摸历史”档案体验活动^[16]，通过制作可触摸的文物档案模型，搭配专业讲解人员的细致描述，让视障参与者“触摸”到历史细节，这种针对性服务不仅满足了视障群体的文化需求，更让其感受到社会尊重，切实筑牢了社会公平的基石。

3.2 驱动档案事业转型，拓展档案服务方式

传统档案服务多以“标准化、通用化”为导向，侧重档案实体管理与常规用户需求，难以适配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而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的构建，正倒逼档案部门从设施、资源与技术方面进行全方位革新，成为推动档案事业向现代化服务转型的重要动力。一是，在设施建设层面，无障碍改造并非仅服务特殊群体，而是对档案馆空间功能的整体优化。如青岛市在档案馆周边老旧小区改造中^[17]，同步推进馆内及周边无障碍通道建设，不仅增设了符合标准的轮椅坡道、无障碍电梯，还对卫生间进行适老适残改造，配备扶手与紧急呼叫按钮。这些改造不仅让肢体残障者、老年人能顺畅进出档案馆，也为携带重物的访客、推婴儿车的家长等普通用户提供了便利，实现了“无障碍”与“普适性”的双赢。二是，在资源开发层面，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同样推动着档案服务升级。为满足特殊群体需求，档案部门开始开发有声档案、大字版档案等多元资源，如将地方历史档案改编为有声故事，方便视力不佳的群体“听档案”。三是，在技术应用层面，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推动档案服务从“单一供给”向“多元适配”升级。如引入读屏软件、屏幕放大器等辅助工具，同时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的App适老助残改造标准，优化档案数字平台界面——简化操作步骤、增大字体按钮、增设语音导航功能，让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依赖辅助技术的残障群体，都能便捷使用档案数字资源。这些

变革不仅填补了特殊群体服务的空白，更推动档案事业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效能。

4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不仅众多地方档案馆制定了规章制度，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一些学者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本文围绕“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通过互联网、中国知网数据库等进行文献调研分析，并结合对苏州市档案馆等地的走访情况（如表 1 所示），梳理出相关问题。

服务平台，明确“大字版档案字体不小于四号”等细则；而中西部基层档案馆，因无专项政策要求与资金支持，仅在服务台摆放老花镜，未开展其他适老改造。最后，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缺位。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专项评估机构及配套运行机制，既无定期考核指标，如特殊群体查档满意度、无障碍设施使用率等，也无违规问责制度。这就可能导致档案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沦为一纸空谈，无法有效推动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建设。

4.2 服务设施与技术应用适配性不足，存在数字鸿沟

档案服务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应用存在显著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特殊群体档案利用权益。

表 1 调研问题与解答节选表

调研问题	解答
落实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相关政策的具体依据是什么？是否制定了专项服务规范或量化执行标准？	无障碍设施参考的是《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等标准要求，但如何具体服务暂时没有统一标准。
馆内已配备的适老化与无障碍物理设施有哪些？	在档案馆北门设置了轮椅坡道，方便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出行，且馆前小广场面积大，可以停放至少八辆老年人代步小车。同时在馆内配备了便民医药箱、导向标识、可识别盲道、老花镜等基础设施设备。
贵馆的数字档案平台（官网、APP 等）是否进行了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	暂时并未涉及，但考虑到具体情况，未来会进行改造。
特殊群体到馆查档时，是否有专人协助梳理需求、简化登记流程？	特殊群体到馆时，保安首先会进行指引，梳理查询需求，并配备专人辅助查档。
馆内工作人员是否接受过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专项培训？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会不定期对馆内服务人员进行无障碍专门培训，馆内未开展专门培训。

4.1 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碎片化突出，执行监督机制缺位

当前我国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方面的政策法规呈现“通用为主、专项缺失”的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专门性指导。首先，档案相关法律法规未对适老化与无障碍进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8]并未提及“无障碍、适老化”，在法律层面的规定较为模糊。其次，现有相关规定多散嵌于档案管理通用条例中。如《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19]第三章提到“设置无障碍通道与标识，考虑特殊群体需求”，却未明确通道坡度、标识字体大小、高度等具体参数。这种“模糊化”政策导致地方档案机构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出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如天津蓟州档案馆^[20]，自主投入资源制定具体的档案适老化服务规范，研发关怀版移动

一是设施建设层面，多数档案馆虽完成基础无障碍改造，但细节设计与特殊群体实际需求脱节，存在“形式化”问题。根据武汉市各区档案馆的调研^[21]，从基础设施来看，除轮椅坡道和无障碍电梯的配置率分别达到 70% 和 50% 外，其他无障碍设施的配置率均低于 50%，如仅极个别档案馆有配备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服务台等设施，而盲道、残疾人专用阅览室的配置率则为 0%。从档案查阅辅助设备来看，各档案馆普遍配置不足。除老花镜基本实现全覆盖外，语音导航机、听觉辅助器等设备所有档案馆均未配备。同时，部分档案馆标识系统采用蓝底白字设计，对比度不足，视力减退的老年人在强光下难以辨认，服务大厅也并未设置防滑地面与应急呼叫按钮。二是数字技术应用层面，数

字鸿沟问题更为严峻。一方面,档案数字平台适老化改造滞后。如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APP^[22]需完成“注册、实名认证、人脸核验、选择档案类型、输入关键词”等多个步骤,且不支持一键登录、语音输入等功能,较为繁琐,高龄老人及残障群体不便操作。再如苏州档案信息网^[23],也并未在平台上设置老年关怀模式,且网站本身功能繁杂,不适宜老年人操作。另一方面,针对残障群体的技术适配缺失。全国数字档案馆较少配置屏幕阅读器,视障群体查询档案进行登录时,读屏软件无法识别验证码,难以使用移动端APP进行查档;盲人档案、手语视频等特殊资源占比较少;听障群体因无字幕辅助,也无展品讲解方案,理解档案讲解内容存在困难。这就导致特殊群体在查询档案时面临着物理与数字层面的双重障碍,难以真正享受档案服务。

4.3 服务内容与人员能力针对性匮乏,供需匹配失衡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建设在服务内容供给与人员能力支撑层面的针对性缺失,是导致特殊群体需求与档案服务供给严重错位的核心症结,具体体现在服务内容同质化与人员能力专业化不足两大维度。其一,在服务内容层面,当前档案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多局限于“基础查询”,未覆盖特殊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呈现“同质化、表层化”特征^[24]。针对老年群体,服务常聚焦于社保档案、工龄档案等民生类档案的查询协助,却忽视其精神文化与个性化需求,如家庭档案整理指导、老照片修复、口述历史采集等与老年人生活记忆紧密相关的服务几乎空白,无法满足老年人通过档案维系家庭情感、留存人生经历的需求;针对残障群体,服务多采取被动响应模式,仅在用户主动提出需求时提供临时协助,未主动开发适配其使用习惯的档案资源。视障群体难以通过触觉或听觉接触历史档案,听障群体参与档案文化活动时也因缺乏字幕辅助或手语讲解而无法有效获取信息,服务内容与特殊群体实际需求存在显著脱节。其二,在人员能力层面,档案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适老化、无障碍服务需求不匹配^[25]。多数档案工作人员未接受过系统化的专项培训,对老年人生理特征与心理需求缺乏认知,对残障群体的沟通规范与辅助工具使用方法掌握不足,导致服务过程中常出现“想帮不会帮”的情况。部分工作人员还存在认知偏差,将适老与无障碍服务视为额外工作负担,服务态度消极敷衍,缺乏人文关怀意识。此外,具备档案学专业知识与老年学、康复医学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难以针

对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设计科学的服务方案,最终导致档案服务无法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供需匹配失衡问题突出。

5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的路径

基于上文的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内涵和框架,构建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需制度法规、设施技术、服务与人员能力等多维度统筹推进:既需以专项政策法规明确标准并强化监督,筑牢体系建设的制度根基;也需通过物理空间的细节改造与数字平台的精准适配,打通服务获取的双重通道;更要依托服务内容的多元拓展与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5.1 健全专项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构建“制定、执行、监督”闭环治理机制

为推进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建设,应加快健全专项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构建“制定、执行、监督”闭环治理机制,以系统性、强制性的制度保障各项工作有效落实。一是完善专项政策,细化服务标准。当前需加快出台档案领域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的专门政策文件,填补制度空白。建议联合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制定涵盖设施建设、技术应用、服务规范三大板块的实施细则,明确具体量化要求:设施方面,明确无障碍通道坡度、标识系统规格等具体参数;技术方面,规定数字平台应具备语音导航、一键登录、字体放大等适老功能;服务方面,落实专人协助查档、残障人士预约上门等服务内容。档案部门还应结合不同类型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与需求,制定个性化服务办法,提升服务精准性^[26]。二是强化监督评估,防止政策空转。建议在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中增设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专项考核,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各类档案馆进行评估,核心指标包括特殊群体查档满意度、无障碍设施使用率、专项资源覆盖率等。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对不达标的机构要求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其年度评优资格,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三是畅通反馈机制,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可在线下服务台设置意见箱,线上开通一键投诉渠道,形成闭环管理。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树立系统监管思维,完善依法治理依据,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秩序,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提升安全监管效能^[27],持续推动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建设走向深入。

5.2 推进设施与技术“精准适配”改造，打通物理与数字服务双通道

推进适老化与无障碍设施与技术建设，旨在筑牢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基石。一方面，在空间设施层面，应突破形式化改造局限，构建贴合特殊群体实际使用场景的无障碍环境。以上海市档案馆为例^[28]，该馆针对老年人与残障群体需求，开展档案馆系统性改造，并不断优化无障碍设施建设。在入口区域，除建设符合标准的轮椅坡道外，还增设扶手与防滑地垫，在坡道顶端设置缓冲平台，并在展厅增设可移动式坡道，极大提升了轮椅使用者的通行便利性；在服务大厅划分适老专区，配备可调节高度的查询台、带扶手的休息座椅，摆放老花镜、放大镜、血压仪、急救箱等辅助工具；档案查阅区采用柔和照明，文件柜设置可升降层板。同时，增设无障碍停车位与语音导航标识，解决老年人找路难、行动累的问题。如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厂甸11号院适老化改造项目^[29]。该项目通过公共空间无高差处理、社交空间与建筑适老化改造、完善室外公共服务设施等措施，形成完整无障碍流线，优化活动与社交环境，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有效解决老年人及高楼层居民室外如厕难题，成为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的可借鉴案例。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需以技术赋能打破数字鸿沟，构建适老助残的智慧服务系统。严格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30]，对档案查询APP、官网进行优化。如简化操作流程，将注册登录步骤从5步缩减至2步，仅保留手机号验证与一键登录，取消人脸核验等复杂环节；界面设计采用大字体、高对比度、少弹窗风格。还可以参考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在首页上提供老年关怀模式，支持页面放大且排版保持稳定，按钮尺寸也要符合特殊群体实际需求；新增语音助手功能，支持方言识别与语音输入查询，语音导航语速可调节。同时，加强残障群体技术适配，确保数字平台完全兼容屏幕阅读器，取消验证码识别环节，采用短信验证与人工审核。

5.3 强化服务内容“供需匹配”与人员能力建设，提升服务精准度与专业性

服务内容的优化需打破“基础查询”局限，覆盖特殊群体的多元化需求，给予其更多人文关怀，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转变^[31]。同时，还需加强人员能力建设，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在强化档案服务内容方面，应以无障碍服务为目标，主动改革不利于特殊群体查询、获取和有效利用档案的做法，推动服务理念从“坐等上门”向“主

动提供”转变。如上海市档案馆与市残疾人联合会不断加强合作共建^[32]，签署协议推进文化助残，通过培养志愿者、定期邀请残障群体观展等方式，为残疾群体提供贴心服务，践行文化助残理念。一方面，该馆通过增设专门服务窗口、咨询电话，编制服务指南与利用手册，完善引导标识，提供便利通道与人工帮助，并对档案馆库建筑、设备工具、网站及数据库进行无障碍技术改善，全面提升服务可及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面向“银发族”的特色服务，如开展民生档案整理进社区活动，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指导老年人整理老照片、书信、族谱等，提供档案修复与数字化扫描服务；定期举办口述历史采集会，记录老年人人生经历，形成口述档案并赠送副本，切实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

在人员能力建设方面，档案部门应重点提升面向特殊群体的专业服务与协同指导能力^[33]。具体而言，一是定期对窗口服务人员开展助残礼仪与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意识与能力；二是设立专门岗位或招募志愿者，指导特殊群体查找档案信息，帮助其提升信息获取能力；三是加强与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作，针对不同机构的服务特点，开展差异化的文件材料归档与整理指导，形成多方合力。譬如，栖霞区档案馆为切实解决辖区内特殊困难群众查档难、办事难问题^[34]，不仅开展服务人员助残专业培训，主动靠前服务，并联合街道、社区开通特殊群体查档绿色通道，协助调取社区无权限查阅的档案材料，全力保障特殊困难群众顺利办理困难扶助手续。同时建立“街道统筹、社区摸排、档案馆协办”三级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壁垒，优化服务流程，构建高效便民的服务体系。档案机构可借鉴做法，逐步推动档案服务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朝着更高质量、更丰富的内涵发展。

6 结语

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构建，是回应特殊群体需求、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档案事业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型的关键抓手。当前体系建设虽面临政策碎片化、设施技术适配不足、服务与人员能力滞后等挑战，但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体系构建，既是保障老年人与残障群体档案利用权益的民生要求，也是提升档案服务包容性、助力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未来需以健全专项政策法规为根基，以设施技术精准改造为支撑，以服务内容优化与人员能力提升为保障，三者协同发力，推动档案服务适老化与无障碍体系成熟完善，让特殊群体切实享受到便捷、有尊严的档案服务，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2026-02-28)[2026-05-07].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 [2] 为了“春天的事业”更温暖——全国政协“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EB/OL].(2024-09-14)[2026-05-07].<http://www.cppcc.gov.cn/zxww/2024/09/14/ARTI1726281329513432.shtml>.
- [3]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EB/OL].(2022-02-22)[2026-05-24].<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259/content.html>.
- [4] 田野, 白文琳等. 智慧养老背景下老年服务档案资源的整合与知识本体构建研究 [J]. 北京档案, 2015(8):40-42.
- [5] 周铁梅, 雷家焯. 数智时代档案信息服务适老化建设现状与优化演进 [J]. 办公自动化, 2024(21):22-24.
- [6] 罗宝勇, 陈昱其等. 社交媒体视域下档案公共服务的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 [J]. 山西档案, 2020(4):84-90.
- [7] Gilardi R. The archival setting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 legal analysis [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93(4):704-713.
- [8] Jeremy C V. Disability provision and policy in local government archives: the contemporary picture in Wales [J]. Archives and Records, 2018(2):188-210.
- [9] 陈德权, 杜天翔. 数字适老化的实践逻辑、概念阐释与实现路径 [J]. 电子政务, 2022(12):101-110.
- [10] 王阳, 孙计领, 陈功. 无障碍的概念和相关问题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23(4):138-149+74.
- [11] 康丽, 曾红艳. 无障碍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1:38-39.
- [12] 胡万钟. 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谈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0(6):25-29.
- [13] 邵培仁. 信息公平论: 追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8(2):25-29.
- [14] 随州市档案馆: 服务有爱 办事无碍 [EB/OL].(2024-10-21)[2026-05-26].<https://www.hbda.gov.cn/info/5961>.
- [15] 中国人大网. 残疾人权利公约 [EB/OL].(2008-12-24)[2026-06-01].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cwh/1103/2008-12/24/content_1866844.htm.
- [16] 北京市朝阳区档案局. 聆听档案声音 共话时代潮声——北京市朝阳区开展“请听档案说”2025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EB/OL].(2025-06-24)[2025-09-17].<http://www.chinaarchives.cn/mobile/category/detail/id/45665.html>.
- [17] 李劼. 档案馆助力老旧小区“开转封”创新机制赋能城市更新 [EB/OL].(2025-06-24)[2026-06-03].<http://www.chinaarchives.cn/home/category/detail/id/45675.html>.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EB/OL].(2020-06-20)[2026-07-24].<https://www.saac.gov.cn/daj/falv/202006/79ca4f151fde470c996bec0d50601505.shtml>.
- [19]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EB/OL].(2018-06-20)[2026-06-04].<https://www.saac.gov.cn/daj/hybz/201806/15e2ea963d7740d792472714614980aa.shtml>.
- [20] 天津蓟州打造档案服务进社区特色品牌 [EB/OL].(2025-07-30)[2026-06-04].<https://www.saac.gov.cn/daj/c100167/202507/3712b9c494884a9eab43e26f114295f4.shtml>.
- [21] 李洁. 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档案服务研究 [D]. 武汉: 武汉大学, 2021:14-15.
- [22]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 APP 用户操作手册 [EB/OL].(2025-07-04)[2026-06-04].<https://www.saac.gov.cn/daj/qgdacxlyfwptapp/202507/39bf6e8d8c734e2782b115b5276f07e2.shtml>.
- [23] 苏州档案信息网 [EB/OL]. [2026-07-26].<http://www.daj.suzhou.gov.cn/>.
- [24] 肖文建, 王广宇, 彭宁波. 和谐社会构建中档案馆关注弱势群体研究——基于信息能力与信息需求的思考 [J]. 档案学研究, 2009(1):21-24.
- [25] 刘洪, 叶婧文. 特殊群体及其所需档案信息服务研究 [J]. 云南档案, 2015(12):54-56.
- [26] 韩振英. 基于信息公平的档案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 [J]. 档案学研究, 2009(4):24-27.
- [27] 徐拥军, 王兴广. 治理视域下档案服务外包安全监管研究 [J]. 档案学研究, 2022(4):116-122.

- [28] 以微空间提质增效为抓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厂甸 11 号院适老化改造项目 [J]. 城乡建设, 2024(1):30-32.
- [29] 以“有爱”创“无碍”，“时光珍藏 助残于行”文化助残主题活动在市档案馆举行 [EB/OL]. (2023-12-22)[2026-07-04]. <https://www.shjgdj.gov.cn/node15/detail/1703556789479.html>.
-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EB/OL]. (2020-12-24)[2026-07-04].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26/content_5573472.htm.
- [31] 李姗姗. 档案部门加强信息弱势群体服务的对策探析 [J]. 档案与建设, 2016(1):31-34.
- [32] 文化助残用心用情 让爱无“碍”携手同行——市档案馆助残活动纪实 [EB/OL]. (2024-12-05)[2026-07-27]. https://www.shda.gov.cn/daxw/zxsd/202509/t20250919_69041.html.
- [33] 张琪敏, 李姗姗. 基于数字鸿沟理论的档案信息弱势群体服务探析 [J]. 档案, 2016(10):9-12.
- [34] 栖霞区档案馆联动基层助力特殊群体惠民帮扶 [EB/OL]. (2026-05-25)[2026-07-27]. https://www.njqxq.gov.cn/qxzx/gzdt/202605/t20260525_5845209.html.

Problems and Pat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e-friendly and Accessible Archival Service System

FAN Xiaohui, NIE Yunxi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Abstract: Archival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ublic services, are a crucial means to safeguard the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pecial groups such as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and to achieve equalization of archival public services. Currently, China has entered a deeply aging society, and the scale of the disabled population is also relatively large. The demand for archival services from special group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e-friendly and barrier-free archival service system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which restrict the convenient access of special groups to archival resources. By elaborating 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ing-friendly and barrier-free archival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policy, facilities and technology, and service personnel. It proposes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construction path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speci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promoting precise matching of facilities and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content and personnel capabilities.

Keywords: Archival services; Age-friendly; Barrier-free; System construction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 困境审视与策略选择

库丛燕 崔怡梦
某档案馆

【摘要】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既为红色档案资源从沉寂的历史记录向生动的教育素材转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也使其传统开发利用模式面临挑战。文章以数智时代为研究背景，在厘清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时代价值基础上，深入审视其面临的资源整合碎片化、开发路径同质化、技术应用浅表化、复合型人才匮乏化及协同机制松散化五重现实困境，进而从数智整合、数智叙事、数智强能、数智育才、数智治理五个维度提出系统性的策略选择，以期为推动红色档案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数智时代；红色档案；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作者简介】库丛燕，助理馆员，邮箱：15010810720@163.com，研究方向为红色档案、档案开发利用；崔怡梦，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红色档案资源建设、档案知识服务。

1 引言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深刻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2026年6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加快推进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确立为主攻方向，围绕七大主要任务展开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了“人工智能+档案”行动计划的实施要求，为档案事业迈向数智化发展新阶段擘画了行动蓝图^[2]。红色档案作为红色资源的构成主体，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历程的原始记录与生动缩影，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数智技术的催化下正迎来全面释放的新契机。然而，如何借助数智手段有效破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深层障碍，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探索价值与现实回应意义的重要命题。

2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根基

2.1 存史资政：以数智手段激活历史镜鉴功能

红色档案资源真实记载着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的奋斗轨迹，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经验弥足珍贵的知识库。与纸质档案时代主要依靠人工查阅不同，知识图谱、语义分析和大语言模型等数智技术，可以将散落在不同馆藏机构、不同载体中的红色档案进行智能关联和集中汇聚，使原本零散的历史记录整合为系统化的知识网络。这种从信息孤岛到知识网络的转变，不仅有助于公众形成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整体认知，在集体记忆中筑牢精神认同的根基，还能够让历史经验转化为可推演、可比照的决策镜鉴。通过将不同时期的政策逻辑、应对策略与实践效果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关联分析，提炼出跨越时空的规律性认识，为当下治国理政提供宝贵的经验参照，真正实现存史与资政的深度贯通。

2.2 铸魂育人：以数智载体丰富价值教育形态

红色档案具有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独特

优势,其铸魂育人的作用机理可从三个递进层面^[3]来理解:第一,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为价值教育奠定了可靠的事实基础,使信念的树立建立在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之上;第二,档案蕴含的情感力量与道德感召能够穿越时空、引发共鸣,推动价值认同从外在灌输转向内在自觉;第三,档案所呈现的丰富历史情境,为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提供了具体参考。在数智时代,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静态的档案文本可以转化为沉浸式的教育场景,使学习者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知红色历史的精神力量,从而有效提升价值教育的覆盖广度与内化深度。

2.3 文化传承:以数智网络拓展红色基因传播边界

红色档案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根脉所在。在传统工作模式下,红色档案主要保存在实体库房中,传播方式也相对单一,其文化影响力往往只限于特定地区和少数受众。数智时代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与智能推荐算法的应用,为红色档案的文化传播铺就了覆盖面更广、受众更精准的新路径。通过数字化采集、云端存储和精准推送,沉睡在馆库中的红色档案得以突破时空限制,以短视频、互动体验、数字展览等多种形式传递给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广大受众,推动红色文化实现由专业圈层走向社会大众、由地域性传播迈向全国性覆盖的转变。

3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困境

3.1 档案资源碎片化掣肘协同合力

数智技术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高质量、大规模、可计算的数据基础。然而,当前红色档案资源管理较为分散。纵向上,中央、省、市、县四级档案馆之间缺少顺畅的数据流通渠道;横向上,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党史研究室、高校等不同机构在资料收录范围、分类方式、编目标准、元数据规范等方面各有差异,很难实现跨机构、跨区域的统一检索和整合利用。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该区域红色档案资源虽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框架也为资源整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面临领导力缺位、制度设计不完善、协同过程疲软等现实困难^[4]。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得大量红色档案资源难以汇聚成可供深度分析与计算的数据资源体系,数智技术应有的潜力也因此无法充分释放。

3.2 开发路径趋同导致传播难以破圈

在数智时代,算法的推荐让信息传播高度个性

化,不同的人看到不同内容已成常态,但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思路和讲述方式还未跟上这种变化。在内容载体上,依然以传统的书籍编撰、线下展览为主,缺少与新媒体生态有效对接的数字产品。以专题展览为例,从策划到落地往往耗时数月,展期一过便撤展入库,能够持续触达受众的窗口极为有限。虽然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已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红色档案资源在这些平台上的存在感并不强,即便有所尝试,也多半是纸质内容的翻拍。在叙事方式上,同样没有摆脱传统惯性,大多偏向宏大历史叙事,停留在套路化、程式化的表达层面,较少从个体命运、日常细节、情感故事等微观视角切入。产品形态单一、叙事风格趋同,使红色文化的输出很难真正契合不同受众的口味和接受习惯,传播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3.3 技术应用浅表化阻碍智能化落地

近年来,各级档案部门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明显加大,馆藏档案的扫描、OCR文字识别和基础数据库建设都取得了不小进展。但总体来看,技术应用的建设投入与使用效果之间还存在明显落差。在数据资源层面,多数单位的数字化工作止步于扫描和简单标引,尚未引入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标注与知识抽取,数据治理标准和质量控制机制也还不够完善;在技术工具层面,除少数先行探索的单位外,大部分档案馆还未将知识图谱、大语言模型、计算机视觉等智能技术系统地应用于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层挖掘中;在应用服务层面,现有的数字平台普遍存在用户界面不够友好、检索效率不高、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等功能缺失的问题。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跨越,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3.4 复合型人才匮乏制约数智化转型

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迫切需要一批既熟悉档案业务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此类人才的供给明显不足。从档案业务来看,基层编研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兼职人员缺乏系统的档案学训练,对红色档案资源的历史脉络、价值判断和编研规范理解不够深入。从技术能力来看,熟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对档案业务的系统了解,档案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传播学之间也尚未建立起稳定的跨学科合作机制。这种业务与技术相互脱节的状况,已成为制约数智化转型从规划走向落地的关键人才瓶颈。

3.5 协同机制松散削弱数智化整体效能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牵涉面广、环节众多,单靠一家机构难以独立完成。档案馆、

博物馆、党史研究机构负责内容生产,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知识创新,科技企业和社会团体提供技术服务,媒体平台则担负传播扩散功能。这些主体各有所长,却缺少一个有效的协同机制将它们拧成一股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尚未真正建立起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网络。由于统筹主体长期缺位,各方力量难以形成合力,制度设计不够细化,参与单位该做什么、怎么配合,边界和规则都不清晰,加之利益难以协调、激励方向不一,合作往往浮于表面,流于应付。这些堵点不打通,碎片化开发的格局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数智化本应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也无法落到实处。

4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选择

4.1 数智整合:构建全域贯通的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底座

为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局面,需先夯实数据底座,让各馆、各机构的红色档案资源数据能够在共通的平台顺畅对接和关联调用。《规划》将“持续提高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列为重点任务,数智整合正是推动这一目标落地的重要路径。在基础设施层面,应充分利用云平台的存储和计算能力,建设全国性的红色档案数字资源中心,实现各类数字档案的统一归集。在标准规范层面,应加快制定统一的红色档案资源元数据标准、分类编码体系 and 数据互操作规范,打通跨库跨域检索的技术堵点。在数据治理层面,应建立贯穿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存储、共享全流程的质量管控机制,确保数据底座可靠、完整与安全。在智能化层面,可以借助知识图谱技术,把分散在各处的文献、人物、事件、地点等信息串联起来,形成能够支持计算与分析的红色档案资源知识网络。唯有如此,红色档案资源才能从单纯查阅走向深度计算,数智化深度开发才能有扎实的数据根基。

4.2 数智叙事:打造个性化与沉浸式融合的叙事新范式

为走出叙事同质化的困局,其核心在于不再单向输出,而是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可以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内容生成能力和智能推荐算法,针对不同受众的年龄、知识背景和兴趣偏好,灵活提供差异化的叙事内容与呈现风格。比如面向青少年以角色扮演的互动叙事为主,面向研究者以时空关联的知识图谱叙事为主,面向国际受众以多语种跨文化叙事为主,做到因人施策、按需供给。另一方面,应充分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打破时空界限^[5],对关键历史场景和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进行数字化还原与沉浸式再现,让受众能够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实现历史认知与情感共鸣的深度交融。由此,红色档案资源的叙事才能真正贴近不同受众的需求,在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的合力中焕发新的传播活力。

4.3 数智强能:推动“人工智能+档案”的深度应用落地

“人工智能+档案”的核心不在于技术叠加,而在于让机器真正具备理解和处理档案内容的能力。当前多数档案馆的数字化进程仍停留在扫描与建库层面,距离智能化的深度应用尚有明显差距。实现这一跨越,首要任务是知识挖掘环节的突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对海量红色档案文本进行自动标引、命名实体识别、事件抽取和摘要生成,将人工编研中最为耗时的基础工作交由算法完成;计算机视觉技术则可对历史照片、手稿和实物档案进行智能识别与内容描述。在此基础上,知识图谱能够将文献、人物、事件、地点等分散实体串联为语义关联网络,清晰地呈现历史演进的脉络与逻辑。知识挖掘能力提升之后,知识服务也应同步升级。有条件的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平台可集成大语言模型,开发智能问答、知识检索和个性化推荐功能,推动档案服务从被动等待查阅转向主动匹配需求。然而技术赋能的前提始终是守住内容底线,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须经过严格的人工审核与偏差纠正,确保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和价值导向的正确性,避免因算法偏差造成史实误读。

4.4 数智育才:培养兼具档案素养与数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决定数智化转型真正落地的关键条件。当前,制约红色档案深度开发的一个突出瓶颈在于,既熟悉档案业务又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相当短缺。为弥补这一缺口,需要从人才供给和在职培训两端共同着力。在高校培养层面,档案学专业应增设数字人文或档案信息化方向,在课程中系统融入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导论等内容,并通过与信息技术类学院合作,开设交叉学科选修课程,在培养环节改善毕业生的能力结构。在岗位实践层面,应面向在职档案人员开展常态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通过专题研修、在线课程和项目实训等多种形式,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数据处理工具与数据分析思维。同时,要推动档案馆与科技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和项目协作,引入外部技术力量参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既能在短期内缓解人手不足的压力,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带动内部人员的

技能成长,为数智化转型提供更可靠的人力保障。

4.5 数智治理:建构多元协同的平台化治理生态造成协同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各单位之间缺乏统一的技术平台和协作规则,使得合作长期停留在点对点沟通、一事一议的层面,难以形成合力。为改变这种局面,可吸纳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有益做法,搭建开放共享的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云平台,将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协同编研和效果追踪等功能集成于一体,切实降低跨组织协作的沟通成本。依托这一平台,档案馆、高校、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

等相关机构得以汇聚在一起,围绕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采集、知识图谱构建和智能展陈等核心任务,各自发挥优势、共享资源与成果。平台不只是技术工具,更是治理载体,通过内嵌的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和利益分配规则,让合作变得透明、可预期,降低反复协调的成本。在具体项目推进中,各方从被动配合转为主动参与,逐步形成共建共享、协同联动的协作格局,为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长效支撑。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4-9.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EB/OL].(2026-06-11)[2026-07-12].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6/c75591cb82564d669635c859041512cf.shtml>.
- [3] 戈化聪,姬海玥.红色档案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山西档案,2026(5):63-65.
- [4] 刘露.长三角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的实践检视及其治理进路[J].档案学研究,2025(5):91-99.
- [5] 魏巍.红色档案资源育人价值的多维阐释与实现路径[J].山西档案,2026(5):66-69.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Archive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Dilemmas and Strategic Choices

KU Congyan, CUI Yimeng

Abstract: The rapid iter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created unprecedente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d archives from silent historical records into vivid educational materials, but also posed systematic challenges to their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mode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his paper,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epochal value of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red archive resources, conduc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fiv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fragmented resource integration, homogenized development paths, superficial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loos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It further proposes systematic strategic options from five dimensions: digital-intelligent integration, digital-intelligent narrative,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digital-intelligen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igital-intelligent governanc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archive resources.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Red archives; Red archiv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路径分析

董思思

(海口经济学院, 海口 571132)

【摘要】文章运用案例分析法,阐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多元价值。通过对三所代表性高等院校的应用实践剖析,提炼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校史编研工作中应用的具体路径,包括:构建校史特色数据库和知识图谱、打造人机协同校史编研体系、培育校史编研人员数字化能力、健全校史编纂质控评估体系四大维度。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校史编研;档案数字资源;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董思思,海口经济学院档案馆,助理馆员,邮箱:21031329@qq.com,研究方向为高校档案管理。

1 引言

2026年4月,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在档案行业应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档案工作全流程各环节,优先推进档案编研等典型应用场景建设^[1]。同年6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增强档案开发利用实效等要求^[2]。这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人工智能+档案”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高效整合文本和图像数据,实现智能分类、关联与研究,从而生成创新型编研成果,为档案编研模式革新提供新动能。现有研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档案编研工作的机遇、风险与实现路径等方面^[3-4]。然而,当前该技术在高校校史编研领域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亟待明确的问题。因此,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路径展开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多元优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从资料智能处理、内容深度

挖掘、成果多元传播三个维度赋能高校校史编研,有效破解传统人工编研效率低下、深度不足、传播单一等痛点,助力高校构建高效、多元、智能的新型校史编研体系。

2.1 资料归集:智能检索与结构化整合

在校史资料归集与梳理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智能检索、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打破人工检索在时间、空间与来源上的限制,快速抓取互联网与档案数字资源中的校史相关内容,自动完成海量资料的筛选、分类和结构化组织。该过程显著减少了人工操作的工作量,有效提升了校史资料处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2.2 内容挖掘:深度解析与知识关联

在校史内容深度挖掘与研究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依靠命名实体识别、知识图谱等技术,对校史文本、档案内容进行深度解析与结构化处理。具体而言,这些技术可精准抽取人物、事件、时间、成果等关键信息,协助编研团队系统梳理学校发展的整体脉络,挖掘零散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理清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的逻辑关系,为编研团队深入开展校史研究、挖掘校史文化价值提供有力支撑。

2.3 成果呈现：多元形态与沉浸式传播

在校史成果呈现与传播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以静态图文为主的呈现方式，依托可视化制图、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技术，实现沉浸式场景还原，打造动态校史时间轴、虚拟校史馆等多种成果形态。同时，该技术还能适配新媒体平台，快速生成短视频、图文推文等多样化传播内容，实现校史文化多渠道、广覆盖的传播目标，增强校史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实践案例研究

校史编研兼具学术研究与文化建构的双重属性，其数智化转型既依赖技术工具的适配，更受制于院校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发展语境。本文选取综合类、师范类与理工类各一所代表性高校作为分析对象。三校在馆藏规模、编研传统与信息化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均已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校史整理、编撰或展示的先行探索，积累了可供观察与比较的一手实践素材。本文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旨在呈现不同院校情境下技术嵌入的路径选择与成效，为后续路径建构提供依据。

3.1 案例分析

3.1.1 综合性大学 A：搭建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校史档案数字化平台

综合性大学 A 办学历史悠久，馆藏校史资料数量多、覆盖范围广，既包含多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也涉及重大科研成果产出、跨校学术合作项目以及知名校友的成长经历。该校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主要目标是利用智能化处理能力完成校史资源的系统性整理，挖掘资料中隐藏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创新校史传播形式，进一步扩大校史内容的覆盖范围、提高传播效果，让校史更充分地融入学校教学实践、科研创新以及校园文化建设。

该校搭建的校史档案数字化平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引擎，集成多元智能技术，形成了覆盖资料转录、内容理解与智能检索的全链条功能体系。首先，平台通过图像识别与文字识别技术，对影像资料和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转录。针对存量历史照片，平台能自动识别画面中的人物身份、拍摄地点以及关联事件，同时生成对应的标签和内容注解，为后续检索操作提供数据支持。其次，检索功能方面，平台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智能化信息调取。用户以日常语言输入查询需求，如“查找 2020 年至 2024 年间学校获得的国家级科研奖项”，平台经语义解析后，可从体量庞大的校史档

案库中快速精准找到匹配内容，并用条理清晰的列表形式展示结果。最后，平台还支持多维度检索，用户可结合时间、人物、主题等不同维度设置复合检索条件，进一步提高信息匹配的精准度。

3.1.2 师范类大学 B：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校史编纂与创作

师范类大学 B 一直将教育理念的代际传承和办学成果的系统整理，作为校史工作的核心方向。其校史档案保留了大量优秀教师的教学实践总结、教育改革的探索过程以及师范人才培养的标志性成果。该校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主要依托该技术出色的交互性和内容创新能力，搭建更具感染力、更能促进参与的校史教育素材库，以此调动师生主动了解校史的积极性，加深他们对学校核心理念的价值认同，同时为师范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元的一手资料支持。

该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人机协同的校史写作新模式，其应用贯穿校史编纂的全流程。在框架建构阶段，校史主题确定后，编研人员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海量校史资料进行快速整合与知识图谱关联分析，自动生成包含核心表述要点、事件时间编排逻辑以及需要重点呈现内容的大纲框架。在文本生成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自然语言生成相关技术，围绕编研人员提供的主题限定和核心关键词，生成初始文本内容。编研人员可将这份初始文本作为调整基底，加入专业积累和对校史脉络的深层认知，对内容进行深度加工，提高表述的精准度和生动性。在内容打磨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语法校验、语义解析等技术模块，助力编研人员找出文本中存在的疏漏和需要完善的细节，并提供针对性的优化参考方向。

3.1.3 理工类院校 C：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沉浸式校史体验空间

理工类院校 C 以技术创新突破、产学研协同发展作为办学方向，其校史资源大多集中在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路径以及典型科创人物事迹等方面，而传统的校史整理和研究模式难以高效梳理分散的科研类零散史料。该院校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多渠道输出、虚拟场景具象化呈现方面的技术优势，以智能化校史数据资源库作为基础支撑，搭建校史内容智能分析与可视化展示平台，深度整合并提炼科研类校史资源的内在价值。同时结合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校史体验空间，探索全新的校史内容表达形式，从多个维度展现学校科创导向的办学积累，可为其他理工类院校提供实践借鉴。

该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内容生产与交互内核,融合VR、AR技术,搭建沉浸式校史体验场景,为校史文化的活态呈现开辟了新路径。该校依托大语言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技术,基于校史文献、口述史料及影像档案等基础数据,生成三维虚拟场景、历史人物形象及配套语音讲解内容。例如,参观者在校园特定区域(如图书馆门口)通过手机端AR应用扫描二维码后,系统可调出该校知名学者在此处讲学的虚拟影像,并同步播放语音讲解,介绍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学校发展的历史贡献。该方式充分发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成果呈现与智能交互方面的优势,弥补了理工类院校校史传播感染力不足的短板,也为后续构建多元传播路径、完善成果评估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撑^[5]。

3.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效果

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入,显著提高了三所高校的校史编研工作效率与成果质量。综合性大学A搭建了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校史档案数字化管理平台后,单份资料的检索时间从原来的平均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信息整理效率提高了数倍。校史资源经过深度挖掘和系统整理,内容覆盖范围和准确度提升,依靠知识图谱搭建的校史逻辑框架更具条理。师范类大学B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完成校史文稿撰写工作,初稿生成速度显著提升,整体编修时间比传统方式缩短了近1/3。校史文稿文字表达更通顺准确,内容展现更丰富生动,整体可读性增强。理工类院校C搭建沉浸式校史展示空间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虚拟场景和展示素材,显著降低了人力投入和时间成本。其打造的沉浸式校史体验空间,凭借新颖的呈现形式和充足的内容储备,为校史传播拓展了新方向,增强了校史的感染力和对受众的吸引力。

4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具体路径

4.1 构建校史特色数据库和知识图谱

4.1.1 建设校史特色数据库

校史特色数据库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校史编研的数据底座。建设之初,高校需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采集,主要渠道包括校内档案馆(室)、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正式文献。同时也应纳入互联网资源,如学校官方新闻、校友社群回忆及社交媒体公开讨论等。后者尤能补充带有鲜活叙事特点、体现公众视角的校史细节。

需要注意的是,原始数据往往存在格式不一、信息缺失等问题,须经标准化清洗和语义标注以保

障数据质量。数据清洗环节旨在去除冗余内容、统一表述规范,对图像、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料还需优化画质音质、修复受损位置、统一存储格式,确保各类史料完整可用。数据标注环节基于人物身份、履职贡献、时间范围、参与主体及历史影响等维度,为数据赋予高精度语义标签,为后续知识图谱构建与智能检索提供数据支撑^[6]。

4.1.2 构建校史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在校史编研中具有多重应用价值。编研人员既可借助可视化图谱快速理清校史整体脉络与关键节点,又可快速定位特定人物或事件的相关资料,为深入研究提供高效支持。

校史知识图谱的搭建以校史数据库为基础支撑,通过实体识别技术从校史资料中提取人物、组织机构、事件、成果等核心实体,并利用关系抽取技术明确实体间的内在联系,如人物和特定事件的参与关联、机构和成果的归属关系等。以校史资料归集梳理环节为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类馆藏资料进行归类、信息标记与主旨提炼,同时对图片、音视频等非文本资料展开格式转换与关键特征抓取,使多元异构资料形成可检索的结构化体系。编研人员需对机器输出成果进行核验,修正归类有误的资料,补充修正标记项,确保归集梳理的精准度与完整性。

4.2 打造人机协同的校史编研体系

内容撰写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按照编研人员设定的主题与规范,输出行文逻辑架构与初始文本,大幅压缩基础性写作耗时。编研人员在此基础上融入专业研究视角与个人见解,让校史文本兼具学术深度与叙事感染力。

内容核验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语义识别、逻辑一致性校验等技术,自动检测语法错误、逻辑漏洞与事实表述偏差,输出初步核验意见。编研人员则从历史研究专业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全方位审核,既保证内容符合客观史实与公允立场,也逐一修正生成式人工智能未能识别的问题,最终筑牢校史文本的质量防线。这种机器和人力深度配合的校史编纂研究路径,充分发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处理信息的优势与编研人员的专业研判能力,实现了二者的效能互补,切实提高校史编纂研究的质量和效率^[7],最终打造以人为主体、AI辅助为核心的编研体系^[8]。

4.3 培育校史编研人员数字化能力

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是提升编研人员数字素养的关键抓手。培训内容应帮助编研人员理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技术特点和适用

场景,熟练掌握主流智能工具的操作流程,使其能够依托相关工具完成校史档案的归集、梳理与分析研判。培训形式应多元互补。线上课程可设置视频授课、案例解析与在线能力测评等模块,便于编研人员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及时巩固知识;线下环节可邀请领域专家开展专题授课与实操指导,组织模拟项目演练,针对理论认知与实践操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现场答疑。

此外,为持续激发参训动力、推动能力稳步提升,高校还应配套建立激励保障机制。在绩效考核方面,可将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纳入评价体系,对培训表现突出且在日常工作中灵活运用技术工具提高校史编研效率与质量的人员,给予更高绩效评级和对应奖励。

4.4 健全校史编纂质控评估体系

构建校史研究成果的评估指标框架,需兼顾内容质量、形式创新与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在内容维度方面,质量评价可聚焦以下标准:其一,内容完备性,即是否覆盖学校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核心领域;其二,史实精准性,即成果能否客观、严谨地还原历史面貌,避免事实偏差与表述错误;其三,研究深度与广度,即是否对校史中的关键事件和代表性人物进行深层分析。在形式创新方面,应

关注校史成果的呈现方式是否实现创新,如数据可视化展示、沉浸式交互体验等。在社会影响方面,主要关注成果的传播触达效果,可参考官方校史平台的访问人次、用户停留时长等指标。建立科学完善的校史编研质量管控与评估体系,能够切实筑牢校史研究的成果质量防线,提高校史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力^[9]。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高校校史编研工作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此领域的应用价值较高。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搜索和分析能力,不仅能够解决人工处理效率低、质量参差的问题,还可借助校史知识图谱的构建优化校史呈现方式。未来,高校需结合自身办学特点打造适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路径,完善人机协作流程和内容质控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内容同质化、史实谬误等潜在问题。此外,高校还可加强与技术服务商的协作配合,不断推进模式创新和应用更新,持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校史编研领域的适配方法,进而充分发挥校史文化在文化传承浸润、育人赋能方面的作用,为高等院校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在档案行业应用的意见》的通知 [EB/OL].(2026-04-10)[2026-07-11].<https://www.saac.gov.cn/daj/tzgg/202604/12aa9fab60c4dbeab5444f03e78bdb9.shtml>.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EB/OL].(2026-06-11)[2026-07-11].<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606/c75591cb82564d669635c859041512cf.shtml>.
- [3] 李曼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档案编研中的机遇与风险管控[J].山西档案,2026(6):133-135.
- [4] 周海.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档案编研工作的实现路径构建[J].北京档案,2024(6):45-48.
- [5] 黄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编研的路径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6,22(8):32-35.
- [6] 王琪.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校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探析[J].黑龙江档案,2026(1):53-55.
- [7] 任博.数字赋能与情境育人:高校红色校史资源活态传承的创新探索[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4):64-70.
- [8] 王利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档案编研中的应用研究[J].山西档案,2026(2):130-132.
- [9] 程媛,王艺洁.面向“大思政”育人的高校校史档案叙事开发研究——以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史为例[J].北京档案,2025(1):47-50.

Path analysis of empowering university history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wit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NG Sisi

(Haikou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aikou 571132)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ase analysis to illustrate the diverse valu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mpowering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university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pecific path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university history have been extracted, including four dimensions: building a large database and knowledge graph of university history, creating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system for university history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ultivating the digital ability of university history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personnel,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control evaluation system for university history compil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school history; Archive digital resources; knowledge graph

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育人的 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朱荀 王宇奇 高思涵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馆, 北京 102206)

【摘要】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承载着学校与首都工业建设同频共振的历史记忆,具有筑牢精神根基、传承工科精神、塑造校本文化的重要育人价值。文章以集体记忆、档案记忆观与档案叙事为理论支撑,构建“价值维度—转化机制—实现策略”分析框架,阐释校史档案在首都使命、工程文化、校本精神层面的内在价值,提出资源化、叙事化、场域化、评价化四大转化机制,并从资源挖掘、叙事创新、数字赋能、课程嵌入、协同联动五方面提出实践路径,为同类高校提供参考。

【关键词】工科院校;校史档案;档案育人

【作者简介】朱荀(通信作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馆,副馆长,邮箱:55346049@qq.com,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档案文化育人;王宇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档案资源开发、档案信息化;高思涵,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档案文化育人。

1 引言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化了校训校歌校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1]。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提出“建设一批文化传承基地。发挥校园建筑景观、文物和校史校训校歌的文化价值”^[2]。北京市属工科院校的校史档案承载着学校的历史记忆、价值理念与育人使命,是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与科研人员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历史沉淀,既记录着学校与国家工业建设、首都发展同频共振的奋斗历程,也蕴藏着工科教育独有的精神基因与育人密码。将这些静态的档案资源转化为动态的育人力量,实现从历史叙事到育人实践的深度跨越,既是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属工科院校彰显办学特色、培育新时代工科人才的核心路径。

2 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校史档案育人展开了多维度研究。理论建构方面,研究者从文化育人^[3]、校史档案教育力机制^[4]等视角阐释了校史档案的育人功能;路径方法方面,研究者从课程思政^[5]、德育功能^[6]、资源开发^[7]、数字环境下叙事转向等角度探讨了校史档案育人的实现路径^[8];实践探索方面,部分高校结合办学特色,构建了系统开发模型^[9]或地域性育人路径^[10]。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综合性高校或具有典型历史事件的高校,且多停留于史实梳理层面,对育人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更未给予工科院校尤其是北京市属工科院校足够的关注。

工科院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与应用导向,其校史档案如何在历史叙事与育人实践之间实现有效转化尚需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明确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北京市属工科院校

校史档案蕴含怎样的独特育人价值？校史档案如何实现从静态历史叙事到动态育人实践的转化？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以保障育人实效？

3 分析框架：价值维度—转化机制—实现策略的联动模型

校史档案作为学校记忆的物化形态，具有真实性、丰富性与教育性特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可信度^[11]。其育人价值的实现，需依托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理论的社会建构逻辑，推动学生从知晓到认同再到践行的深度转化。同时，需借助档案记忆观^[12]与档案叙事理论^[13]，将档案从证据转化为承载记忆、塑造认同的媒介。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价值维度—转化机制—实现策略”三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以系统阐释校史档案育人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的完整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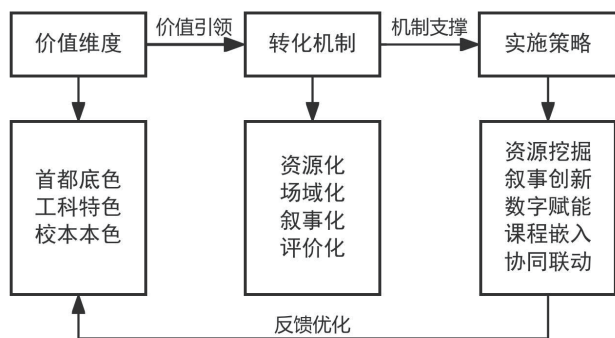


图1 “价值维度—转化机制—实现策略”三维分析框架

在价值维度层面，校史档案的育人价值源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基因，既包括“科技报国”的工科精神内核，也涵盖“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特质，这些价值要素通过校史档案特征得以具象化呈现。在转化机制层面，档案记忆观与叙事理论构成了校史档案育人的核心动力，对校史档案中的精神密码进行深度挖掘，运用一定的叙事策略将静态校史档案转化为动态育人资源，形成资源化、叙事化、场域化、评价化四个转化过程。在实现策略层面，从资源挖掘、叙事创新、数字赋能、课程嵌入、协同联动五个方面构建育人实现路径。即以校史资源库建设夯实育人基础，通过叙事创新激活档案生命力，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增强校史档案叙事吸引力，依托课程思政深化育人价值渗透，最终通过校内外协同形成育人合力。这一分析框架实现了从价值认知到实践转化的闭环，为市属工科院院校史档案育人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设计。

4 北京市属工科院院校史档案育人的内在价值

校史档案作为“记忆的物化形态”，育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对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基因进行系统性挖掘与阐释。基于理论逻辑，本文从“首都底色”“工科特色”“校本本色”三个维度，揭示北京市属工科院院校史档案区别于综合性院校校史档案的独特育人价值。

4.1 首都底色：在城市使命叙事中强化价值引领

北京市属工科院院校的形成与发展与首都工业化、城市建设和治理现代化进程紧密耦合，校史档案天然蕴含“服务首都、担当使命”的价值导向。校史档案中记载的学校创立背景（如为满足首都工业建设急需而建）、专业设置沿革（如围绕北京电子、机械、城市建设等产业需求）、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如参与亚运会、奥运会、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等），生动体现了北京市属工科院院校“呼应时代、扎根首都、服务产业”的办学特色。如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校史中记录着原北京机械学院师生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奔赴陕西汉中办学的历史。北京机械学院留守北京的部分办学力量后来发展为陕西机械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是较早开展研究生培养的市属高校之一，构成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办学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北京建筑大学的校史档案中，记录着学校参与人民大会堂、密云水库、天安门城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首都重大工程建设的内容。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将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息息相关时，便会将“服务首都”内化为价值认同，外化为自觉行动，树立“科技报国”的志向。

4.2 工科特色：以工程文化与科学精神涵养专业认同

相较于综合性高校，工科院院校史档案中更常见工程设计图纸、实验记录、设备实物、技术路线手稿、重大工程服务资料等“工程证据”。这些档案蕴含着工程伦理、质量意识与问题导向等工科文化，是学校特色发展的深层文化根基。首先，校史档案揭示了学科演进的过程。如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史档案，记录了学校从服务首都基础建设到聚焦现代“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历程，能够帮助学生清晰理解所在专业的发展脉络与社会需求，感知专业发展的时代生命力；又如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校史档案梳理了从专科教育到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转型脉络，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知识—行业应用—产业升级”的认知框架。其次，校史档案中还记载了体现科研创新精神的事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史记载：

20世纪80年代,张福学教授在乘火车途中观察烟雾升腾现象,由此创立“气体摆”理论。该创新事例可启迪工科学生的创新思维。最后,档案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工匠精神”元素,精密图纸、严谨的实验报告以及大国工匠的故事等,激励着学生树立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

4.3 校本本色:通过组织记忆建构“精神共同体”

校本精神是一所院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淀的核心精神标识,对于维系和凝聚师生价值认同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教育作用^[14]。市属工科院校校本精神呈现出典型的工科特色,其核心可以概括为务实、创新、攻坚、服务等。校史叙事通过具象化的呈现,让抽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历经“实业救国”“工业报国”“信息强国”三大发展阶段,始终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建设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北方工业大学坚守“工业报国、工业兴国、工业强国”的使命担当,立足北京、服务京津冀、面向全国,重点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着力培养兴工报国、精干实干的卓越工程师^[15]。

5 从历史叙事到育人实践:校史档案动态育人的转化机制

校史档案从静态档案转化为动态育人资源,需经历从证据到资源、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认同的转化。本文将从四个方面系统阐释这一过程。

5.1 资源化:从历史资料到育人资源的生产机制

资源化是校史档案育人的起点,其核心在于把分散的史料转化为可调用、可验证、可更新的育人资源。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资源化具体包括三项关键任务:第一,围绕育人目标进行价值导向的征集与鉴别,形成体现首都使命、工程文化与校本精神的特色校史资源集合。第二,实施精细化分类与科学编目,构建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分类体系并进行数据标注。第三,构建校史档案资源图谱,通过可视化技术展现校史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脉络。在此基础上,对校史档案中的育人元素进一步挖掘,形成主题明确、内容丰富的育人资源。这要求对校史档案进行深度解读与分析,提炼出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精神价值等育人要素,并结合时代背景与育人目标,设定具有针对性的育人主题。通过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方式,将零散的档案片段串联成有逻辑、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链,使静态资料转化为动态资源。

5.2 叙事化:从档案事实到价值意义的生成机制

叙事化是对档案事实进行情境化表达与价值化阐释,从而实现由“见证”向“意义”的转化。校史档案叙事若脱离背景信息,容易导致意义悬空,需要对其语境进行分析,考察档案文本在特定社会和文化框架下所处的位置^[16]。因此,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叙事化需遵循三条原则:一是遵循主题引领,围绕首都使命、工程报国、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等形成叙事主轴;二是从微观维度叙事,以人物、实验室、图纸、设备等为切入口,形成可触摸的故事单元;三是推动多元主体共创,数字环境下的叙事转向研究表明,校史档案工作者、师生、校友及社会力量等可围绕特定主题,开展跨部门合作,共同推动校史档案叙事的发展。

5.3 场域化:从文化展示到制度嵌入的实践机制

场域化强调育人从展陈空间扩展至教育教学、文化活动及日常管理之中,而认同的生成需要在深度的实践场域中完成转化。但这种场域并非自然形成,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的场域化需通过制度安排加以保障。在政策层面,将校史档案育人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其在“三全育人”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需与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办学目标相对接。在课程层面,推动“档案+专业”融入课程思政,将校史中的典型案例、人物故事等融入专业课程,引导工科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感知行业使命与家国情怀。在活动层面,形成常态化活动机制,通过校史讲解、主题活动等方式提升参与度,推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着力培养具有扎根首都、服务产业意识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5.4 评价化:从活动热度到育人成效的反馈机制

评价化旨在构建一套科学评价体系以衡量校史育人的实际成效,对转化过程形成闭环检验。缺少评价环节,校史育人容易停留在“看过了、感动了”的表层体验,难以确认学生的价值认同是否真正内化。针对工科生普遍务实的认知特点,北京市属工科院校应围绕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专业素养与人文精神建立评价目标,并进一步细化为校史精神认同、首都发展责任感等可观测指标。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问卷、访谈、观察记录、案例分析等方式,形成动态反馈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优化资源、调整策略、完善机制的重要依据。

6 实现路径：校史档案如何从历史叙事走向育人实践

基于上述转化机制，从资源挖掘、叙事创新、数字赋能、嵌入课程思政以及协同联动五个方面提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让校史档案转化为生动的育人场域。

6.1 以资源挖掘为基础，构建校史档案资源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17]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资源库不仅能够保存学校历史，还能为学校“立德树人”和“服务首都”储备战略文化资产。校史资源挖掘可从实物、文本、人物三个维度展开。整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挖掘精神内核、提炼典型人物事迹、编纂校史手册，并着重突出首都特色、工科底色与校本本色，重点体现“红色基因”“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科技报国”等精神，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创新意识，构建工科院校的“精神共同体”。

6.2 以叙事创新为核心，激活校史档案育人生命力

叙事转化机制是让校史档案活起来的关键，本质是从传统的侧重凭证价值转向凸显精神内核。校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叙事，重视个体经历、校园生活以及情感记忆^[18]。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叙事策略：一是叙事内容主题化，如将“校史中的科学家精神”作为主题汇集科研手稿，或将“学校与首都发展”作为主题聚焦重大工程；二是叙事主体多元化，改变档案机构作为唯一主体的模式，使叙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19]，同时引导学生打造“校史青年说”，鼓励校友参与口述史采集，引入社会力量合作策划专题报道，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多元共创”的转变；三是叙事视角微观化，跳出传统宏大叙事的框架，以具体的校史人物、工程实践细节、科研攻关片段为切入点，将抽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鲜活故事。

6.3 以数字赋能为引擎，增强校史档案育人吸引力

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校史档案叙事形式，打造学生可看、可听、可感、可互动的沉浸式场景；借助AR扫描使静态档案“活”起来；运用AI技术“复活”历史人物，打破时空限制，打造虚拟校史馆；通过多媒体技术，构建学校不同时期校址与校园风貌的数字互动沙盘，直观呈现学校与首都发展相伴而行的空间变迁轨迹。数字技术带来的沉浸感可极

大增强情感冲击力，使抽象价值变得可触可及，推动档案叙事向立体、交互、沉浸式体验转变。

6.4 以课程思政为抓手，深化校史档案育人价值渗透

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引导学生将爱国、爱首都、爱校相统一，将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发展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相统一，这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目标一致^[20]。在课程设计上，根据课程类型融入校史案例，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教学场景。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深化校史育人价值渗透。在课外实践上，依托校史馆这一核心阵地，通过主题展览、校史讲解大赛、文创大赛、校史AI活化展示、校史档案寻踪活动及社会实践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校史文化，引导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实现从校史挖掘到学校价值认同的升华。

6.5 以协同联动为保障，汇聚校史档案育人合力

校史档案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突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和资源边界，构建学校内部贯通与外部联通的协同联动网络，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育人合力。在内部，应建立校史档案部门、宣传部、学工部、团委、各学院及科研平台（如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校史资源深度融入学生教育管理、科研训练与工程实践全过程，使校史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与工程伦理内化为学生的专业价值取向，形成特色化的“大校史育人”格局。在外部，应积极与各级综合档案馆、科技类博物馆、产业研究所及校友企业合作，共建校史育人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口述史采集、校史主题工程实践等学习机会，推动校史叙事从校园走向产业现场，增强育人场景的真实性与社会性。

7. 结语

北京市属工科院校校史档案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进行从价值认知、机制构建到实践落地的全链条设计。本文提出的“价值维度—转化机制—实现策略”框架，旨在为同类高校提供可参考的操作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一是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下的校史档案叙事创新，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校史故事创作中的应用；二是校史档案育人效果的量化评估体系构建，突破当前以定

性描述为主的评价局限；三是跨校协同机制探索，推动北京市属高校校史档案资源共享与育人合力形成。校史档案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未来的塑造者。让档案从“故纸堆”走向“育人场”，是新时代档案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本文系 2025-2026 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教研究重点课题“高校校史红色基因的传承路径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2025-2026GJZD0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5 年党建重点课题“工科院校校史文化育人的价值意蕴与逻辑路径”（DJKTA2025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2019-11-12)[2026-07-2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56804.htm.
- [2]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EB/OL].(2020-04-22)[2026-07-2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5/content_5511831.htm.
- [3] 吕中元. 校史档案资源开发与文化育人融合探析[J]. 档案天地, 2026(1):32-35.
- [4] 谢梦. 校史档案育人的运行机理、现实范例与行动策略[J]. 办公室业务, 2025(14):115-117.
- [5] 朱彤, 雷丽媛. 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校史档案育人路径试析[J]. 北京教育(德育), 2022(3):57-60.
- [6] 张玲. 高校校史档案的德育功能及育人路径研究[J]. 四川档案, 2023(4):30-31.
- [7] 冯佳芪, 加小双, 吴佳佳. 叙事转向背景下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策略研究[J]. 山西档案, 2022(4):27-33.
- [8] 赵耿. 数字环境下校史档案的叙事转向研究[J]. 山西档案, 2025(4):144-146.
- [9] 程媛, 王艺洁. 面向“大思政”育人的高校校史档案叙事开发研究——以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史为例[J]. 北京档案, 2025(1):47-50.
- [10] 鲁昆洪. 以文化润疆为核心的高校红色校史档案育人路径探赜[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 27(1):91-99.
- [11] 沈洋, 赵小敏, 李娇娇, 等. 校史档案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实现路径探究[J]. 山西档案, 2024(5):66-70.
- [12] 徐拥军. 档案记忆观：21 世纪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J]. 山西档案, 2017(4):5-12.
- [13] 张芳霖, 曾思雯. 档案叙事的底层逻辑、要素层次和发展趋势[J]. 档案学研究, 2024(6):4-12.
- [14] 倪筱荣. “校本文化资源”概念辨析及其开发利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19):80-82.
- [15] 北方工业大学章程[EB/OL].(2022-12-15)[2026-07-23].
<https://www.ncut.edu.cn/xxjs1/xxzc.htm>.
- [16] 丁华东, 王文宣. 论档案记忆叙事的语境性与历史统一性[J]. 档案学通讯, 2025(4):4-11.
- [17]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EB/OL].(2022-04-26)[2026-07-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25/c_1128595417.htm.
- [18] 赵耿. 数字环境下校史档案的叙事转向研究[J]. 山西档案, 2025(4):144-146.
- [19] 冯佳芪, 加小双, 吴佳佳. 叙事转向背景下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策略研究[J]. 山西档案, 2022(4):27-33.
- [20] 邓文婷. 推动校史文化教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以云南大学为例[J]. 社会主义论坛, 2025(2):43-44.

The Educational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t Beiji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ZHU Xun, WANG Yuqi, GAO Sihan

(Archives Department of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Beijing's municip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carry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nstitutions' co-development with the capital's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hey hold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value in strengthening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heriting engineering ethos, and shaping institutional culture. Grounded i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memory, archival memory theory, and archival narra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value dimensions-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t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cross three levels: Beijing's mission, engineeri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spirit. Four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are proposed: resource-based, narrative-based, field-based, and evaluation-based approaches. Furthermore, five practical pathways are outlined: resource mining, narrative innov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words: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archives; Archival education

高校特色馆藏的档案文献遗产转化路径研究

——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为例

陈萱

(海南师范大学档案馆, 海口 571158)

【摘要】高校特色馆藏是档案文献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馆藏”向“遗产”的转化是时代需求和国家战略共同推动的结果。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为例,依据“资源—主体—制度”,围绕“为何转化—何以转化—转化条件成熟度分析—转化路径”四个递进层次展开论证。首先,从高校特色馆藏的身份重构论述“为何转化”;其次,从“特色馆藏”到“档案文献遗产”的三个关键条件论述“何以转化”;接着,进行转化条件成熟度分析;最后,提出补齐馆藏资源短板:构建“战略+文化”双轮驱动的馆藏体系、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内外协同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完善制度保障:建立档案文献遗产转化的长效机制的转化路径。以期为高校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转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特色馆藏;档案文献遗产;馆际协同;海南文献

【作者简介】陈萱,海南师范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邮箱:498567574@qq.com,研究方向为档案文化遗产、高校档案管理。

1 引言

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其凭证价值和记忆属性无可替代,是维系学术根基与文化连续性的核心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强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古籍抢救性保护,加强中华典籍文献传承”明确写入其中^[1];《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继续实施“档案文献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2];国家档案局办公室2025年12月印发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3]提出,档案文献遗产须同时满足真实性、原始性、完整性、独特性及可利用性等基本条件,并需经申报、初审、专家评审等法定程序方可入选。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49年,形成了以古籍特藏、海南地方文献、红色文献为核心的特色馆藏体系,不仅是海南历史文化不可替代的资源,

对文化强国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也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多为珍稀版本,兼具原始性与稀见性;海南地方文献系统记录了本岛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具有鲜明的地域独特性;红色文献则保存了革命时期的原始记录,凭证价值突出。这些馆藏资源在真实性、原始性、完整性和可利用性方面均与档案文献遗产的认定标准高度契合,具备转化为档案文献遗产的潜在条件。

然而,在实践中,特色馆藏与档案文献遗产之间仍存在显著距离,需要进行身份转换。因此,本文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为例,围绕“为何转化—何以转化—转化条件成熟度分析—转化路径”四个递进层次展开论证,着重分析图书馆、档案馆等在高校特色馆藏文献遗产转化中的制度功能与协同路径,试图为高校特色馆藏的档案文献遗产转化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参考。

2 为何转化：高校特色馆藏的身份重构

高校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身份转化，并非图书馆职能的自然延伸，也不是简单的概念替换，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2.1 确证档案属性：揭示特色馆藏转化为文献遗产的内在逻辑

高校特色馆藏中的珍贵文献，在生成逻辑、功能定位与保管需求上与档案文献遗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一，原始记录性。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琼崖共产党史略》《海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等珍稀油印文献^[4]，是琼崖革命斗争的“同时代记录”，它们在生成之时并非作为“文物”或“藏品”而存在，而是作为革命斗争的组织文件、汇报材料和学习资料被制作和使用的，在实质上已经具备了档案文献遗产的全部要素。

其二，稀见性与不可替代性。档案文献遗产区别于普通图书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稀见性。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白玉蟾全集》为较罕见的孤本，该馆是海南省唯一完整收藏1950年创刊《海南日报》的机构，这些文献一旦损毁便不可复得，其遗产价值不言而喻。

其三，历史证据性。档案文献遗产兼具“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与“见证、记忆、传承”的文化使命。馆藏海南地方文献中，明清古籍记载了海南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琼崖红色文献见证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程。这些文献不仅是“被阅读”的文本，更是“被研究”“被引用”“被证明”的证据性资源。在档案学语境中，它们的定位更接近“档案”而非一般“图书”。

2.2 对接制度通道：厘定身份确认的双重路径

特色馆藏具有档案属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获得“档案文献遗产”的身份。档案馆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法定主体，也是档案文献遗产申报与评审的制度通道。国家级和省级档案文献遗产的申报与评审，均需通过档案系统进行。高校图书馆若希望将其特色馆藏纳入档案文献遗产体系，必须与档案馆建立制度化的协作通道合力完成。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艺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下简称GLAM）的协作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传播的趋势。GLAM协作是公共文化机构面对数字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环境挑战而形成的，适应公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强化了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了公众学习与创新的共同价值信念。国内学者亦指出，四馆融合参与数字记忆项目

开发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5]。高校特色馆藏的档案文献遗产转化，正是在这一趋势中的具体实践。

2.3 推动认知迁移：实现从“藏”到“用”的价值转向

从“具有档案属性的文献”到“被认可、被激活的档案文献遗产”，其中需要经历价值认知的根本性迁移。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实践表明，特色馆藏能够构建“个人—机构—社会”的立体文化谱系，具备多层次的文化记忆功能正是档案文献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6]。

2.4 回应外部驱动：锚定自贸港建设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制度要求

2025年12月18日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大量国际化元素涌入，使海南传统文化面临传承危机和商业化冲击的双重压力。自贸港建设在推动开放的同时，也对地方特色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与活态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国际化进程中守正创新、留住文化根脉，成为文献遗产保护必须回应的现实命题。2026年5月，海南省档案局（馆）到海南师范大学调研，提出“希望学校档案部门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加大对具有海南特色档案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共同讲好海南档案故事”^[7]。这一来自省级档案主管部门的制度期待，进一步明确了高校特色馆藏从“馆藏”向“遗产”转化的外部驱动力。

3 何以转化：从“特色馆藏”到“档案文献遗产”的三个关键条件

高校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有效转化，需要在“资源—主体—制度”三个维度同时具备条件。

3.1 资源条件：档案文献遗产的体系化建设

档案文献遗产的体系化建设的目标是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与可用性，具体包括：其一，实体资源的体系化——馆藏文献需要在主题、时间、类型等维度形成相对完整的覆盖；其二，数字资源的配套化——系统的数字资源体系既是文献保护的延伸，也是活化利用的基础；其三，整理编目的规范化——文献遗产的价值释放依赖于规范的编目、著录与揭示。例如，浙江大学档案馆藏《竺可桢日记》手稿由56本日记组成，合计约1000万字，横跨1936年至1974年，于2023年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8]；南京中医药大学申报《中药大辞典》原稿（153卷、约45249页）入选第五批名录时，档案馆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从主题内容、稀有性、系统性与完整性等角度深入阐述文献价值，

使该项目成为江苏高校首次入选^[9]。这一实践充分表明,体系化建设是馆藏资源从“可用”走向“遗产”的关键前提。

3.2 主体条件: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档案文献遗产转化涉及收藏、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等多个环节,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任务。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合力最大化。

从校内看,高校特色馆藏需要构建“主体场馆(图书馆、档案馆)—辅助场馆(博物馆、校史馆等)—相关院系—有关个人”四维主体网络,图书馆提供特色馆藏“原材料”,档案馆提供档案文献的“身份认证通道”,双方共同赋予特色馆藏以档案文献遗产的法定身份。同时,博物馆、校史馆等辅助馆藏的参与可以提供实物与史料等文化佐证;相关院系的介入以学术研究挖掘文献内涵;有关个人的参与以捐赠、研究、传播等方式拓展资源边界与价值维度。四维主体各尽其责、功能互补,共同构成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转化的完整生态。

从校外看,档案文献遗产转化还需突破高校围墙,构建校地协同的外部支撑体系。海南省档案馆、海南省图书馆、各级党政机关及文化机构掌握着大量与馆藏文献相互印证的档案史料与行政记录,是文献价值认定、史料互证与申报推动的关键外部力量。高校需与上述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文献互证、联合编研、申报共推等方面形成制度化的协作关系,为馆藏文献的档案身份认定提供外部资源支撑。

从实践层面看,多元主体协同已有多种成熟模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10]、海南医科大学^[11]等高校通过校内机构融合实现整合,华中师范大学通过馆群协同实现育人联动^[12]。上述案例表明,多元主体协同的关键在于建立制度化的协作机制,使各主体在档案文献遗产转化中形成合力。

3.3 制度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

档案文献遗产转化需要制度化的持续投入,涵盖组织制度、运行制度与保障制度三个层次。首先,从组织制度解决“谁来管、谁来做”的问题,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与协作架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决策程序,避免临时性合作导致的衔接断裂。其次,从运行制度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规范文献遗产从整理、编目、数字化到开发利用的全流程操作标准与工作规程,确保各环节有章可循、质量可控。最后,从保障制度解决“能持续做”的问题,通过经费投入、人才队伍、绩效评估等长效

支撑机制,为转化工作提供可持续的资源保障与政策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组织制度搭建协同框架、运行制度规范操作流程、保障制度注入持续动力,三者共同构成档案文献遗产转化的制度闭环。

4 转化条件成熟度分析

依据上述“资源—主体—制度”三条件框架,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的转化条件呈现出“大体具备、部分欠缺”的特征。

4.1 大体具备的条件

4.1.1 资源层面:文献资源积累深厚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古籍5.5万余册,明清古籍700多种13000多册,善本83种1800册,其中《白玉蟾全集》为较罕见的孤本。馆藏海南地方文献2万余册,地方报纸41种、地方期刊104种,收藏数量居全省各图书馆之首,对1950年创刊的《海南日报》实现完整收藏。自建海南地方特色文献数字资源库,涵盖海南书析数据库、海南报刊资料数据库、海南历史文献数据资源库等。红色文献搜集亦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征集《琼崖共产党史略》(复制自哈佛大学图书馆)、《琼崖共首之自述》(复制自广东省档案馆)等多部珍稀早期党史文献,为琼崖革命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角”^[13]。

4.1.2 主体层面:外部政策驱动与学科需求初步形成

在政策法规层面,海南省档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省档案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提前介入、同步跟进、全程管控机制,记录好、留存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历程的珍贵档案^[14]。同年7月,海南省档案局起草了《海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文献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提供了制度通道^[15]。在业务指导层面,2026年5月海南省档案局(馆)赴海南师范大学档案馆调研,指出“高校是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智库”,希望学校档案部门“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加大对具有海南特色档案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16]。上述外部政策驱动与业务指导,促使海南师范大学围绕海南地方文献、黎族文化遗产、南海历史资料等特色资源开展了系统性搜集、整理与数字化工作,初步形成了特色馆藏体系。同时,结合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需求,馆藏资源逐步向教学案例库、实践实训平台延伸,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资源支撑。上述实践表明,在外部政策驱动与

内部学科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特色馆藏已初步具备从静态保存向活态转化过渡的基础条件。

4.1.3 制度层面:古籍保护制度与品牌活动形成基础

在组织制度方面,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依托“国家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平台优势,明确了图书馆、档案馆等相关机构在古籍与档案文献保护中的职责分工,初步形成了“谁主管、谁负责、谁实施”的协同管理架构。在运行制度方面,制定了涵盖古籍普查登记、分级保护、修复操作、数字化加工、编目著录、出入库管理等环节的系列制度规范,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保障制度方面,围绕“古籍文化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形成了年度化策划、常态化实施的运行机制,为古籍活化利用提供了持续的制度支撑。

在上述制度的保障下,馆藏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有序推进,为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身份转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4.2 部分欠缺的条件

4.2.1 资源层面:特色文献整理深度与体系化程度有待提升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文献整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编目不够充分,未能按档案文献遗产标准进行系统梳理、分类定级与价值评估。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先后完成7部59册珍贵古籍善本文书影数字化^[17],以及馆藏南海文献、古籍舆图等特色古籍书影数字化,但战略产业方向的专题数据库尚未建立,标准化的数字资源体系亦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有效转化。此外,各类特色文献分属不同部门,缺乏统一检索平台和跨库联动机制,文献间的内在关联未能充分揭示,难以形成档案文献遗产所要求的整体性与体系性。上述不足制约了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有效转化,我校与海南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征集方面的合作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

4.2.2 主体层面:多元协同机制尚未建立

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短板。校内层面,图书馆与学校档案馆之间缺乏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手稿、信札、照片等具有档案属性的文献资源,未能与档案馆的校史档案、人物档案形成资源互补与信息互通。这种“馆馆分离”的状态,使得大量本可通过档案馆系统申报文献遗产的特色资源失去了制度化的转化通道;与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等相关院系的合作仍处于“偶发对接”状态。校外层面,与海南省档案馆、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等机构之间的制度化协作亦未建立。高校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播体系呈现“蜂窝状”结构特征^[18],各主体各自独立运作,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同样面临这一困境。

4.2.3 制度层面:顶层设计与长效机制缺位

尽管在古籍保护领域已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但从“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转化的顶层设计尚属空白,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的机制性缺失。其一,整体规划缺位。尚未从档案文献遗产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针对高校特色馆藏资源化利用的专门发展规划与行动方案。其二,申报路径模糊。缺乏将特色馆藏纳入档案文献遗产体系的清晰申报路线图与遴选标准,相关转化工作无章可循。其三,协同机制断裂。图书馆与档案馆之间缺少常态化、制度化的跨系统协作工作机制,资源壁垒与行业壁垒并存。其四,评估体系欠缺。尚未建立转化成果的社会服务效能跟踪评估与反馈机制,难以形成“保护—转化—利用”的良性循环。

5 转化路径

立足以上成熟条件,针对上述欠缺的条件,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文献库应从补齐馆藏资源短板、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三个维度推动档案文献遗产转化。

5.1 补齐馆藏资源短板:系统梳理现有馆藏,夯实遗产转化基础

首先,全面摸清家底,建立可申报的文献清单。对馆藏古籍、海南地方文献、南海文献、红色文献等现有特色资源进行系统普查与价值评估,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评选标准,从稀缺性、完整性、历史关联度、文化影响力等维度进行逐项比对,形成一份“具备档案文献遗产申报潜力”的文献清单,明确哪些资源已接近申报条件、哪些仍需进一步补充完善。

其次,推进特色文献的数字化与知识化。在现有自建数据库基础上,参考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数字化平台”经验,提升元数据标引的规范性和检索的智能性,在标引体系中增设“地域文化”“战略价值”“思政切入点”等字段。

最后,开展馆藏档案文献资源普查。厘清图书馆、博物馆、校史馆等特藏中具有档案属性的文献资源,如手稿、信札、日记、契约文书、早期油印本、照片、底片等,并建立“可转化文献清单”,明确哪些资源具备申报档案文献遗产的条件。

5.2 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内外协同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针对校内各主体独立运作、缺乏合力的现状，应从内部整合与外部联动两个层面构建协同机制。

其一，建立校内常态化协同机制。由图书馆牵头，联合档案馆、博物馆、校史馆及相关院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方职责：图书馆负责文献整理与数字化，档案馆负责档案标准对接与申报指导，相关院系负责学术研究与价值阐释，形成“文献整理—档案对标—学术支撑”的校内协作链条。同时发动校内专家学者参与价值评估与申报论证。

其二，建立校地档案文献遗产联合申报机制。与海南省档案馆建立“档案+高校”长期合作机制，联合开展价值评估与申报材料编制，共同推动馆藏文献申报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时实现图书馆与档案馆资源互通，联合编纂专题史料汇编，夯实学术基础。

其三，内外联动探索档案文献共建共享。首先，借鉴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与嘉定区档案馆签署《地方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协议》的做法^[19]以及湖北理工学院与黄石市档案馆开展跨馆查询服务的经验^[20]，实现图书馆特色文献与档案馆档案资源的互通互用，为研究者提供“一站式”的文献查阅服务。其次，建立联合编研与出版机制。图书馆与档案馆共同策划编研项目，将图书馆的特藏资源与档案馆的档案资源整合利用，联合编纂专题史料汇编，提升文献遗产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可见度。

其四，围绕档案文献遗产开展科研和宣传。设立“海南文献研究专项”课题，引导师生参与文献整理。以《更路簿》、海南岛灯塔档案等为核心，开发“档案文献遗产进校园”教育活动及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提升馆藏文献的社会可见度。

5.3 完善制度保障：建立档案文献遗产转化的长效机制

针对顶层设计与长效机制“四个缺失”的突出问题，应从学校战略高度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形成“规划引领—路径清晰—协同高效—评估闭环”的保障体系。

首先，制定整体规划，明确转化战略部署。由

学校统筹制定《海南师范大学档案文献遗产转化五年行动计划》，明确“馆藏整理—馆际协同—遗产申报—活化利用—评估反馈”的全链条路线图，并将档案文献遗产转化工作纳入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从校级层面确立战略优先级。

其次，清晰申报路径，建立分级遴选标准。结合《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选标准，制定《海南师范大学特色馆藏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指南》，建立“校级—省级—国家级”四级递进的培育与申报机制，使转化工作有章可循、梯次推进。

再次，构建协同机制，打破馆际行业壁垒。建立图书馆与档案馆常态化协作制度，推动成立“馆藏文献遗产转化工作专班”，并通过与海南省档案局（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畅通馆际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渠道。

最后，建立评估体系，强化社会服务效能。制定档案文化建设的激励办法，定期从资源增量、学术产出、社会影响、育人效果等维度进行绩效评估，建立评估结果与资源投入、服务优化的动态反馈机制，形成“保护—转化—利用”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与激励机制。

6 结语

高校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转化，并非图书馆职能的自然延伸，也不可能靠图书馆一己之力完成，需要围绕“为何转化—何以转化—转化条件成熟度分析—转化路径”四个递进层次深入剖析，立足已有成熟条件，针对欠缺的条件，从补齐馆藏资源短板、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三个维度进一步推动特色馆藏向档案文献遗产的有效转化。

面向未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应以“补缺式征集”夯实资源根基，以“馆际协同”打通转化通道，以“制度化运行”保障可持续发展，推动海南文献库从偏重保管的文献仓库，真正转化为服务自贸港建设、彰显海南文化自信的档案文献遗产，切实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着力履行“见证、记忆、传承”的文化使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 2026-03-14 (001).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全文）[J]. 中国档案, 2026(6):10-11.

[3]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2025-12-23)[2026-06-25].<https://www.saac.gov.cn/daj/tzgg/202512/eb9db92973014913b94efc072250021b.shtml>.

[4][13]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特色馆藏文献展(二十九)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百年薪火——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EB/OL].(2025-01-18)[2026-06-25].https://mp.weixin.qq.com/s/R_tlHDK_dCGQUnOwE7TYQA.

[5] 张旭, 张斌. GLAM 机构参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 兴起背景、实践意蕴与实现路径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15):103-111.

[6] 赵兴胜. 构建一体多维的文化传播实践体系——山东大学图书馆对古籍特藏活化利用的探索 [EB/OL].(2025-07-14)[2026-06-25].<http://file.calis.edu.cn/upload/4a489894-6c8f-4c9c-b192-8b0bc91edf22/files/report-%E8%B5%B5%E5%85%B4%E8%83%9C.pdf>.

[7][16] 海南师范大学档案馆. 海南省档案局(馆)来我校档案馆调研 [EB/OL].(2026-05-29)[2026-06-25].<https://dag.hainnu.edu.cn/2026/0528/c3519a165691/page.htm>.

[8] 金灿灿. 浙江大学档案馆藏《竺可桢日记》手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EB/OL].(2023-01-12)[2026-06-25].http://acv.zju.edu.cn/site/bgwx_view.html?id=1603.

[9] 韩向斌.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大辞典》原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EB/OL].(2023-01-13)[2026-06-25].<https://archives.njucm.edu.cn/2023/0113/c5436a110036/page.htm>.

[10] 张锐, 王建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四馆协同培育时代新人 [EB/OL].(2024-08-31)[2026-06-25].https://news.gmw.cn/2024-08/31/content_37535052.htm?time=1785404219191.

[11]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海南医科大学图书档案馆概况 [EB/OL].(2025-07-01)[2026-06-25].http://www.hnsl.net/skjp/pjjd/202507/t20250701_3480332.html.

[12] 钟思, 王斌, 胡琳, 刘婧. 王怡文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华中师范大学: 聚合三馆资源 构建师范特色馆群协同育人新体系 [EB/OL].(2026-07-03)[2026-06-25].<https://archives.ccnu.edu.cn/info/1037/11181.htm>.

[14] 海南省档案工作会议召开 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体系 [EB/OL].(2026-03-20)[2026-06-25].<https://www.hainan.gov.cn/szfbgt/sdaj/tpxw/202603/7061e2de20c94e8a829a8e03da6c73b6.shtml?ddtab=true>.

[15] 海南省档案局关于对《海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开展问卷调查的公告 [EB/OL].(2026-07-29)[2026-08-05].<https://www.hainan.gov.cn/szfbgt/sdaj/tzgg/202607/b6acd2df1e044a5e93c413cc1fe7abb6.shtml>.

[17] 张琬茜. 让古籍活出彩! 海南首个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成立 [EB/OL].(2025-06-13)[2026-08-05].<https://www.hinews.cn/page?n=2718462&m=1&s=1044>.

[18] 朱彤, 赵亮, 郑藿芬, 李梓彤. 协同治理视域下高校档案文献遗产分众传播模式构建研究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5):92-99.

[19] 天华学院与嘉定档案馆“牵手”共建, 让娄塘文脉在青年手中“活”起来 [EB/OL].(2026-05-11)[2026-08-05].https://www.jiading.gov.cn/xinwen/jddt1/msxw/content_964594.

[20] 湖北理工学院图书馆. 馆校联动聚合力 资源共享提质效 - 我校与黄石市档案馆成功举行跨馆查询服务合作签约仪式 [EB/OL].(2026-05-19)[2026-08-05].<http://lib.hbpu.edu.cn/info/1050/1508.htm>.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in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Hainan Literature Collection at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Chen Xuan

(Archives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Abstract: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constitute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llections" to "heritage" is the result of both contemporary demands and national strategic imperatives. Taking the Hainan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evelops its argument through four progressive tiers—"why to transform," "how to transform," "readiness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grounded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sources—stakeholders—institutions." First, it addresses "why to trans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reconfiguration of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Second, it examines "how to transform" by identifying three cri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shift from "special collections" to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Third, it conducts a readiness analysis of these transformation conditions. Finally, it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remediating collection resource gaps by constructing a "strategy + culture" dual-driven collection system; deepen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by establishing internal-external synergistic and regulariz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by developing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into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Keywords: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Archival documentary heritage; Inter-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Hainan literature

面向真实性的版式电子文件签审流程研究

张泽升 易雨洁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510510)

【摘要】文章剖析了实践工作中“在线编辑器生成文件+事后批量签名”“审签分离+后台代签”两大典型电子文件签审流程违规模式,分析了具体风险,构建了“建设合规签审流程、落实合规签审功能需求、明确合规签审管理规定、加强行业监管与培训”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以期为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提供可落地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电子文件; 电子档案; 真实性; 签审流程; 电子签名

【作者简介】张泽升,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档案事业部总经理, 副研究馆员,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邮箱: 1194800632@qq.com, 研究方向为电子文件归档、电子档案管理; 易雨洁,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工程电子档案管理。

1 引言

数字转型浪潮下, 电子档案凭借存储便捷、流转高效、易于共享等优势, 正逐步替代传统载体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明确了“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1]。其中, 电子档案的真实性, 一般通过对固化信息是否有效、元数据项是否规范等方面来进行验证^[2]。固化信息主要包括数字摘要、SM3、电子签名、时间戳等技术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明确提出“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同时明确可靠电子签名四要件, 即签名制作数据归签名人专有, 签署时仅由签名人控制, 签名及内容改动可被查验, 文件内容与形式改动可被查验^[3]。《电子印章管理办法》(国办发〔2025〕33号)第二十一条确立了“谁

所有、谁控制、谁签章、谁负责”的使用管理原则, 第二十二条明确“电子签章过程信息应当被记录并保存, 实现电子签章行为可追溯、可定责”^[4]。

《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国家档案局令 第22号)提出“电子文件归档格式应当具备开放、不绑定软硬件、显示一致性、可转换、易于利用等特性, 并能够支持向长期保存格式转换”^[5]。《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T 47-2009)^[6]和《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7], 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DA/T 92-2022)要求, 电子文件审核、签发、签章等关键节点必须完整留存修改痕迹与全流程元数据^[8]。

依据电子档案管理与电子签名相关规定和要求, 电子文件归档与长期保存工作中主要推荐使用的文件格式是PDF/A和OFD/A。PDF/A和OFD/A作为静态内容能满足档案管理与电子签名双重要求的格式, 通过强制嵌入字体、禁止外部依赖、固

化版面结构,确保了电子档案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迭代后,仍可准确还原。

然而,在面向归档的版式电子文件在快速推广应用过程中,电子签审的违规乱象已呈蔓延之势。例如“在线编辑器生成文件+事后批量签名”“审签分离+后台代签”等违规做法普遍存在,这些做法表面上完成了电子签名,实质上却破坏了电子文件的真实性。

本文剖析了上述违规签审现象及其风险,并提出了面向真实性的版式电子文件违规签审流程治理路径,以期为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实现电子档案规范化推广提供可落地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版式电子文件签审流程的典型违规现象分析

2.1 两大典型违规流程剖析

2.1.1 模式一:在线编辑器生成+事后批量签名

该模式下,业务人员使用支持多人协作的通用在线编辑器生成普通 PDF 文件,文件保留编辑接口与外部依赖,未通过版式锁定与权限控制机制固化文件内容。业务系统仅留存简易审批记录,未嵌入标准归档元数据。审批流程全部办结后,系统后台归集所有个人 CA 私钥,跳过身份核验,一键批量完成所有签名,将违规事后批量签名后的普通版式文件直接归档。

2.1.2 模式二:审签分离+后台代签

该模式刻意借用“审签分离”概念混淆合规边界,审批人在业务系统中完成全流程线上审批,系统留存审批表单,但审批记录与文件本体相互分离,未实现元数据绑定。更为关键的是,签名环节绕过本人授权,由系统后台统一调取责任人的个人私钥,自动批量完成各方签名,所有签章时间精确到同一秒,操作日志批量生成,无独立履职记录,难以追溯责任人,却对外宣称“审签分离合规文件”。

以上两种模式在《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可靠的电子签名”四要件方面均存在违规行为:第一,数字证书私钥由后台统一控制,并非签名人本人专有,违反“专有性”要求;第二,签名人未在签署时实际控制私钥,签名行为由系统后台代完成,违反“控制性”要求;第三,批量生成的标准化签名数据可被复制替换,签名本身被改动后难以察觉,违反“签名防篡改”要求;第四,文件生成、业务审批与电子签名在时序上相互脱节,文件在签名前可能被系统后台替换、增删或格式重排,而事后补签无法对签署时的文件状态进行即时哈希固化与密码学绑定,导致文件内容与形式发生改动后无

法通过签名进行独立查验,违反“内容防篡改”要求。

2.2 违规签审流程风险剖析

以上两类违规签审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将引发以下三重连锁风险。

2.2.1 法律效力风险

事后批量签名与后台代签两种违规模式本质上都是用系统自动化代替签名人的控制与确认。然而,在追求操作效率的过程中省略了关键控制环节,不仅牺牲了法律行为的严肃性,也削弱了元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9]。此类电子文件无法满足司法审查中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检验要求,更会导致大批文件集体失效的链式污染风险。同时,后台统一归集个人私钥的操作,违背了《电子印章管理办法》(国办发〔2025〕33号)第二十一条“谁所有、谁控制,谁签章、谁负责”的原则,存在行政追责风险。

2.2.2 档案合规风险

违规模式生成的电子文件在移交接收环节存在真实性问题,无法满足《档案法》关于电子档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要求,难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同时,这类电子文件归档后形成的电子档案也无法满足进场交易所要求的“归档完整性、内容合规性、保管安全性”质量标准^[10]。此类违规生成、无法交易的电子档案不仅将导致业务资质审查受阻,更可能面临经济损失、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2.2.3 技术安全风险

文件属性层面,违规签审模式下生成的电子文件采用非归档格式,面临内容可被篡改、元数据不完整等真实性问题,不能满足电子文件归档的基本要求。系统安全层面,事后批量签名工具和后台代签私钥库一旦被内部滥用或外部攻破,操作者即可利用集中控制的私钥批量伪造文件签名、冒用任意责任人账户进行虚假签署,且系统审计日志无法区分真实签署与后台代签行为。管理追责层面,两种违规签审模式将签名控制权让渡至系统后台,存在无法追溯、无人担责的管理漏洞,最终仍将由所在机构承担额外的财务与法律风险。

3 面向真实性的版式电子文件违规签审流程治理路径

3.1 建设合规签审流程

3.1.1 推荐使用一步一签模式

一步一签模式是指在电子文件生成的关键业务节点,由责任人通过其专有私钥实时施加电子签名,签名行为与审批行为同步完成,时间戳与文件内容

即时固化。该模式以“文件生成即锁定、审批即留痕、签署即固化”为技术原则，其标准操作流程如下。

首先，文件生成与版式锁定。审批流程在业务系统发起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符合归档要求的版式电子文件，并通过版式锁定与权限控制机制禁止二次编辑，确保文件内容从生成之时即处于封闭状态。其次，在线审阅与意见固化。负责人在线审阅后签署审核意见，作为业务元数据同步嵌入文件属性，与文件内容共同构成完整的审批记录，从而满足“签名人认可内容”这一法律前提。再次，身份核验与数字签名。签署意愿确认完毕后，签名人通过身份核验调用个人私钥；系统采用国密算法对电子文件完整内容计算哈希值（即数字摘要），签名人使用私钥对该摘要进行签名运算生成签名值，并将包含签名值、签名证书、时间戳的签名数据以增量更新方式追加嵌入版式文件，确保原文件结构不被破坏。最后，日志固化与责任锁定。签名动作一经完成，系统即时生成独立操作日志与可信时间戳，元数据在时序上保持高度统一。签名全过程由签名人独立操作，系统仅提供技术通道，不得进行后台干预，从而确保签署行为的专属性、控制性与责任链条的完整性与可溯源性。

3.1.2 有条件推荐规范审签分离模式

审签分离指业务审批与电子签名在操作环节上由不同主体或不同系统中分步完成，但各自独立留痕。审签分离通常表现为：业务审批（审）→审批结论形成→电子签名（签）→归档。业务系统中，审批结论形成后，由责任人分时段、分账号、独立调用其个人私钥完成签名，生成独立的时间戳与签名日志（含审批人、审批意见、审批时间）。此模式下，审批元数据与签名元数据虽物理分离，但可通过统一编号建立关联映射，两者相互印证，仍具有真实性，属合规归档。

3.2 落实合规签审功能需求

依托合规 CA 机构签发的数字证书构建信任根基，在应用系统层面实现以下关键功能要求。

3.2.1 前置身份绑定

为实现签名人身份与数字证书的强绑定，需严格执行以下要求：一是数字证书申请须通过身份证件核验与人脸识别的双重实名认证，不得由管理员批量代为申请；二是系统不得提供在服务器端或软件库中生成并代管私钥的功能，系统管理员不应拥有直接调用用户私钥的接口权限；三是证书有效性未通过系统验证时不能进行签名；四是数字证书的发放、调取、更新、注销等操作须经签名人本人二次确认。

3.2.2 签署前意愿确认

文件一旦进入待审批签名流程，系统自动执行内容锁定并实时计算哈希值，任意改动均会重新生成新的文件版本。签名人通过身份校验，需完整预览文件后才能执行个人意愿确认操作，并实时完成。

3.2.3 签署时单次单签

签名过程只能在签名人控制的终端介质内完成，意愿表达与签名运算不可分割。即使是同一签名人连续签署多份文件，也必须先发起独立的意愿确认与私钥运算流程，系统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签名复用或批量套用功能。签名完成的同时，系统自动加盖时间戳，与签名值、哈希值一同打包固化，形成不可篡改的签名结果。

3.2.4 签署后校验固化

签名完成后，系统服务端自动对签名进行比对校验。若校验不通过，系统自动回退流程并反馈异常信息，相关文件不得进入后续审批环节或归档。若校验通过，系统会将文件本体与签名相关数据一同绑定固化，杜绝事后篡改风险。

3.2.5 明确审签模式边界

若业务场景确需采用“先审核、后签名”模式，必须确保审签分离操作规范。审核阶段在业务系统中留存完整独立的审批元数据，签名阶段由各责任人分时段、分账号独立签章，各签名时间戳互不重复。应将事后批量签名、违规审签分离等行为划定为技术红线，严格禁止。

3.3 明确合规签审管理规定

3.3.1 明确签署工作要求

档案主管部门独立，或者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出台电子文件签署相关实施细则，明确归档/长期保存的电子文件格式必须为 PDF/A 或者 OFD/A，并采用一步一签或者合规的审签分离模式；明令禁止事后批量签名、后台代签、虚假审签分离等行为，划定不可逾越的行业红线，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性。

3.3.2 落实个人数字证书权属与管控责任

各单位须在文档管理制度体系中明确数字证书的权属关系与管控义务，证书及对应私钥归签名人本人专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归集、代管或调用。应通过常态化宣传强化全员认知，并区分责任情形：因签名人本人出借、泄露私钥导致的违规签名，由签名人承担主要责任；因系统后台代签、批量调用等未经授权操作导致的签名违规，由系统服务商承担主体责任。此外，系统服务商应定期对业务系统中的签名模块进行渗透测试和抽样比对，若发现疑似事后批量签名或后台代签等违规行为

为,须立即上报并组织排查。

3.3.3 建立电子文件合规考核与追责制度

各单位应将电子文件合规情况纳入部门与个人的绩效考核指标,建立清晰透明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故意使用事后批量签名、后台代签等违规签审模式,致使电子文件失去真实性,影响审计或验收等情形,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3.4 对接专项验收与司法要求

各单位,尤其是工程、政务等领域,在遵循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维护电子文件“四性”的同时,应紧密对接司法审查领域“三性”要求,将相关管理与技术措施,如使用符合归档要求的版式文件、一步一签模式、元数据完整且时序统一等,确立为电子文件验收与移交的准入条件,在制度层面杜绝失去真实性的电子文件进入验收程序。

3.4 加强行业监管与培训

3.4.1 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联合档案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自查与检查,全面排查采用违规模式进行签

审的单位或项目。将电子签名合规性纳入归档验收必查项;对不符合真实性要求的电子文件归档行为,下达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或者系统服务商,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对于已经采用违规签审模式、尚处于质保期与追责期内的重要档案,应重新发起合规流程,组织规范化补签,形成新的合规档案,并保留原文件的溯源证据。若通过违规签署模式产生的档案已过追责期,应建立专项管理台账,注明问题情况后单独存放,根据国家规定的档案鉴定与销毁程序另行处理。

3.4.2 提升相关人员素质

面向文件档案管理人员、业务经办人员及系统服务商开展分层培训:文件档案人员重点掌握“四性”检测技术,尤其是真实性检测,包括版式文件验证、数字签名验签、元数据审计等技术技能;业务人员重点强化一步一签操作规范与法律风险意识;系统服务商重点提示违规签署的风险与法律惩处。同时,鼓励档案工作人员考取档案数字化管理师等职业资格,破解档案专业人才数字素养不足的困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EB/OL].(2020-06-20)[2026-06-24].<https://www.saac.gov.cn/daj/falv/202006/79ca4f151fde470c996bec0d50601505.shtml>.
- [2] 王大众.《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一般要求》解读[J].中国档案,2019(4):34-35.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EB/OL].(2019-04-23)[2026-06-24].<https://flk.npc.gov.cn/detail?id=ff8080816f135f46016f2163e4261aa1&title=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印章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2025-09-27)[2026-06-24].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46/202510/content_7044732.html.
- [5] 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国家档案局令 第 22 号) [EB/OL].(2024-11-01)[2026-06-24].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746/202412/content_6991650.html.
- [6] DA/T 47-2009 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 [S].
- [7] GB/T 18894-2016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S].
- [8] DA/T 92-2022 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 [S].
- [9] 张瑞华,郑毅,高大伟.电子档案中电子印章“去技术化”的法律问题及解决路径[J].档案管理,2025(2):24-28+33.
- [10]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西:全面开展工程类进场交易项目档案专项核查 [EB/OL].(2026-07-06)[2026-07-24].<https://zzggzy.zhengzhou.gov.cn/xyzx/20260706/dee22d9f-f3b4-45f2-aa88-3d47db45e044.htm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oriented Format Electronic Document Signing Process

ZHANG Zesheng, YI Yujie
(Guangzhou Weibai Software Co., Ltd., Guangzhou 510510)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wo typical violation modes of electronic document signing and approval processes in practical work, namely "online editor generated files+post batch signatures" and "separation of review and approval+backend proxy signatures". It analyzes specific risks and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building compliance review and approval processes, implementing compliance review and approval function requirements, improving review and approval 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y supervision and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nsuring the authenticity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Keywords: Electronic files; Electronic archives; Authenticity; Sign off process; Electronic signature

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归档创新与实践

——以广州地铁 8 号线东延段为例

陈炳新¹ 冯亚琳¹ 陈俊文¹ 孙婷婷² 卢贵英³

(1.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510330;

2. 广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 510330;

3.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510620)

【摘要】文章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东延段工程为案例, 引入工作分解结构法 (WBS), 构建“WBS 节点—文件—档案”的数字化映射路径。通过制定《土建工程施工监理文件清单》, 以 WBS 为方法工具, 预定义文件的类型、责任主体、载体形式及归档指向, 实现文件生成端的属性预置。编制了细化的《项目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档案保管期限表》, 建立了与前端 WBS 节点有效对接的层级化类目体系, 为文件提供明确的归档依据。进而依托统表系统、项目档案系统、集团机构档案系统及城市城建档案馆系统的协同, 实现电子文件生成、流转、整理、归档、移交的全流程自动化处理。

【关键词】工程电子文件; 自动归档; 工程电子档案; 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陈炳新,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数字中心档案主管, 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电子档案管理; 冯亚琳,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数字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数智管理; 陈俊文,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数字中心档案主管, 研究方向为电子档案管理; 孙婷婷, 广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工程档案管理; 卢贵英 (通信作者),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邮箱: 693081408@qq.com, 研究方向为工程电子档案。

1 引言

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推动下, 工程建设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迈向纵深发展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规〔2024〕1 号) 强调“实行一项目一档案统一管理”, 要求“创新归档工作方法, 优化归档工作流程”^[1]。当前, 工程建设项目档案数字化管理正处于从“纸质+扫描”管理向“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跃升的阶段, 工程文件在线流程管理与预归档亦在逐步探索中^[2]。然而, 前端工程建设的动态性与后端档案管理的规范性要求之

间难以有机统一, 导致业务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面临衔接不畅、电子文件完整性保障不足等一系列现实挑战^[3-4]。现有实践多聚焦于通过信息包推送实现异构系统间的数据交互^[5], 尚未形成从业务活动到档案分类的逻辑映射机制,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文件“来向”与“去向”的确定性问题。

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前提在于工程电子文件的自动归档, 解决文件“从何生成”与“归于何处”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当前实践的困境在于, 业务端的文件生成规则与档案端的归档方案均存在模糊地带。由于业务管理层固有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项目团队难以事前精确界定每一

工作节点应生成的文件类型、内容规范及其责任主体。因此，文件生成规则难以转化为计算机可自动执行的确定性逻辑。与此同时，档案管理端在项目初期通常难以制定出足够细化、可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案，其分类结构往往只明确到二级类目，而深层类目的缺失会导致文件无法获得清晰的、预定义的归档位置。这种“来向不清”与“去向不明”的双重模糊，正是当前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化归档实践难以大规模推广的主要症结所在。

在此背景下，广州地铁率先在“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东延段”（以下简称“8 东”项目）中开展探索与实践。本研究深入业务前端，将工作分解结构法（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植入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流程，聚焦于界定每一个 WBS 节点应生成的文件，并建立这些文件与后端档案分类体系的直接关联，从而构建出一条贯通业务生成端与档案管理端的数字化映射路径。本文旨在系统阐述该路径的构建逻辑、关键机制与系统实现，以为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归档提供可复用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

2 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归档总体方案与关键机制设计

为应对工程电子文件自动化归档“来向不清”与“去向不明”的双重问题，以及业务端与档案端之间的结构性断层，本研究以 WBS 为方法工具，

构建“WBS 节点—文件—档案”的数字化映射路径（如图 1 所示），并围绕前端规则预置、后端结构控制与跨系统移交三个维度展开机制设计。

2.1 总体框架：基于 WBS 的映射机制设计

WBS 是项目管理领域中界定和控制项目范围的核心工具，它是“将项目的整个工作范围按项目要素的可交付成果分门别类地进行组织与定义得到的项目层次结构”，并强调“每向下一个层次，意味着对项目工作的更详尽细致的定义”^[6]。本研究提出的路径旨在建立一种从业务活动到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映射机制，将电子文件从逻辑上关联至档案分类体系，为全流程自动化归档奠定结构性基础。

该机制的实施以工程实体的精细化分解为前提：以 WBS 为方法工具，将建设项目逐级分解至合同段/标段/工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分项工程等层级，并为各节点明确定义其必须形成的文件类型、责任主体与内容规范，从而在源头确保文件属性的确定性。与之并行的是后端档案分类方案的协同设计：在项目启动阶段即制定覆盖全面、层级深入的档案分类方案，其细化程度须与前端 WBS 节点有效对接，为每一类文件预定义清晰的归档位置与保管期限，形成稳定的结构控制。最终，通过在前端 WBS 节点与后端档案类目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数字化绑定，实现文件生成即自动归位的闭环控制，将文件管理的控制点前置至业务创造起点，同时以档案管理目标反向约束文件全生命周期，形成前后端协同的治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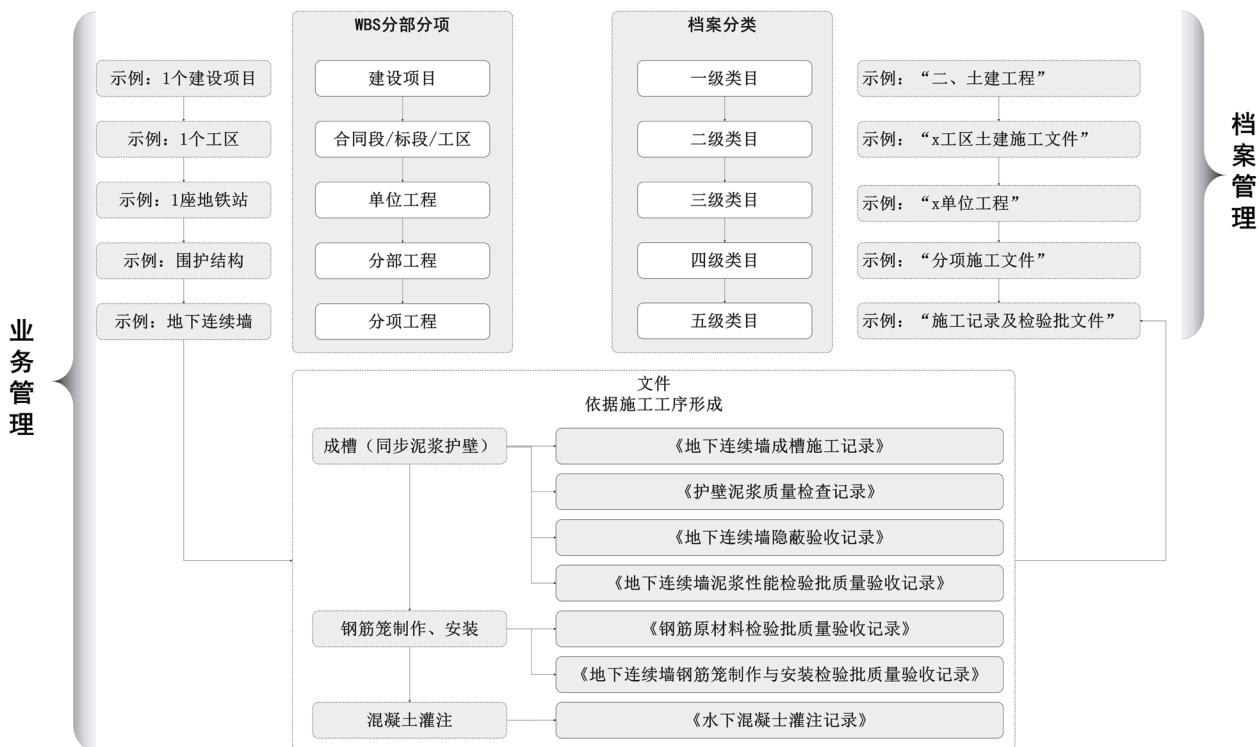


图 1 “WBS 节点—文件—档案”路径示意图

2.2 前端规则引擎：文件生成端的属性预定义机制

在业务端，本研究构建了《土建工程施工监理文件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作为连接业务活动与档案分类的规则引擎，该《清单》并非静态的文件目录，而是一套结构化的前端控制工具，其核心设计逻辑在于：以 WBS 节点为牵引、以文件归档为指向，在业务活动发生之初即为每一个可能产生的具有归档价值的文件预定义其数字身份与归档路径。这一机制将传统文件生成后的被动识别与分类模式，转变为事前预置的主动管理模式，使得文件一旦在业务系统中的特定 WBS 节点被创建，其类型、归档位置、载体形式和保管期限等属性即可被系统自动识别并继承。

首先，在结构设计上，《清单》依据工程管理主体与业务属性进行分类：第一类为监理文件，针对监理单位自身形成的文件，明确其名称、标准表格体系中的对应编号、档案分类方案中的对应归档位置及载体类型；第二类为通用施工文件，聚焦各施工标段、工区中具有共性的通用文件，确保跨单位工程的同类文件在生成伊始即遵循一致的归档指向；第三类为专项施工文件，根据不同单位工程（如地铁站、区间、车辆段等）的特点进行定制，严格遵循“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层级进

行划分^[7]。其次，在最末端的工序节点上明确规定依次形成的文件序列。最后，在载体管理策略上，结合业务实际设定分级管理模式。即对于监理旁站记录、施工记录、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等大体量文件，大力推进全流程电子化；对于单位工程开工报告等当前仍需纸质原件管理的特定情况，则保留纸质与电子并行的过渡机制。

2.3 后端结构控制：档案分类体系的深度适配

在档案管理端，本研究构建了《项目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档案保管期限表》（以下简称“三合一制度”），作为深度融合业务逻辑的归档控制体系。“三合一制度”的设计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其一，分类结构须具备综合性与前瞻性。立足于项目全生命周期，“三合一制度”将项目档案划分为前期文件、土建工程、监理文件等一级类目，并逐级细化成清晰的层级体系，与前端 WBS 中的工程实体节点形成逻辑对应。其二，类目细化与归档文件相对应^[8]。通过“三合一制度”对各级档案类目的主要内容、文件类型和保管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确保前端 WBS 节点生成的文件能够找到唯一、稳定的归档指向。由此，档案管理不再是项目末端的被动接收，而是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引导与过程控制，形成“WBS 节点—文件—档案”的结构化控制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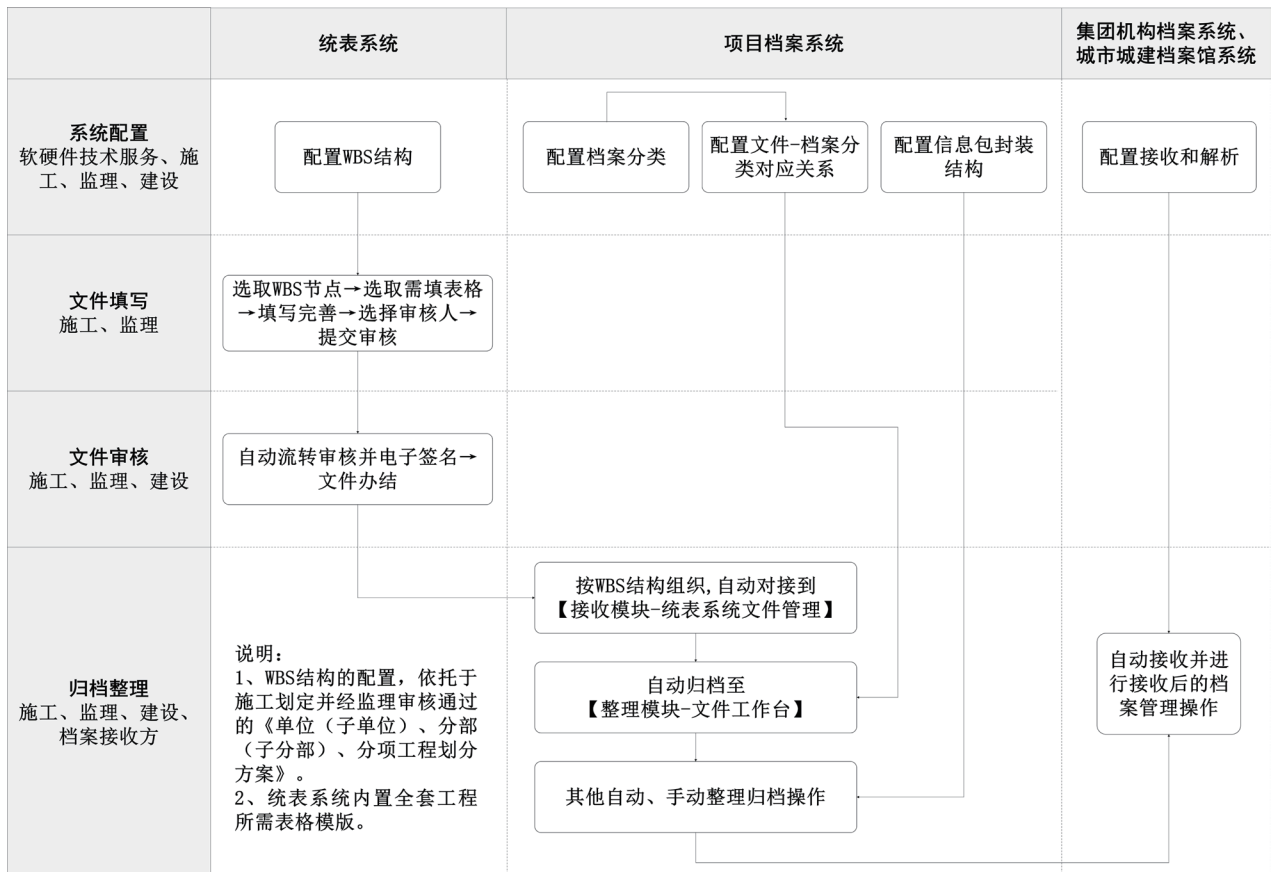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 WBS 的电子文件自动归档流程图

2.4 跨系统移交：信息包的标准化封装与无损流转

为确保电子档案在项目、机构与档案馆之间的规范流转，本研究编制了《建设工程档案信息包封装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主要明确了项目档案管理系统生成的、推送至集团机构档案系统及城市城建档案馆系统的移交信息包的封装标准，主要包括完整元数据、内容数据及封装信息。该机制通过统一的数据格式与校验规则，实现跨系统、跨层级的在线无损移交，既保障了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也大幅提升了移交效率，增强了移交过程可追溯性，从而完成从文件生成到档案进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3 系统实现与应用验证：基于 WBS 的电子文件自动归档机制

3.1 系统集成架构与总体流程

基于前述“WBS 节点—文件—档案”映射路径及前后端协同控制机制，本研究依托“统表系统—项目档案系统—集团机构档案系统及城市城建档案馆系统”的集成架构，构建了工程电子文件从生成、归档再到移交的全流程自动化处理通道。统表系统作为前端业务平台，承担施工与监理过程中电子文件的形成、填报与审核的任务，系统内置工程所需的标准化表格模板集。项目档案系统作为后端归档平台，负责电子文件的自动化接收与整理。集团机构档案系统及城市城建档案馆系统作为上级档案管理平台，负责接收整理完毕、检测通过的项目电子档案，并对接收的档案进行后续管理。三层系统通过预设的数据映射规则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业务形成—自动归档—在线移交”的运行闭环（如图 2 所示）。

3.2 前端业务贯通：统表系统的结构化运行

在系统初始化阶段，研究团队协同硬件技术服务方及各参建单位，依据经审核确认的《单位（子单位）、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方案》，在统表系统中完成 WBS 节点的逐级配置，构建起与工程实体结构相对应的文件生成框架，为后续电子文件的结构化生成奠定基础。在文件编制环节，施工与监理人员根据实际工程内容，在统表系统中选择对应的 WBS 节点，调用预置的标准化表格模板进行填报。文件填报完成后，系统自动触发预设的审核流程，将文件推送至相应责任人进行分级审核。在审核流转环节，统表系统依据预设权限，驱动文件在施工、监理与建设单位之间自动流转，并支持电子签名与签章功能，确保文件流转的合规性

与可追溯性。审核办结后，统表系统自动捕获并生成电子文件的相关元数据，赋予文件向项目档案系统流转的数据条件与身份标识。

3.3 后端自动归整：项目档案系统的智能处理

项目档案系统在接收端与统表系统实现数据对接，能够依据 WBS 编码自动识别前端生成的电子文件，并将其归集至“接收模块—统表系统文件管理”中，确保文件来源清晰、结构有序。在系统配置层面，研究团队协同软硬件技术服务方与各参建单位完成档案分类体系的数字化搭建，并配置“文件—档案”之间的映射规则，为自动归档提供逻辑依据。在归档整理环节，项目档案系统依据预设映射规则，将已接收文件自动归位至“整理模块—文件工作台”中的相应类目。同时，系统保留人工干预接口，允许对特殊情况下的文件进行手动调整与补充归档，在保障自动化效率的同时兼顾业务灵活性。

3.4 跨系统在线移交：移交信息包的标准化流转

在归档流程末端，项目档案系统支持将整理完毕、检测通过的电子档案，按照《标准》要求，封装为标准化的移交信息包，通过在线通道分别移交至集团机构档案系统及城建档案馆系统。各接收系统对数据包进行格式校验与完整性核查，校验通过后解析入库，并实时反馈移交状态。该机制有效压缩了电子档案的移交周期，实现了从文件生成到档案进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上述前后端协同机制及跨系统在线移交在“8 东”项目中得以完整实施，从实践层面验证了“WBS 节点—文件—档案”自动归档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实践表明，该路径有效贯通了业务活动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工作链条，为实现工程电子文件“来源清晰、去向明确、管理闭环”的自动归档模式提供了可复用的技术方案与管理范式。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基于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的轨道交通工程数据归档研究”（2024-R-030）的阶段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EB/OL].(2024-03-22) [2026-07-2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7038.htm.
- [2] 顾敏.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档案标准化管理: 历程、特点与展望 [J]. 档案学刊, 2025(3):21-30.
- [3] 曹孟君, 张锡田. 建设工程档案前端控制研究 [J]. 中国档案, 2020(5):64-65.
- [4] 陈艳.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工程档案管理的多元主体协同 [J]. 浙江档案, 2025(8):50-53.
- [5] 王国爱, 卢贵英, 陈和. “互联网+工程电子档案”中的质量系统需求 [J]. 兰台世界, 2025(11):93-96+100.
- [6] GB/T 23691-2009 项目管理 术语 [S].
- [7] 张泽升. 前端控制原则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J]. 浙江档案, 2024(12):55-58.
- [8] 钟伦清, 林惠燕, 陈炳新, 等.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分类规范》解读 [J]. 中国档案, 2018(6):20-21.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Automatic Archiving of Engineering Electronic Files: A Case Study of the East Extension of Guangzhou Metro Line 8

CHEN Bingxin¹, FENG Yalin¹, CHEN Junwen¹, SUN Tingting², LU Guiying³
(1. Guangzhou Metro Group Co., Ltd., Guangzhou 510330;
2. Guangzhou Metro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 Ltd., Guangzhou 510330;
3. Guangzhou Weibai Software Co., Ltd., Guangzhou 510620)

Abstract: Taking the Guangzhou Urban Rail Transit Line 8 East Extension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 method to construct a digital mapping path of "WBS nodes files archives". By developing a "Lis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Documents for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using WBS as a tool, the types, responsible parties, carrier forms, and archiving directions of predefined documents are defined to achieve attribute presetting at the file generation end. We have developed a detailed "Project Archive Classification Scheme, Document and Material Archiving Scope, and Archive Retention Period Table" and established a hierarchical category system that effectively connects with the front-end WBS nodes, providing clear archiving basis for documents. Furthermore, 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unified table system, project archive system, group institution archive system,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 system, the full process automation of electronic file generation,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 archiving, and transfer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Engineering electronic files; Automatic archiving; Engineering electronic archives; Construction project

国家战略视域下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评向立文《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

尹鑫 舒文静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在数字中国建设与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背景下,档案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其管理模式与治理体系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挑战。《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一书立足于新时代档案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实证调研、比较研究等多元方法,构建了逻辑严密、视阈宏阔的档案大数据战略理论体系。该书不仅厘清了档案大数据的概念与理论,更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擘画了战略实施的路线图。文章旨在从全书的逻辑架构、鲜明特色及价值贡献三个维度出发,深入剖析该著作在推动档案事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价值与应用前景,以期引发学界对于档案大数据战略的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档案大数据;档案数据;档案事业;档案工作

【作者简介】尹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讲师、档案智能开发与服务国家档案局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邮箱:00035755@whu.edu.cn,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档案可信数据空间;舒文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档案可信数据空间。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首次将大数据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了全面详尽的战略部署^[1]。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2]。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档案数据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数据时代驱动档案资源从传统模拟态向数字

态、数据态嬗变^[3],档案数据海量生成、迅速积累。顺应大数据发展趋势,促进档案数据融入大数据时代,实现档案大数据战略布局,成为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30.6万字)在思考实施档案大数据战略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外代表性国家档案大数据战略实施以及我国档案大数据建设现状的总体把握,明确提出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目标,并系统探讨了其实现路径。该书为加强档案大数据治理提供了启示与方法借鉴,对研究新时代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 《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

全书共十章，体系完整、结构严谨，遵循“背景分析—理论构建—现状调研—战略设计—路径实施”的总体逻辑理路，对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内容不仅涵盖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更深入探究了国内外发展现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及系统研究等多种科学方法，构建起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档案大数据战略体系。

第一章作为导论，并未局限于一般的背景介绍，而是从学术史与实践论的双重维度出发，通过分析档案大数据战略这一核心议题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精准剖析了档案大数据战略实施所处的时代语境、政策环境及实践场景。该章明确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不仅具有丰富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指导档案事业转型的应用价值。在对国内外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该书通过厘清现有研究的脉络与缺憾，找准了研究的切入点，并从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及方法论等方面擘画了全书的研究路线图，为后续章节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前提。

第二章聚焦于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理论基础。针对当前档案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的模糊性，该部分首先对大数据、档案大数据、战略、大数据战略及档案大数据战略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深刻阐释了档案与大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明确了档案大数据的内涵边界与本质特征，从而确立了研究对象的具体范畴。在此基础上，该书引入了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将大数据理论、数据治理理论、战略规划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作为支撑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的理论依据，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这一框架，该书深入分析了档案部门实施大数据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理论高度论证了档案事业拥抱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逻辑，解决了“为何做”与“能否做”的前置性问题。

第三章秉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比较研究视角，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档案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样本，对其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剖析。通过系统梳理国外档案大数据建设在顶层设计、资源开发、技术应用及法律保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该书归纳了国际档案大数据战略的演进规律，并结合中国国情，辩证

地思考了这些经验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启示。

第四章则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全面展示了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实施现状。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该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实地调研法，对湖南、江西等地的档案大数据建设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深入剖析了地方档案大数据建设的微观生态及存在的瓶颈；另一方面，运用问卷调查法，面向全国范围内的档案机构及从业者发放了504份有效问卷，并针对档案学专业本科生发放了409份关于人才需求的调查问卷。辅以网络调研与深度访谈，该书不仅掌握了全国范围内档案大数据建设的宏观数据，还收集了来自湖南省档案馆、益阳市档案馆等多家机构的一手资料。通过对大量一手数据的统计分析，该书从总体上把握了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概况，揭示了当前档案工作纳入国家大数据发展规划的具体进程，客观呈现了成绩与不足，为后续的战略设计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撑和现实靶向。

第五章是全书的核心枢纽，完成了从“现状分析”到“战略规划”的跃升。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数据，该章对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本章节立足档案工作实际并着眼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目标定位，构建了包含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在内的目标体系，明确了档案大数据发展的方向与愿景。进一步提出了档案大数据战略实现的四大核心支点——资源、制度、技术与人才。这一分析框架突破了以往单一维度的研究局限，强调了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与协同效应。同时，该章还阐述了实施档案大数据战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确保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大数据战略逻辑体系。

该书的第六章至第九章遵循第五章确立的四大战略支点，分别从资源整合、技术应用、法治保障与人才培养四个维度，详尽阐述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具体实现路径。

第六章聚焦于“资源”这一核心要素，探讨档案大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之路。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其核心要义在于推进数据资源的价值转化。该章首先引入SWOT分析法，对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及挑战进行了全面剖析。在借鉴国外典型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推进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策略体系。

第七章关注技术赋能，探讨档案大数据战略的技术应用之路。档案大数据战略的落地离不开先进

技术的支撑。本章首先对云计算、大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及可视化展现等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其次,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了大数据技术在我国档案工作应用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最后,针对性地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在档案管理全流程中的应用对策。

第八章强调制度护航,探讨档案大数据法治体系的健全之路。针对大数据环境下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该章指出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通过介绍国外档案大数据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剖析了我国档案大数据建设面临的法律困境,如立法、执法、普法等层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构建档案大数据法律保护体系的具体策略,旨在为档案大数据战略提供坚实的法治屏障。

第九章立足人才支撑,探讨档案大数据人才的培养之路。人才是第一资源。基于对我国档案学专业本科生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美国档案大数据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经验,指出了当前我国档案人才培养的短板。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多元化的档案大数据人才培养对策,包括优化学科课程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等,旨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第十章作为结语,对全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该章不仅提炼了全书的主要学术观点与核心对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并对未来档案大数据战略的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延续性。

3 《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的书写特色

3.1 站位高远:紧扣时代脉搏,响应国家战略导向

在数字中国建设持续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数据已成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信息资源的治理方式正发生系统性变革。档案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中重要信息资源,其管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服务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数据环境的深刻影响。该书以“档案大数据战略”为研究核心,紧扣时代命题,对档案工作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回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

从宏观层面看,该书以档案大数据战略为研究对象,紧密呼应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体

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与战略站位。在导论部分,通过对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的系统分析,该书从时代背景、政策背景与实践背景等多个维度,揭示档案工作融入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必然趋势,明确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不仅是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基础部分,通过引入大数据理论、数据治理理论、战略规划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构建起支撑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选择本身即体现了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回应,为档案事业在新时代实现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点。

在中观层面,该书围绕我国档案事业在大数据环境下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发展任务展开研究,体现出对行业转型需求的精准把握。在战略设计相关内容中,该书从档案事业发展实际出发,对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目标定位、关键支点和实施原则进行系统论证,回应了档案事业在转型过程中“向何处去”“如何推进”的现实关切。此外,通过对国外代表性国家档案大数据战略实践的分析,提炼其在项目建设、资源整合、技术应用和战略实效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加以思考。这种中观层面的比较分析,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也为我国档案事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寻找可借鉴路径提供了现实参照。

在微观层面,该书围绕档案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档案工作实际运行需求展开深入讨论。在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相关内容中,通过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细致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整合与共享策略,紧密围绕档案工作日常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展开,体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在档案大数据技术应用相关内容中,通过系统梳理云计算、大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与展现等关键技术,对当前技术应用进行分析,反映出研究注重技术在档案工作场景中的实际效果。这种从实践出发反思技术应用路径的研究取向,有助于引导档案部门在推进技术建设时更加注重需求匹配与系统协同。

3.2 方法科学:融合多元方法,夯实实证根基

在研究方法运用方面,该书坚持以实证研究为重要支撑,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档案大数据战略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显著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第四章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与网络调研等方式,对我国档案大数据建设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考察,为后续分析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

通过对湖南、江西等地档案大数据建设情况的实地调研,该书在地方层面获取了档案部门在实际推进档案大数据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面临的问题。这类一手资料为理解档案大数据战略在基层实践中的真实运行状态提供了重要依据。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则反映了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大数据战略的认知状况和实施情况,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在数据处理环节,该书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采用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了我国档案大数据建设中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因素。与此同时,文献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的综合运用,使该书能够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整体性把握。

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使该书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方法体系,不同方法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3 视野宏阔:立足全球经验,拓展比较研究维度

在研究视野上,该书注重将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置于国际背景之中,通过对代表性国家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分析,拓展了研究的比较维度和参考空间。

第三章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相关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模式、公共管理体制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具特色,通过对这些国家相关实践的系统分析,强调在比较中识别共性规律与制度差异,为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本土化设计提供参考。相关分析包括基本概况、战略规划、现实应用、主要特征等维度。例如,在对英国进行分析时,介绍了英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典型项目“Archives Inspire 战略”“Archives Unlocked 战略”,以及重视技术开发应用、人才培养发展、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档案意识强化提升等主要特征。该书并未将比较研究简化为“经验罗列”,而是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国家在资源整合方式、技术路径选择和治理机制构建方面的差异,揭示档案大数据战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呈现出的多样化形态。例如,在分析国外档案大数据实践时,既关注其通过项目化方式推进档案数据整合的经验,也注意到其在制度保障和运行机制方面所形成的相对成熟做法。这种分析为本书在相关章节中提出以资源整合与共享为核心推进档案大数据战略提供了现实依据,使战略设计不再停留于抽象层面。

通过对不同国家实践路径的比较,该书展示了档案大数据战略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与共性特征。在总结国外经验的过程中,该书注重提炼启示,如注重项目建设、强调资源整合、加强技术应用、突出战略实效。这些经验为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规避实践风险。

3.4 重视调研:深耕实践沃土,汇集丰富典型案例

该书在整体研究设计上高度重视实践案例的系统收集与深入分析,将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全书论证的重要基础与主要方法之一。在内容展开过程中,并未停留于抽象概念或原则层面的论述,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生动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档案大数据建设实践案例,全面呈现档案大数据战略在不同制度环境、治理结构与技术条件下的实际运行状态与实施成效。案例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使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实践事实之上,从而显著增强了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与结论的可信度。

在国外案例选择方面,该书重点选取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档案事业与信息治理体系较为成熟的国家,围绕其国家层面或档案部门层面推进档案大数据建设的战略目标、实施路径与具体举措展开分析。这些案例覆盖了档案数据资源整合、数据保存共享、技术开发应用、开放利用机制等多个关键领域,呈现出档案大数据战略在实际运行中的多样形态。通过对这些国家具体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提炼,该书系统总结了其在顶层设计、制度配套、技术应用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成熟做法。

在国内案例方面,该书对我国不同地区档案大数据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样研究。以湖南、江西等地档案部门的档案大数据建设实践为重点,围绕资源建设进展、技术应用水平、制度保障情况以及现实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展开系统分析。这些案例既反映了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也真实呈现了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与瓶颈,为更好认识我国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翔实素材。

通过对国外档案部门推进数据整合与共享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该书总结了其在跨部门协同、平台建设与数据治理方面的成熟经验。同时,结合我国档案部门在推进资源整合与共享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SWOT分析等方法,对国内案例进行系统评估。这种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使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和现实可行性。

4 《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的学术价值

4.1 夯实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整体研究格局来看,国内关于档案大数据的系统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相关成果多集中在档案大数据技术应用、资源建设、安全保障等具体问题层面,而以“档案大数据战略”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有限。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技术工具如何嵌入档案业务流程,对战略层面的理论建构与整体论证关注不足,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理论体系。在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档案大数据建设已不再是单一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治理理念、制度设计与公共服务模式重塑的系统性议题,现有研究在理论解释力与宏观指导性方面仍显不足。从国外研究情况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档案数据化发展趋势、档案大数据管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以及档案大数据服务实践等方面展开,虽然在方法与经验层面积累了一定成果,但整体上仍以应用导向研究为主,对档案大数据战略的整体理论阐释相对分散。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档案大数据战略作为国家大数据战略在档案领域的具体化呈现,其理论内涵、逻辑结构与实现机理仍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与深化。

在此背景下,该书以大数据理论、数据治理理论、战略规划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对“档案大数据”“档案大数据战略”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辨析与规范界定,厘清了档案与大数据在数据属性、治理逻辑与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内在关联,明确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内涵边界与基本特征。例如,在概念阐释过程中,该书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对档案大数据进行界定:一方面,强调档案大数据在规模性、多样性、关联性与价值密度等方面与一般大数据的共通特征;另一方面,突出档案数据以原始记录性为核心的本质属性。

在此基础上,该书将档案工作转型置于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宏观政策框架中加以审视,回应了“为何需要实施档案大数据战略”等根本性问题。通过对分散于不同研究中的概念、观点与实践经验进行整合,初步构建起逻辑相对自洽的档案大数据战略理论框架,有助于提升档案大数据研究的理论自觉程度,推动相关研究由经验性探索向系统化、理论化方向发展。

4.2 构建档案大数据战略的系统设计与整体框架

在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基础上,该书围绕档案大数据战略的顶层设计问题展开深入论证,

着力从整体性与系统性视角对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结构化建模,避免将战略研究简化为若干政策口号或技术路径的拼接。在论证过程中,该书从战略目标、战略支点与实施原则等关键要素入手,对档案大数据战略进行整体性设计,形成较为清晰、层次分明的战略框架。

在战略目标层面,该书通过区分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系统阐明档案大数据战略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明确其在提升档案治理能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支撑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战略意义。总体目标定位为,推进档案工作数据化转型,实现档案数据价值化。具体目标分为资源层次、管理层次、服务层次、安全层次四个层面,共同致力于总体目标的实现。这种目标分层设计方式,使档案大数据战略既具备面向未来的发展导向,又能够回应当前档案工作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为战略实施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

在战略支点分析中,该书突破以往研究中过度依赖单一技术视角或资源视角的局限,从档案大数据资源、制度环境、技术条件与人才结构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论证,揭示不同要素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其内在关联。这种多维度、系统化的分析视角,强调了档案大数据战略并非单项技术工程,而是一项涉及治理体系重构、运行机制优化与能力体系重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从而深化了对档案大数据战略复杂性与整体性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该书对实施档案大数据战略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概括与提炼,从整体统筹、需求导向、开放共享、创新驱动与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这些原则既与国家层面关于数据治理、公共服务转型与风险防控的政策精神保持一致,也紧密契合档案工作自身的发展规律,为档案部门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把握战略方向、协调多方关系、防范潜在风险提供了制度性参考。

围绕档案大数据战略的具体实现路径,该书进一步对资源整合与共享、技术应用、法治保障与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其统一纳入整体战略框架之中进行综合考察。在资源整合与共享研究中,该书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所具备的现实基础、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系统分析,使相关对策的提出建立在较为扎实的现实判断之上。在技术应用层面,通过梳理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with 挖掘等关键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现状,强调技术赋能应服务于档案治理与公共服务目标,而非成为脱离业务逻辑的技术叠加。在法治与制度层面,该书通过对国

外经验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综合分析,系统揭示档案大数据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与制度挑战,凸显以法治方式保障档案大数据战略稳步实施的必要性。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将上述多个实施维度置于同一战略框架下进行综合分析,该书有效推动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从单一路径探讨走向多维协同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分析范式与逻辑参照。

4.3 凸显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应用价值层面,该书紧密对接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中国建设与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将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加以系统考察,凸显研究成果对档案实践工作的现实指导意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完善,以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的持续推进,档案工作正加速融入国家数据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档案大数据建设已成为推动档案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这一背景下,该书所提出的档案大数据战略目标定位、实施支点与路径设计,为档案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提供了较为系统、可参照的框架。相关对策并未停留在操作层面的技术建议,而是从制度设计、组织协同与能力建设等层面提出整体性思路,有助于引导档案部门在实践中统筹处理资源整合、技术应用、安全保障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提高档案大数据建设的整体效能。

同时,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档案领域政策制定与规划编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照。通过系统梳理我国档案大数据建设的现实基础、发展进展与制约因素,相关分析有助于决策层更加清晰地把握档案大数据战略推进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而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前瞻性与针对性。在资源整合与共享板块,该书通过对档案大数据资源整合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的分析,为完善跨部门、跨层级档案数据协同机制提供了现实依据,有助于相关政策在资源配置、标准制定与平台建设等方面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在技术应用板块,研究并未将技术作为孤立变量加以讨论,而是强调技术应用应服务于档案治理能力提升与公共服务优化的总体目标。这一分析有助于引导政策制定部门在推动技术应用时更加注重与档案业务流程、治理模式和服务需求的衔接,避免单纯追求技术先进性而忽视实际适配性。在法治与制度保障板块,通过系

统揭示档案大数据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与制度盲区,为相关政策在数据安全、权责界定与合规运行等方面的制度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人才与能力建设板块,该书从档案大数据战略实施对专业能力结构的要求出发,指出现有人才培养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为档案教育体系调整、继续教育规划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推动档案大数据建设在组织与能力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档案馆及相关机构而言,该书所构建的战略框架与实施路径,有助于推动档案大数据建设由项目驱动向战略引领转变,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在国家数据治理体系中的支撑能力与公共服务效能。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实践问题为依托的研究取向,有助于增强档案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社会价值,推动档案大数据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的转化应用,为档案事业在数字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而稳定的理论支持与路径指引。

5 结语

《档案大数据战略及实现路径研究》立足国家大数据战略与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围绕档案事业现代化转型这一命题,系统回应了档案工作在大数据环境下面临的理论挑战与实践课题。全书以严谨的逻辑结构为支撑,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战略思维统摄技术、制度与实践路径,构建了较为完整、系统且具有现实指向性的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框架,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与实践导向。

从学术层面看,该书通过对档案大数据及其战略内涵的规范界定,弥补了现有研究中战略层面理论建构相对薄弱的不足,推动档案大数据研究由分散化、工具化探索迈向系统化、整体性论证;通过引入多元理论视角并加以综合运用,增强了档案大数据战略研究的解释力与理论厚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范式。从实践层面看,书中基于大量一手调研数据与典型案例提出的战略目标体系与实现路径,紧密贴合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实际,对档案部门科学推进资源整合、技术应用、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档案大数据战略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档案机构中的差异化实施问题,以及新一轮技术变革背景下档案数据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机制,仍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事实上,档案大数据战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持续完善的开放性研究议题,需要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其内

涵。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化档案大数据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增强档案工作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均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该书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部视角独特、论证扎实的优秀专著,特此向档案学界同仁广为推荐。

本文系武汉大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电子文件管理数智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与创新”(ZG248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2023-02-27)[2026-01-16].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2026-03-13)[2026-07-1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 [3] 钱毅. 技术变迁环境下档案对象管理空间演化初探[J]. 档案学通讯, 2018(2):10-14.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rchival Big Data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of Xiang Liven's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rchive Big Data"

YIN Xin, SHU Wenj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China construction and the national big data strategy, archives, as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resource, are facing challenges in their management models and governance systems due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book *The Archive Big Data Strategy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and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bibliometric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o construct a logically rigorous and broad-sighted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he archive big data strategy. This book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archival big data, and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level design, it sketches out the roadmap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his work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archival undertaking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book, distinct features, and value contributions. The hope is to trigger further discussions amo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archival big data strategy.

Keywords: Archival big data; Archival data; Archive industry; Archives work



2026年7月，总第1期（月刊）



ISSN 3135-5625

